新单身女人

The New Single Woman

[美]艾丽·博迪安·[illegible]（Elley Vandergriff）著 [illegible] 译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新单身女性(1)
- 第2节：新单身女性(2)
- 第3节：新单身女性(3)
- 第4节：新单身女性(4)
- 第5节：新单身女性(5)
- 第6节：新单身女性(6)
- 第7节：新单身女性(7)
- 第8节：新单身女性(8)
- 第9节：新单身女性(9)
- 第10节：新单身女性(10)
- 第11节：新单身女性(11)
- 第12节：新单身女性(12)
- 第13节：新单身女性(13)
- 第14节：新单身女性(14)
- 第15节：新单身女性(15)
- 第16节：新单身女性(16)
- 第17节：新单身女性(17)
- 第18节：新单身女性(18)
- 第19节：新单身女性(19)
- 第20节：新单身女性(20)
- 第21节：新单身女性(21)
- 第22节：新单身女性(22)
- 第23节：新单身女性(23)
- 第24节：新单身女性(24)
- 第25节：新单身女性(25)
- 第26节：新单身女性(26)
- 第27节：新单身女性(27)
- 第28节：新单身女性(28)
- 第29节：新单身女性(29)
- 第30节：新单身女性(30)

- 第31节：新单身女性(31)
- 第32节：新单身女性(32)
- 第33节：新单身女性(33)
- 第34节：新单身女性(34)
- 第35节：新单身女性(35)
- 第36节：新单身女性(36)
- 第37节：新单身女性(37)
- 第38节：新单身女性(38)
- 第39节：新单身女性(39)
- 第40节：新单身女性(40)
- 第41节：新单身女性(41)
- 第42节：新单身女性(42)
- 第43节：新单身女性(43)
- 第44节：新单身女性(44)
- 第45节：新单身女性(45)
- 第46节：新单身女性(46)
- 第47节：新单身女性(47)
- 第48节：新单身女性(48)
- 第49节：新单身女性(49)
- 第50节：新单身女性(50)
- 第51节：新单身女性(51)
- 第52节：新单身女性(52)
- 第53节：新单身女性(53)
- 第54节：新单身女性(54)
- 第55节：新单身女性(55)
- 第56节：新单身女性(56)
- 第57节：新单身女性(57)
- 第58节：新单身女性(58)
- 第59节：新单身女性(59)
- 第60节：新单身女性(60)
- 第61节：新单身女性(61)
- 第62节：新单身女性(62)
- 第63节：新单身女性(63)
- 第64节：新单身女性(64)
- 第65节：新单身女性(65)
- 第66节：新?身女性(66)

- 第67节：新单身女性(67)
- 第68节：新单身女性(68)
- 第69节：新单身女性(69)
- 第70节：新单身女性(70)
- 第71节：新单身女性(71)
- 第72节：新单身女性(72)
- 第73节：新单身女性(73)
- 第74节：新单身女性(74)
- 第75节：新单身女性(75)
- 第76节：新单身女性(76)
- 第77节：新单身女性(77)
- 第78节：新单身女性(78)
- 第79节：新单身女性(79)
- 第80节：新单身女性(80)
- 第81节：新单身女性(81)
- 第82节：新单身女性(82)
- 第83节：新单身女性(83)
- 第84节：新单身女性(84)
- 第85节：新单身女性(85)
- 第86节：新单身女性(86)
- 第87节：新单身女性(87)
- 第88节：新单身女性(88)

第1节：新单身女性(1)

新单身女性能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你很重要吗？”她不再为这样的问题所烦扰：“你怎么没同他在一起？”

——诺拉·奥法琳《你很重要吗？》

那是6月里的一个温暖的下午，我和贾尼斯·贝尔蒙坐在公园里聊天。她是一位画家、教师，也是一位我多年追踪采访的单身女性参与采访者的名字和一些可识别的特征都已更改，但所有引用的话都是她们讲述的。。她今年五十出头，看起来更像九年前我们刚刚相识时的那般模样：身材苗条，外表沉静，说起话来轻声细语，一副大大的眼镜部分地遮住了她那很有吸引力的脸庞，一头短短的黑发，发型时尚又很休闲。1994年她曾参与了我组织的一场讨论，讨论者有她和另外三个离异却一直都没再婚的女性。我问她从那以后她的生活有了些什么变化。那时，她的生活很不幸福，是一位问题少年的单身母亲。她渴望找到一位生活伴侣。现在她还是单身，但是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了，就要进入一所重点研究生院深造，她也成了一位骄傲的奶奶了。

贾尼斯告诉我，多年来她一直都在渴望、一直都在寻找一位可以让她托付终身的男士。一年前她最终选择了放弃，准备要像目前这样生活下去。贾尼斯说：“我现在明白了找到某个人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得到幸福。事情往往就是这么怪，你全身心渴望得到的，到时你却意识到那是没有必要的东西。这不是说我决定不要这种男女关系，而是不想刻意去找，也不刻意去想，有一种随意性，一切顺其自然好了。在顺其自然中，我体会到了一种真正有乐趣又充实的生活。”

一个五十多岁的单身女人还可能过着充实快乐的生活吗？如果依照我们接受的文化信息，就会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尽管二十多岁三十出头的单身女性能够得到社会关注和认可，可超过35岁的单身女人却有见不得人的感觉。她们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找到一个伴侣，最好是心心相印的伴侣，才是拥有幸福生活的绝对必要条件。这

种文化氛围还告诉我们，只有在亲密伴侣之间，我们才能找到那种令人满意的感情以及性的和谐，双方是朋友，彼此有安全感，能够实现心灵上的沟通朗格福特·温迪：《感情的革命：性别，力量与爱情的错觉》，纽约：罗特莱兹，1999年，下同；约翰·R.吉尔里斯：《天生的一对》，见《出自自己创造的世界：神话，仪式与追求家庭价值》，纽约：见思克图书公司，1996年，下同。。这种观念强调了浪漫的情侣关系，却隐含着忽视所有其他类型的人际关系，尤其忽视了友谊，忽视了与包括近亲在内的大家庭、同事、师生、邻居以及社区之间的关系。在所有或一些人际关系中，已经找到亲密的感情寄托、安全感、人际间的温暖并且能够享受独处的女性，我们的文化氛围上却视而不见。

近年来，浪漫情侣的标准被提升到一个更理想化的高度。2001年的对20到29岁的未婚男女进行的全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有94%的人找到心灵伴侣才结婚，有80%的人确信自己能够找到。调查中还显示，整整有80%的女性更愿意找到一位能够与她进行内心深处情感交流的丈夫，而不是生活条件不错的人民意测验结果报道在《我们的合众国，2001：谁想嫁一个心灵伴侣？》，鲁特格斯大学国家婚姻项目，2001，可查询他们的网站http://marriage.rutgers.edu。。我发现，这种理想心灵伴侣的理念也在影响着那些年龄偏大的单身女性，并且只要这些女性在寻找心灵伴侣，她们的单身生活状态就变得合理化，但是这种理念却否定了存在于伴侣之外其他方式的满意生活。

有伴侣才能幸福的理念已经带动了一项数百万美元的产业，包括网上鹊桥、个人征婚广告、婚介服务等。数不清的电视、电影及书籍的故事情节中充满了这样的内容，历经了多年令人不堪回首的、苦涩的以及凄凉的单身生活后，人们找到了自己的心灵之约。如果一个单身女人，不论她多大年龄，或离婚多久，不去找或没有成功地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那么传统观念就认为她一定有问题。虽然“老处女”这个词不再用了，与其相关的一些消极影响还余音未绝，年龄大的单身女

性常常被看做不合群的孤独者，不幸的工作狂，或者是在婚恋关系中屡受挫折的精神不正常的失意者。

第2节：新单身女性(2)

如果你过了35岁还是单身，那么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你就会很容易地被扣上丧失爱的功能的帽子了，精神不正常而且有问题，在家庭和朋友间这种文化信息会得到强化。2004年1月，单身的专栏作家理查德·罗伊博在《星期日芝加哥报》上写到了来自他那些有固定关系的朋友的压力。他收到了两位长期交往的女友的度假明信片，她们畅想着婚后快乐的生活，还坚信他很快能找到心仪的伴侣。虽然这些话没有使罗依坡大为不快，但他想象得出如果他写下类似的信来表达他的世界观，她们会怎样消极地反应："我最最亲爱的朋友：我知道你已经结婚12年了，并且声称自己是幸福的，但是在2004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你要睁大眼睛，面对可能会失去承诺的生活！抛开你的丈夫回到游戏中来吧！我不想让你在60岁的某一天才幡然醒悟，才想明白你为什么不去过单身生活。"里查德·罗伊博：《别担心，已婚人：单身并不那么可怕》，《星期日芝加哥报》，2004年1月20日，下同。三天后，《星期日芝加哥报》的另一位专栏作家尼尔·斯泰因贝格写了一篇反驳的文章，"三十单身还不错，过了三十正常人就要结婚"（1月23日）。

一个类似的情景，一位30岁的女性被邀请到电台真人秀中做嘉宾，她说她的朋友们为她过单身生活更快乐而担忧。她的朋友说："不要拒绝爱情；和心爱的人在一起，你会觉得幸福得多。"另一位嘉宾是个47岁的未婚女性，认为自己有性格缺点："我感觉生活很美好，总的来说我很快乐，但我认为我和很多单身的人们在深层的信任方面有问题。"目前还没有研究能证实她的观点，也没有研究证明有伴侣的那些人会更加值得信赖。拥有了幸福的生活，同时觉得单身生活有问题，这种观念在中年的单身女性中还是普遍存在的。

由于这种文化背景，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决定对30岁到60岁的单身女性进行研究。我自己是单身女性，又是一个单身母亲，我思考单身这个话题大约有十年了，在这期间，我查阅了现存的少量社会学

和心理学文献，发表了我个人对这个社会问题的一些粗浅见解，也在想是否投入到这个颇受个人关注的课题之中。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我想查明单身女性的数量激增是如何与婚姻危机和对家庭的影响相关联的。但现在作为一个五十五六岁从未结婚的女性，一个十几岁孩子的母亲，我也要寻找自己的个人目标。只是在最近我才接受了自己有可能会一直单身的生活状态。由于我没有可以模仿的先例，也没有文化指南来规划我的单身生活，我决定采访一些长期过单身生活的女性，希望能找到过着满意生活的单身女性，而且生活压力比我所经历的要小。这是我想发现的。

在1994至1995年间，通过大量寄信给同事、朋友、熟人，我的研究资料汇集了各种群体中的人，有中产阶级的白人、非洲裔美国人、拉丁人等。她们的年龄都超过了30岁，一些人从未结婚，另一些则是离异的，其中一半都有孩子，包括有异性恋者、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我一共采访了46位女性，她们都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却成长在不同的地区，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家庭类型。她们大部分的成年生活都是离家在外，从事不同的职业。这些女性的多样性，及她们不同的渴望、感知、价值观，使我确信她们的经历具有代表性，能够代表大多数美国女性。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中，其中的一些女性积极参与其中并深受影响。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人没有受到女权主义、黑人运动、公民权利、新左翼以及反文化运动的冲击。在那段时期里，一些来自宗教以及传统家庭的人们深受这些运动的价值观的影响，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他们传播这种价值观念的时候，他们遭到了激烈的反对。

在我采访的这些人中，起初基本上没有发现满意的单身女性，与我相比，大多数人对单身有着很矛盾的心理，即使她们没有过孤立的生活，即使她们积极地维持着这种生活。大多数人都有着很强的家庭观念，或者有朋友的支持。但是我突然想到寻找心灵伴侣，然后结为兼顾家庭和事业的平等夫妻的新文化规范，这种规范就是第二次女权

主义运动浪潮所倡导的。与旧时的理想观念相比——女性的事业和传统的家庭生活是分开的，如今的文化规范似乎更加削弱了单身女性的自信。几乎所有的女性，包括那些五十多岁的，也不管她们是异性恋者、同性恋者，还是双性恋者，还都希望找到“合适的那一个”。

第3节：新单身女性(3)

调查结果是令人沮丧的，我怎么能写那些单身女性没有受消极文化的禁锢呢？既要工作又要担起单身母亲的担子，这个两难处境使我把研究暂时放在一边。21世纪初，也就是7到9年之后，当我再次采访这些女性时，我发现1994~1995年没有同居的有一半以上还是单身（其中有两人最近去世）在最初的采访中，我把“单身”定义为不结婚的任何人，包括那些长期同居的人。后来我决定只研究目前没有同居的单身女性，虽然过去很多人有过类似经历。最初参与研究的14位女性这次没有包括在内，因为她们结过婚或者长期处在同居关系之中，还有5个我不能确定。。她们的人生经常处在难以预料的变化之中——动荡的生活，不稳定的关系以及转变的态度。

我发现经历一系列的与命运的抗争之后，大多数女性能够接受目前的单身状态，对她们的生活比较满意。这27位单身女性的故事（包括两个已去世的）和我自己的故事，组成了这本书的基本框架。虽然参与研究的人数有限，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本书逐渐展示出其深度和丰富性，捕捉了21世纪初中产阶级单身女性的生活精华。长期单身的我们成为创造切实可行的、令人满意的生活的先锋。我们的恐惧、抗争、焦虑以及成功代表着这一类女性的生活状态。

在三十多岁、四十多岁，有时是向五十岁迈进的时候，新单身女性可以维持单身生活，通常在四十五六岁到五十八九岁的年龄她们能够放弃这种传统婚姻的文化理念——把婚姻作为唯一的幸福来源，作为克服孤独的唯一方式。假使深受这种文化影响而看不见其他的选择方式，那么，参与这一课题的大多数女性是怎样或者为什么更能接受她们的单身状态呢？一些人可能会说当人变老的时候，我们会更容易接受任何一种生活方式。但是我认为这种解释不太充分。我们完全可以想到五十多岁或六十多岁的单身女性，依然在痴迷地寻找伴侣，她

们看起来很不开心，参与我的课题的就有这样的几位。但是在这个历史阶段，一些因素使中产阶级女性的单身生活变得更加切实可行。

单纯的数字更能说明问题。2000年在美国超过18岁的女性中，未婚的占42%——4400万人（与此相比男性是3800万）。这些单身女性中只有大约600万人在过着同居的生活美国单身协会主任托马斯·科尔曼的私人交流，基于美国2000年人口普查的统计。。这样，大约还有3800万女性还没有同居，其中有1200万的单身女性年龄在35岁至59岁之间（这一年龄段的女性占25%）。与已婚的有了一个或多个孩子的家庭（23.5%）相比，单亲家庭（25.8%）所占的比率明显上升。单身女性的增多主要源于晚婚或离异现在第一次结婚的平均年龄比20世纪（女人25岁，男人27岁）的任何时候都要大些。。第一次婚姻的离婚率一直稳定在50%，再婚的离婚率甚至更高所有的数据都来自2000年的人口普查。。1950年有2/3的离异妇女再婚，但如今只有一半的人再婚，或者是5年之后同居统计数字于2002年在《拉姆勃娄》中被引用。。

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为更多的女性提供了单身生活的可能，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能够维持自己和孩子的生活。与已婚的女性相比，如今35岁以上的从未结婚或离异的女性，个人收入更高些这些数据由资料局和美国单身协会的社会科学数据网络汇集而成。《婚姻地位与女性收入》，《未婚美国》，第1卷，第4期（2000夏），7页，下同；在线参见www.unmarriedAmerica.com。。尽管有理由为这些单身母亲的经济状况担忧，其中68%在贫困线以上，将近40%过着富裕的生活维姬·洛弗尔：《40小时工作建议大大提高了母亲的职业水准》，见出版号D457，妇女政策研究学院，2003年6月7日，下同；在线参见http://www.iwpr.org。，但是单纯经济上的这种自足自立是不会让她们对单身生活持满意态度的。

自愿加入我这个课题采访的这些二三十岁的中产阶级女性，并不知道她们在42岁、55岁或者60岁时还会单身。虽然她们从未有意识地

选择单身，但是回顾一些女性的经历，的确是因为她们做出的某种具体选择，才使她们变得更自立的，摸索出了另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她们选择放弃婚姻或者结束不美满的婚姻关系，全身心地打造自己的事业，追求叛逆的冒险生活，或者成为没有伴侣的单身母亲。正如我所阐明的，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以及反文化运动、种族运动、男同性恋解放运动不鼓励单身生活，实际上却为女性背离传统期望提供了依据。

第4节：新单身女性(4)

到四五十岁的时候，这些离异的或者一直单身的女性从事一份好工作，有一个舒适的住所，有着牢固的家庭关系和朋友网络。她们积极参与社区活动，自愿加入教会/犹太教会以及一些政治组织。她们以各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性需求。但是，往往个人危机对于她们来说也是必需的，它让她们确信，美满生活与幸福婚姻（按照文化信息所讲的）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只有那时她们才能真正放弃那种文化规范，欣然接受自己创造的生活。她们默认了作家艾丽丝·库勒的观点："不知不觉中我漂泊到人生的某种境地，接受它，然后靠自己的力量改变它。"艾丽丝·库勒：《孤独站》，纽约：班塔姆图书公司，1990年，下同。没有憧憬和选择的生活方式不意味着被动的接受，而是积极的探索和改变的过程。我发现创造一种满意的单身生活如同营造一个美满的婚姻一样，是一个自我发展、自我发现和努力工作的过程。

新的文化理念逐渐对女性只有通过婚姻才能够幸福的这种传统理念产生质疑，同时也促进了单身女性接受自己的生活。她们的思想汇集了种种价值观念——来自女权主义、来自对离异和事业成功女性的日益接受，以及来自不断变化的性观念。我的采访对象之一南希·迪恩说："我在牙医那里看到过一本杂志登着一大幅广告，金光闪闪的钻石正戴在一个纵情享受的单身女性的右手上。能看出当你勇于推销自己的时候，你已经克服了这种单身的心理障碍。"

在我采访的这些年里，通俗文学作品以及媒体逐渐肯定了单身生活。电视剧（比如说《金色女郎》《六人行》以及《欲望都市》）以及电影（《等待梦醒时分》《原配夫人俱乐部》《丫丫姐妹会的神圣秘密》）强调了朋友圈的重要性，因为朋友能够为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甚至年龄更大的女性提供亲密的情感交流，从而维持可行的单身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副总统候选人丹·奎尔公开谴责电视人墨菲·布

朗，谴责一个三十多岁的单身女人决定要一个孩子的想法。但是事隔十多年之后，在《欲望都市》中的一个单身女人做出同样的决定，却没有引起异议。毫无疑问，是媒体的关注引导更多的女性考虑把它当做一个选择。2004年美国有线电视公司制播六年的《欲望都市》的最后一集上演了，那时四个女主人公中的三个人，处在三十八九岁到四十出头的年龄，都已结婚或是有了一个可靠的男朋友，然而剧中的中心人物嘉莉的未来并不明朗。她总结说，她做出了一个错误决定，那就是她放弃了自己的工作、老朋友和她喜欢的城市，而和一个只知埋头工作的著名画家到巴黎定居。当她以前的男朋友，对承诺有恐惧症的“大人物”火速赶到巴黎，将她带回纽约之前，她已经离开了那位名画家。但是他们的未来还是不明朗的。嘉莉肯定地说，她的幸福主要取决于了解自己、爱自己、真诚地面对自己。

最后，参与研究采访的这个过程改变了我自己，也改变了许多单身女性。首次采访的小组由三到五个人组成，她们的年纪相仿，或者是单身母亲，或者是没有孩子。一次三个小时的小组采访——比如女性意识提高小组——允许她们说出社会如何看待她们的不满。在一个充满同情的环境下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让她们有机会重新评价自己。在小组采访之后写评语时，她们阐明了那种经历如何导致个人变化。简喜欢“有机会谈论不经常探讨的话题”，相反，没有孩子、四十多岁的乔伊斯，曾害怕采访会带来一种意识不到的遗憾，但是后来她写道：“我知道了没有孩子也要舒适地生活。”31岁的琳达说：“采访后我意识到在人生的这一阶段，保持单身是多么好的选择。”八年后我发现她还是单身一人，想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怀孕，这一做法是受到了“选择单身母亲”国家组织承办的电子邮件讨论小组的启发。

这样，小组采访以及接下来的个人采访使得许多女性看到了她们生活中积极的一面，她们乐意和朋友们讨论单身问题，也乐于接受新观念。同样我希望本书的读者也勇于和别人讨论单身问题，这样做她们会看到不同的人生体验，并且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要做的选择。

第5节：新单身女性(5)

新型单身女性

我和采访对象的人生变化，使我清楚地看到新型单身女性的出现，她们与传统概念上的老处女以及二十多岁的单身女孩明显不同。对于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成为新型的单身女性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但是，文化上的日益关注及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长期的单身生活可能会为未来的女性提供一条捷径。

新单身女性很满意自己的生活，对保持单身的前景比较乐观，她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人际关系以及身份都很满意。她不再被看做特殊的人群，不再是一个孤独者或是一个另类术语“能干的孤独者”集中体现在性格特征是由社会学家伊·马维斯·赫德林顿和约翰·凯利提出的。芭芭拉·笛福·怀特海德也认为有鲜明个性的一些女性会选择长期单身。参见《为什么剩下的没有好男人》（2003）。关于谁会成为单身女性，我的观点有所不同。海尔布伦辨析了单身与孤寂之间的差异。她与65岁依然单身的格洛里亚·施坦内曼比较时说：“施坦内曼，虽独处但不孤寂。而我，与三个孩子和丈夫生活在一起，却是孤独的。”。她已经建造了六大支柱来保证自己过上令人满意的生活：

1）新单身女性拥有自己的住所，不管她单独居住还是和别人住在一起。

2）她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能够使她经济独立，提高了心理定位，但这不是她生活的全部。因为新单身女性的工作和生活的其他方面紧紧相连；和已婚女性相比，当事业机会出现时，她可能不会三心二意。

3）单身女性对自己的性生活比较满意，这种满意程度明显不同，我没有发现更多的性受挫者。参与我研究的性生活活跃的单身女性认为，不一定是永久的伴侣才能满足性需求，她们不把自己的性生活仅

仅局限在心灵伴侣上。与一贯的做法相反，一些女性满足于自己的独身生活，另一些人已经找到了性欲发泄的其他途径。

4）新单身女性乐于同下一代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包括与儿子、孙子、侄子、侄女、继子女、年轻的女门徒，还愿意和年轻人在一起做一些自愿性的工作。

5）新单身女性在朋友圈，或者在家庭朋友中有亲密的情感沟通，在遇到麻烦和困难时有可以依赖的同伴和朋友许多对幸福的定量研究（解释为对生活有积极的情感和知足感）强调了社交关系的重要性。在一些研究中有朋友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最重要的幸福源泉。阿盖尔·迈麦尔：《幸福的心理学》，纽约：罗特译，2001年第二版，下同。。因为友谊不是唯一的人际关系，还因为美国文化强调友谊中平等互助的重要性。比起大多数家庭成员和浪漫情人来说，朋友更有助于女性的自立，四十多岁的单身女性尤其擅长发展和维持这种友谊，所以她们通常拥有较大的朋友圈。

6）新单身女性主要通过朋友圈来创建、维持这种社团，把不同社会背景（来自学校、教堂、政治组织及其他工作岗位）的朋友结合在一起形成当代社团的基础，这样，单身女性就不是独自一人，也不是一切只靠自己了。

当为长期单身找到这些支持的依据时，我认为这只适用于满意的单身者。然而，当我在一个社区学院的一次谈话中概括这些特征时，一位女士举手发言："可是所有人过好日子都需要这样，不管单身还是已婚。"我马上肯定她讲的有道理，我自己还没有从这种错误的观念中解脱出来——总认为单身和已婚人过着不同的生活。这成了我醒悟的开始，也是本书的另外一个主题——单身和已婚女性的统一性，尽管文化上总是把两者的身份区分开来。如今有很多女性不结婚，也没有同居，但是她们也不完全单身。而且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人生的某个阶段处于结婚或者同居状态，另一个阶段则是单身状态。这种阅历的多样性，对所谓的单身以及女性之间的关联赋予了更为复杂的看

法，不管她们目前的生活状况如何，都能够理解彼此的生活。我将证实朋友网络是怎样将单身女性和已婚女性联系在一起——以及那些介于二者之间的身份——怎样为所有人提供亲密的情感交流与安全感。

第6节：新单身女性(6)

我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发现——也是我所不曾预料的——大约有一半我所采访的长期单身的女性生长在稳定的、良好的家庭气氛中，一些人还和大家庭生活在一起。可能我本不应该奇怪，因为我的家庭背景也是这样，但是社会学以及通俗文学作品过分渲染的是，父母离婚的经历以及不稳定的家庭环境导致了单身数量的增加。虽然我的抽样调查不足以得出任何确定的分析，但是如果说离婚的增加是导致单身数量增长的唯一因素，那么我对单身女性家庭背景的调查却与此相悖。

在以后的章节中，我将详细描述单身女性首先如何对待心灵伴侣，然后又使自己摆脱心灵伴侣这一理想的束缚的故事。通过长期精心营造自己的单身生活，一些人变得更加自立并从中找到人生价值。在这里我提出几个问题：单身女性怎样使自己摆脱传统的母亲概念，不要孩子或者接受单身母亲身份？没有伴侣的承诺而是一个女人运用自己的情感魅力与其他人交往的生活大致是什么样子呢？当友谊成为亲密的情感沟通和同伴关心的主要途径时，单身女性如何处理自己与朋友之间的冲突？我们遇到的是有伴侣却没有同居的女性，以及已经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的独居女性。我们还经历了单身女性去世时的独特方式。

我发现了对生活满意的单身女性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也有一些不同之处。一些女性内心坚定而自立，另一些人自己却从来拿不定主意；一些人偏爱长期独处，另一些人，即使她们单独居住，也总是和朋友们在电话里聊天；性生活对一些人很重要，她们热衷于追求并享受积极的性生活，另一些人却喜欢清心寡欲。

处于黄金年龄的新单身女性与认为到三十多岁就该结婚的单身女性就截然不同，搞清楚这一点对黄金年龄的单身女性有积极的暗示作用。二三十岁的单身女性，越来越对独立意识、事业追求与婚姻感到

焦虑，40岁之后，她们会出现另一种生活框架。撇开在二十多岁时她们所拥有的教育、职业、约会和生存等所有机会，大多年轻女性在35岁后，只有一个在文化上认可的选择——寻找兼顾工作和家庭的平等伴侣。这样的伴侣可以选择要不要孩子，或者要多少孩子。但是年轻的单身女性不能够预见40岁以后的积极的单身生活。记者佩吉·欧伦斯坦发现，这些女性认为如果四十多岁的时候还没有结婚，她们会变得孤独，并且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没有“家庭生活的舒适和满足”佩吉·欧伦斯坦：《流动：在变化的世界里女人论性，工作，孩子，爱情和生活》，纽约：道尔布岱，2000年，下同。。她们会认为自己只有工作，没有个人生活。

年龄超过35岁单身女性的母亲经常把自己的婚姻观念强加给她们的女儿。如今听到一位母亲吹嘘她27岁的单身女儿学业上的成绩和事业上的成功已经习以为常。但是50岁还依然单身的女儿的母亲通常有不同的看法。她通常会说：“珍妮特还在单身，我真为她担心，我希望她能遇到意中人，然后定居下来。”这时，我们还会听到一位母亲说，“我为珍妮特感到自豪，她买了自己的房子，去年还得了教学奖，比我认识的任何人朋友都多”吗？我们不可能听到艾琳的母亲在吹嘘她40岁离异的女儿，独自抚养孩子，和另外一位也在抚养自己孩子的单身女性朋友住在一起。艾琳母亲会说：“我希望她会找到意中人再婚，那个孩子需要一个父亲。”

坚守浪漫的理想

尽管自己长期单身，并有这次研究中感受到的变化，我依然发现自己的思想滑向了传统文化所倡导的浪漫爱情，这证明这种观点已经紧紧固守在我们所有人的头脑中。2003年我和安妮·罗塞提联系，这离我上次采访她已经过去六年了，离第一次小组采访有八年了，她说：“你恰好找到我，我就要永久地搬到图森了，我是由于心灵的呼唤才去那里的。”我立刻断定她已经遇到了合适的人。结果这个离婚已经20年的成功的有魅力的企业家，在55岁时想搬到美国西南部，不是为

了浪漫的爱情，而是因为她的一部分童年是在那里度过的，她爱那里的气候、天空、艺术以及美丽的风景。她在图森有朋友和家庭，会找到某种工作，并且感觉到一个小一点的城市为人际交往会提供更多的机会。这些就是她心所向往的，而不是浪漫的情人或者伴侣。

第7节：新单身女性(7)

不是每个人走向婚姻殿堂仅是受文化规范的驱使，不是所有长期单身的女性，包括我的一些朋友想维持单身。她们过着可维持的生活，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快乐的，但是她们还是希望成家。她们想像正常夫妻一样有日常的亲密、触摸，过着平凡的生活。虽然改变文化规范不会改变她们的这种意愿，也不能弥补找不到伴侣的伤痛，但是其中的一些人向我坦然，在一个把她们的生活看做正常可以接受的氛围里，她们会感觉更好一些。下面各个章节中女性的经历，可能有助于不太知足的单身女性更好地洞悉如何在不影响可维持的单身生活的情况下继续寻找伴侣。

更多的单身甚至那些想找伴侣的女性，当她们年复一年地经历着毫无目的地寻找伴侣的痛苦时，本书提供全新的视角能够使她们的生活尽量避免处于悬浮状态。事实上，在近期的《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要对婚介产业说不》，2003年11月30日）中，凯特·泽尔尼克就发现一些单身者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拒绝接受寻找伴侣的压力。参与课题研究的少量将近50岁的还在专注于寻找伴侣的女性，她们的生活非常不开心，也没有赢得单身生活所必要的社会支持。在第五章我们会遇到59岁的瑞秋·布朗，她由于把主要时间用在寻找伴侣上，结果她的朋友都离她而去了，她没有精力处理家庭和工作中遇到的激烈冲突。虽然参加了无数的有关如何结成夫妻的课程培训，但是她却无力弥补其他方面的人际关系的缺失。

面向一种新的文化模式

《新单身女人》明确了文化的演变过程，渴望使之得到关注。最近历史学家安·道格拉斯对记者说：“女性有可能维持单身生活是正在进行的最重要的社会变化之一，除了恐吓战术之外基本上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菲比·侯班引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安·道格拉斯的《单身女孩：性感但不自尊》，《纽约时报》中的观点。我希望改变

这一点。我想要的是讲述一个有关长期单身生活的故事——在社会文化方面不以浪漫爱情、走向婚姻或者成为伴侣为中心，而强调朋友之间的亲密关系和相互间的支持；个人在家庭、工作和团体中的完善；对于一些人而言，是在性生活中或在育儿中得到满足。由于受变化的文化视角影响，友谊被看做亲密情感沟通的一种主要方式，从这点来说，单身女性通常过着非常充实的生活。

与许多当代婚姻危机的分析家谴责单身不同，也与批评婚姻的单身维护者相反，我想说明的是，长期单身人数的增加与更稳定的婚姻状态可以同时并存。使长期单身正常化的文化氛围可能会减少离婚率，因为人们有明确的理由要结婚，而不单单为了不背负单身这个名声而结婚。佩吉·欧伦斯坦明智地指出："如果女性不认为单身生活是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本身拥有一套成本、报酬、挑战，她们就会像上一代人那样受婚姻控制，同样屈服，作出消极的选择，那是出于恐惧而不是发自内心真正的愿望。"与有更高的结婚和离婚率的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数据来自欧洲联合统计机构，表明在2000年美国的婚姻率为每千人中有8.4人成婚，欧洲为5.1。欧洲的最高婚姻率（葡萄牙6.9）比美国低。但美国的离婚率也很高。与欧洲的1.8相比，在美国每千人中有4.2人离婚。欧洲的最高离婚率（瑞士2.9），也比美国低得多。这些数据由选择婚姻工程提供。在线参见http://www.unmarried.org。，美国拥有较少但是却更稳定的婚姻人口，他们和单身人群能够和谐共存。朋友圈对于单身、已婚女性都同样重要，一旦离异、配偶死亡或患严重疾病时，能够为她们提供亲情关怀以及安全感。本书的人物，形象地证实了单身也可以过着一种充实而完善的生活，和那些已婚的相比，没有多大差异。

如果我们从成年人入手，大多数人不知道会在哪结束。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的单身女性，不管有没有找到伴侣，假设她们有意识地营造可行的生活，这就通向了更充实的生活道路，以后也会有更多的选

择。相反，单单专注于寻找伴侣而忽视人生的其他因素则成为不幸的缘由。

第8节：新单身女性(8)

我希望通过阅读、接受、欣赏本书中单身女性奋斗的故事，将有助于其他的女性缩短这个抗争过程。单身不仅仅被看做婚恋关系中虚空的中转站，它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带有很多变异、拥有需求和回报的令人满意的生活之路。

2003年2月的寒冷的一天，在加州学院的一个教室里，我和28名女生在一起讨论当今单身女性的话题，她们大多20岁出头。我问她们是否赞同作者的观点：几乎没有女性会选择单身，她们都认同了我的学生已经读过瑞奇的《现实中的单身女性》中的几个章节。。米歇尔抢着说："但是我们选择不住在一起。"丽莎补充说如果两人的关系不好她就选择放弃。这两个人和很多同龄人一样，在寻求心灵伴侣。

理想的心灵伴侣，是彼此相爱，忠诚相对，情感上亲密无间，且有归属感《我们的合众国》，见鲁特格斯大学国家婚姻工程，2001年。在线参见http://marriage.rutgers.edu。，这种看法是当代对浪漫爱情的重新阐释。至少在意识上，找心灵伴侣已经取代了长期的婚姻关系和合伙关系。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补充一下在《序言》部分列举的统计数字：

2001年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显示：年龄在20到29岁的未婚男女有94%的人在寻找心灵伴侣，其中87%的人有信心能找到这样的伴侣。年轻人不把婚姻当做提供经济保障的来源，也不认为有孩子很重要。在这次调查中，只有16%的年轻人认为结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孩子。超过2/3的年轻女性（与男性数量相等）认为婚前有经济保障很重要。

虽然性吸引是心灵伴侣的一部分，但性趣不是理想的心灵伴侣考虑的重点社会学家伊娃·伊尔洛兹声称纵观20世纪，性爱是爱情文化的附属品。参见伊娃·伊尔洛兹：《摧毁浪漫的乌托邦，资本主义的爱情与文化冲突》，伯克利与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7年，下同。。倡导女权主义的黑人作家贝尔·胡克斯强调，爱情就是一个人与另一个

人心灵的神秘结合，但不一定拥有性激情贝尔·胡克斯：《关于爱情的全部：新视野》，纽约：威廉毛佑，2000年，188页，下同。。她总结说：“我们大多数人会选择伟大的爱情，而不是性激情，如果我们不得不作出选择的话。”胡克斯：《关于爱情的全部》，175页。与此同时，性学专家培伯·施瓦兹认为心灵伴侣之间经常缺少性激情。她认为“一心想填补婚姻中两人亲密的空白，一心想缩短两人的距离和消灭彼此间的等级差距”培伯·施瓦兹：《你了解的爱情和性爱都是错的：25对婚恋的重新阐释了在亲密关系中如何得到幸福和满足》，纽约：近地点，2001年，9页，下同。，这种单纯的欲望成为湮灭性激情的主要因素之一。

女生都同意爱情比性爱更重要。她们都不同意“如果他满足我所有其他的标准，我会嫁给一个我不爱的人”的说法。然而一半多的人认为她们“会和心灵伴侣形成长期的伙伴关系，即使性生活不完美”。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一方面随意找一个自愿发生性关系的人是很容易的，另一方面离婚率又高，寻求心灵伴侣意味着内心深处可能是更长久的结合的需求。一个学生认为，“理想的心灵伴侣就是找到了一个能给你带来稳定情感的人，一个支持你的人，一个使你身心舒适的人。”

有缘的结合似乎比你刻意追求的结合更有吸引力。哲学家托马斯·莫雷尔写道：“心灵伴侣之间有内心深处的交流，这种交流好像不是有意的，而是一种超越平凡的雅意。”莫雷尔：《非女人行为：挑战不要孩子》，纽约：罗特莱兹，1994年，XVII，下同。生活在一个工作时间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地方都长的国家，生活在一个赞美搞好两性关系的文化氛围里，我们会很欣慰地被告之不费力气就会找到和自己息息相通的心灵伴侣。与精神上的相互吸引更容易在一个信仰其他的先进工业化国家相比较为重要的社会产生共鸣。

盖洛普民意调查的结果和学生的观点激起我对理想的心灵伴侣话题的兴趣，我开始到处留意这方面的事，包括在流行文化和教育程度较高的领域。举例如下：

第9节：新单身女性(9)

美国有线电视公司的《欲望都市》位居排行榜之首，此片于2001年第四季度首映，全面展示了四个单身女性寻找心灵伴侣的过程。四个女主角就心灵伴侣是否存在展开辩论，如果存在，她们的幸福是否取决于找到一个心灵伴侣。夏洛特出主意说："或许我们可以成为彼此的心灵伴侣。这样就可以玩弄优秀的男人了。"

2002年2月28日上演的流行肥皂剧《六人行》也提到了这方面：费比问瑞秋是否相信有心灵伴侣，瑞秋回答说："当然，当然。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完美的伴侣在不远处等着你。你要知道如何发现，不用我到处张望，我知道他会找到我的。"

那一年的春季，反映现实的电视剧《单身汉》开始上演。剧中一个单身男人展示了从见面、约会到拒绝了一大批单身女性的过程。在最后一幕单身汉亚历克斯说："通过这个过程你能找到自己的心灵伴侣吗？我相信你能。"

不仅仅白色人种的中产阶级女性想找心灵伴侣。2002年11月14日，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前沿系列节目播放了一部电视纪录片《我们结婚吧》，记者亚历克斯·考特劳维茨采访了一位有七个孩子的非洲籍单身母亲。这位妈妈介绍说，最后一个孩子的爸爸是"我的心灵伴侣"。她还在等他，一直等到他找到一份好工作再结婚。1999年《精华》杂志登载一篇文章，讨论黑人妇女寻找心灵伴侣的重要性帕梅拉·约翰逊：《亲密》，见《精华》，1999年9月（5），64页，下同。。

女同性恋者也开始寻找理想的心灵伴侣。2001年迪安·卡兹在《女同性恋新闻》中写道：

即使你有性格缺点，你的心灵伴侣会依然爱你。你会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被理解感和被爱的感觉；你的心灵伴侣会和你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你强烈地感到你们有相同的目标和理想。仿佛某人在你心灵前放一面镜子，结果发现你的心灵伴侣和你惊人地相似迪安·卡兹：

《你在意爱还是只为了满足需求？》，见《女同性恋新闻》，2001年8月（2）卷第1期，下同。。

在更权威的报刊也会看到有关心灵伴侣的报道：卡瑟·鲍丽特在《纽约人》（2002年7月22日）中写道："我没有意识到和我生活在一起的男人，我的心灵伴侣，天生和我般配的人，却是个十足的玩弄女性的高手。"《纽约时报》的一篇书评《寻找心灵伴侣：必须像德里罗一样》《纽约时报》，2002年7月28日。讲到，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本传记里，70年代的一个激进女权主义者米迟丽·华莱士写到她的"丈夫对吉恩有好感，而吉恩是我生命的挚爱，我的心灵伴侣"华莱士：《往返归来：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通往黑人女权主义之路》，出自《女权主义者回忆工程》，见：雷切尔·伯劳·杜普利斯，安·斯尼特尔：《妇女运动的声音》，纽约三河出版社，1998年，426页，下同。。

单身女性的含义

社会学家主要研究流行的理想的心灵伴侣的观念对婚姻意味着什么，而我关心的是它怎样影响单身女性的。假定文化氛围强调找到心灵伴侣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困难而且矛盾重重。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主张的理想主义和平等主义产生了当代的心灵伴侣的理想，从而补充了只有通过夫妻间的爱情才能使人生完整的看法。对于一些女性而言，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或至少拒绝定居时，寻找心灵伴侣的说法为她们目前的单身状况提供了心理支柱。但是这种理由也无助于憧憬未来，或为长期的单身生活提供依据。

既然寻找心灵伴侣的理想标准高，目标又不明确，它就为二十几岁的人保持单身或者对目前的同伙感情不是永久性地投入提供了借口。男人27岁而女人25岁似乎符合这个时代结婚的平均年龄，而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结婚的年龄会更迟些社会学家诺沃·格林阐明："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一般比其他女性结婚晚一年半左右，今年这种趋势可能会有所增加。"《沟通情感，约会，希望找到白马王子：如今的大学女生约会与寻求的目标》，来自2001年美国价值学院的一个报道。

在线参见www.americanvalues.org。。2000年夏天，萨莎·卡根，一个二十八九岁的来自旧金山的作家写了一篇有关成为一个“单身怪人”的文章卡根的文章首次出现在一家新出版的小杂志上，她称做《行动菜单》。《阿特尼读者》杂志转版，《旧金山记事》及其他报刊均有讨论，因特网讨论小组在阿特尼读者自助餐成立。，这里她标榜自己和其他的“单身怪人”都是浪漫的女人，也就是说她们想寻找心灵伴侣，但是在现实世界中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些人宁愿单身也不愿为了结婚而委曲求全卡根在《单身怪人》书中扩展了这些见解。参见：《单身怪人：不妥协浪漫宣言》，旧金山：哈柏旧金山，2004年，下同。。

第10节：新单身女性(10)

然而，对于二十八九岁或三十多岁的不觉得自己怪异，或者不想孤独一生的单身女性来说，在心理上接受了寻找理想的心灵伴侣的念头，难免会焦虑失望。记者佩吉·欧伦斯坦发现，有成就的年轻单身女性一想到到了中年还孑身一人就恐惧不已。欧伦斯坦写道：

在纽约出版社我遇到一些有抱负的年轻女性，我问她们，由于种种可能，如果到40岁还依然单身会怎么样，她们看起来都很恐惧。莱斯丽声音有点颤抖地说："还没有这个选择。"特雷西说："我不想考虑这个问题。"阿比用手指节敲击桌子，摇着头说："老天保佑，老天保佑。"欧伦斯坦：《流动》，31页。

那么，寻找心灵伴侣的理想对于参与我课题研究的大于35岁的单身女性有何影响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采访的从未结婚的或者离异的女性中，虽然只有几个人谈到了心灵伴侣这个术语，但是她们中还是有一些人赞成类似于心灵伴侣的提法的社会学家尼尔·格罗斯在洛杉矶调查23岁到55岁的人们，结果发现人们对内心渴望理想的亲密情感看法相似。2004年4月8日在加州伯克利大学社会学系的一次谈话中讨论了他的初期发现，题目为《内心深处亲密情感的模式》。他的模式评估与我的很不相同。。不管是未婚的还是离异的，这些人都在寻找内心深处的结合。她们想找到一个"人生伴侣"，一个真正在"心理上和情感上"相融的人。

举个例子说，参与我这个研究课题的两个单身女人，一个是拉丁美洲的，另一个是美籍非裔，她们在三十七八岁到四十五六岁这个过渡期间清楚地谈论过理想中的心灵伴侣问题。虽然你发现她们与白种人有区别，但是在我采访过的白种人与非白种人属于中产阶级的单身女性中，她们的故事主题却是惊人地相似。

玛丽亚·喀都扎：一个离异的单身母亲

我一下子被玛丽亚·喀都扎吸引住了：魅力十足，口齿清晰，是一个活泼的拉丁美洲人。在一个温暖的夏日夜晚她来到了采访组，上身穿着一件朴素的衬衫，下配短裙，脚穿凉鞋，自然地披着一头棕栗色头发。玛丽亚那年38岁，看起来还像一个女孩子。她谈话很投入，言语间不时地夹带着手势。

这个离异的单身母亲在波多黎各出生长大，她正在具体地谈她在找的未来伴侣："我希望我会找到自己的心灵伴侣。他能明白在我想什么，并且能设身处地地与我同行，反过来我对他也一样。我没有失去希望，即使我还没遇到一个，我敢说：'这个人很沉稳，他事业有成，能面对自己，很坦诚，不藏心眼。'"我惊讶于玛丽亚清楚地表达理想中的心灵伴侣。我很快得知她在波多黎各和美国加入反文化运动有很多年了。

她18岁时是个素食主义者，信奉佛教，练习瑜伽。多年来她梦想着离开岛国，在一个更宽松的环境下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21岁的玛丽亚，带着节省下的钱，放弃了在波多黎各学院的学业，飞向佛罗里达，开始了旅游冒险生活。不久她在田纳西的一家社区农场落脚。这个农场有一千多人，玛丽亚搞些翻译工作，和学校里的孩子一起帮农场干些活。之后她离开农场到密歇根的姐妹群居村摘绿色苹果。玛丽亚回忆说："那时真有意思，我们只摘苹果，吸吗啡，就是年轻。"

但是玛丽亚喜欢的生活方式没能消除伴随她成长的宗教信仰的影响。她25岁时嫁给了一个在社区认识的来自英国的男朋友，因为她想要个孩子。她解释说："我是个信天主教的女孩，要结婚后才能怀孕。"尽管有冒险精神，她还是渴望过上一种她不曾有的传统的家庭生活。虽然她对男友约翰不算十分满意，但她知道他很可靠（不像她爸爸），并且她喜欢约翰的妈妈。玛丽亚和男朋友一起住在约翰的妈妈家，在那度过了八个月的时光。他妈妈得了癌症，他们帮她度过化疗期。

玛丽亚认为她的新婚丈夫是“那种忧郁的人”，可她相信自己能够“让他振奋起来”。有了孩子之后，他们第一次自己单住，她醒悟过来。“我们之间没有交流，”她说，“有很多事情我们都不谈论，也没有精神上的沟通。”这次婚姻只维持了三年，当他们的儿子伊桑两岁的时候，她离开了约翰。

第11节：新单身女性(11)

20世纪80年代她离婚之后，玛丽亚又过起了嬉皮士的生活。有几年她住在瑜伽健身中心，之后又搬到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小镇。玛丽亚做过很多工作——房间清扫工、木匠、瑜伽教练、家庭健康助理以及学龄前老师。然而在她三十五六岁的时候，有八个月的时间她接受了福利救济，这样她就能够在全日制的大学里就读了。

获得心理学的学士学位和社会服务的硕士学位标志着玛丽亚远离了反文化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她总是表现出个人精神上的价值观。她从不谈起参与任何组织的政治活动，也从来不把自己当做一个女权主义者。然而在她28岁的时候，玛丽亚决定把她的姓改成她妈妈的姓。这表示了她对男人的愤怒，同时也强调了如她所说的“我只属于我自己”。再一次，她的选择暗示了个性化的而不是政治上的价值观。

玛丽亚是否有能力定义自己、重新展示自己以及追求自己的目标取决于她抚养儿子时能否得到帮助。如她所预见的那样，事实证明约翰是一个好父亲。即使他和另一个女人一起住在东海岸之后，他还保持和儿子伊桑的联系。当玛丽亚想上学又要照顾孩子遇到麻烦的时候，约翰把九岁的伊桑接到东海岸和他住了一年。他很关心儿子在青春期遇到的一些棘手的问题。

1995年约翰（又单身了）接受玛丽亚的邀请搬进了她两居室的公寓楼，帮助抚养13岁的儿子。玛丽亚和约翰对伊桑说得很明白，他们不是重新回到一起，而是分别在与别人约会。尽管她全身心地照顾儿子，与前夫住在一起，有着一份要求严格的工作，还要兼顾研究生院的事务，玛丽亚还是渴望能够有个伴侣。但是她很清楚地表明那不是传统观念上的婚姻，现在她想要的是一个心灵伴侣。

2002年我又遇到了玛丽亚，46岁的她还在单身。她在一家小的社会服务机构工作，我在办公室看到的这个女人，与年轻时候的她明显不同。我还能认出她的那张脸，苗条的体形，声调柔和。她热情地和

我打招呼，但是她的风采变了，明显看出化了妆，头发理得很短很时尚。她穿着一件引人注目的外套，佩戴着一条漂亮的丝巾，高跟鞋取代了凉鞋，看不出一点往日嬉皮士的迹象。

在采访之前，我发给玛丽亚一张手稿，上面记载着八年前她说过的话。看到它时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立刻谈起想找心灵伴侣的这件事情。现在她认为寻找理想的心灵伴侣的想法非常愚蠢，过于浪漫。“我已经不那样想了，”她说，“我认为婚姻需要两人性情接近，互相信任，彼此友爱，要有相似的看法，要两人一起做出决定，我再也不认为爱情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你要刻意追求的。如果我和他不得不做一个决定——那么，其中一人通常有妥协的成分。”

玛丽亚迫切地想找到一个婚姻伴侣，拒绝同居。在事业上她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并且经济稳定。她的儿子二十出头，过着独立的生活。她的前夫——还是她的一个朋友——已经再婚。作为一个有魅力的四十五六岁的中年女性，玛丽亚通过朋友的牵线帮忙，约会了很多男人。她利用这些约会来“面试候选者”——利用她在专业培训中学到的技巧。玛丽亚已经与其中一个男人约会了大约五个月的时间，很有希望发展这种关系。他与她年龄相仿，离过婚，也是个移民，事业成功，经济稳定。使玛丽亚感到欣慰的是他没有孩子，也不想要孩子。他是她精神上的抚慰和支柱。玛丽亚没有用心灵伴侣这个模糊的词语来描述这个人，她越来越具体地谈到为什么他们是很般配的一对。

玛丽亚在渴望寻找心灵伴侣的两个阶段的不同表现，给那些既想找到合适的伴侣但是条件又不允许的单身女性提供了合理的例证。当她在寻找心灵伴侣的时候，玛丽亚不具备找到满意伴侣的条件，她是一个经济窘迫的单身母亲，扶养一个问题少年在她完成培训成为一个专业人士的过程中，时间上也不允许她过多考虑个人问题。她分别与两个男人经历过不和谐的同居生活，其中一个不接受她的儿子，而另一个却是她的“第二个孩子”。她和她的前夫住在一起，这种处境不利

于吸引潜在的伴侣。既然她现在条件很好，取代心灵伴侣的就应是更加具体、更加现实的目标。

第12节：新单身女性(12)

玛丽亚尽管明确表示想要婚姻，但她也接受有可能继续单身下去。她说：“如果我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我就要单身。”玛丽亚有一份她喜欢的工作，有家庭，有好朋友，有爱好和一些精神上相通的团队伙伴。目前她正在攒钱买房子，找到一个性伴侣不成问题，但是玛丽亚不能对家人和朋友解释使单身生活合理化的一套价值观念，更为重要的是，她无法说服自己。她无法做到停止寻找心灵伴侣而肯定单身生活。

兰妮特·琼斯：一个单身的女强人

对于像玛丽亚那样想找个伴儿，可自身条件又不允许的女性是不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男人的，心灵伴侣的理念对她们只是一个心理寄托，这也同样适用于过着快乐的单身生活的那些人。我们来认识一下兰妮特·琼斯，一位娇小、活泼、肤色较浅的非洲裔美籍女性。1995年兰妮特参与了研究生院的老同学组织的一个小组采访。37岁的她，仅比玛丽亚·喀都扎小一岁，住在离她不到100英里的地方。但是作为一名从未结婚的职业上相当成功的管理者，又没有孩子，兰妮特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

兰妮特生长在洛杉矶中产阶级家庭里，7岁时父母离婚。但与玛丽亚不同，直到今天，兰妮特还一直与她父亲联系密切，她与两个姐姐和母亲的关系很近，她们就住在附近。她有一个超级大家庭，全国到处都有她的朋友。兰妮特不喜欢反文化运动；高中时她是拉拉队队长，大学时加入了妇女联合会。如今她已经完成了工商管理硕士和公共政策的双学位，正要赶赴东海岸的工作岗位。

兰妮特性格外向，有魅力，经常有男朋友，但她说从来没有过相处时间超过七个月的异性。那时她不信守心灵伴侣这种理念。“或许我出钱买这个婚姻的神话，”她说，“我想要的伴侣围绕在我身边，能和我聊天，陪我做事，和我同睡。看到我那些成双成对的朋友，使我想

到如果我不结束同伴侣的关系，我就会失去很多良机。”婚姻是必须履行的责任——因为她的所有朋友都在这样做——比兰妮特理想中的那种“神话故事”看起来更有强迫性。

兰妮特只约会黑人，她偏爱黑人，她也了解统计数字很不乐观，适合于事业成功的美国非裔女性，而且证明可信赖的黑人男性简直就是凤毛麟角根据《新闻周刊》（2003年3月3日，第48页），与17%的黑人男性相比，有24%的黑人女性晋升到职业经理的位置。。她调侃道：“如果我到35岁时个人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就开始找白人约会，要是到了40岁还没有成家，我就开始找女人约会。”可是似乎这两种都没有可能性。

七年多过去了，现在45岁的兰妮特还是单身。由于担任一个高级的行政职位，她最近搬回到海湾地区，那里离她的家更近了。同玛丽亚一样，研究生毕业后她的模样变了很多。当我走进她的办公室，我几乎认不出这位衣着典雅、充满自信的女性。眼前的她还是那么开朗，友好。

很快兰妮特介绍了这期间她的个人生活。在东部她与很多人约会过。其中她与一个长她几岁的从事相同职业的非裔美国人有过一段很正式的关系。她说：“他是一个出色的男人，感性、浪漫、执著。”他从不由于她的过分自信而妥协。兰妮特在东部时，他们相距五百英里，她回到加利福尼亚后他们就相距三千英里了。兰妮特不在意实际距离的长短：“你飞过来，飞过去，做你自己的事，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如果有人一直在你身边，你可以推迟亲热。”

他想结婚，愿意重新安置生活，也想要孩子。可是兰妮特开始觉得婚姻的束缚了。她担心她会一直比他更成功，比他更能赚钱。她不想承担让他来到加利福尼亚的责任。于是他们分手了。在解释她的决定时，兰妮特援引心灵伴侣的华丽辞藻，虽然她没有用这个术语。

她“选择不定居”，因为他是“不合适的人”。这件事使她意识到结婚、家庭，对她而言，没有“和她能真正沟通、令她兴奋的人”重要。

她对一个朋友说过：“我只想在死前能再次拥有那种感觉，不管那种情感能否使他与我共度50年，我追求的是当那个人走进房间时，我能兴奋不已。”当我问是否拥有这种感觉比持久的关系更重要时，她给予肯定的回答。

第13节：新单身女性(13)

兰妮特的反应说明，在崇尚婚姻而贬低单身的文化氛围中，对于一个更喜欢单身而不愿安顿下来的女性，寻找理想的爱情有助于她的选择合理化。通过如此崇高的、含糊的爱情标准，以及解释个人的感情优先于对婚姻家庭的愿望，兰妮特能够为她的单身生活辩护以便继续寻找“那个人”。

兰妮特承认她喜欢单身生活，毫不犹豫地称自己单身。她说七年前有的时候感到孤独，我问她是否现在还孤独时，她回答不，还开始谈起她自己的“安乐窝”。她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喜欢的工作，还有很多朋友，她积极参与社交活动，与家庭关系密切。

虽然她没有放弃要孩子的愿望，兰妮特坚决拒绝做一个单亲母亲。从小时候起，她就不喜欢黑人单身母亲的名声。现在兰妮特承认要孩子不再是她的头等大事了。她骄傲地指着放在她桌面上朋友的孩子的照片。她没有说与其中哪一个孩子的关系会取代自己的孩子（收养或有血缘关系），但是她说也许很快她就会考虑如何让其中的一些孩子变成她生活中的一部分。

然而，45岁的兰妮特似乎是一个成功单身女性的缩影。在这次采访后不久我从一个知情者那里得知，兰妮特去了南加利福尼亚，从事一项更好的工作。2004年的秋季，就在这本书快要完成的时候，一天晚上我读报纸，随意看到布什政府中的一个高层人物的头像，我偶然读到兰妮特的引言。她已经接受采访，因为那位高官是她的导师和朋友。我好惊讶，兰妮特说过她的朋友遍及美国，可从没提及有政治背景的人。不管怎样，阅读这篇文章加强了我的信念，我采访到令人感兴趣且有个性的单身女性群体，广义上都是中产阶级，但我们也要看到，她们有着相当不同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政治观点。

尽管她事业有成，但在目前的文化氛围下，兰妮特很容易被看成信任和情商有问题的人。人到了四十五六岁的时候，应该找到一位如

意郎君了，如果没有，也要和一个好男人安顿下来，就像兰妮特拒绝的那个人。庆幸的是，她不说任何对自己有负面影响的事，我也发现她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满足的女人。可是没有任何文化依据支持她的长期单身生活，兰妮特害怕她将来会孤独。

兰妮特对我说："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计划者，我已经报名参加长期关爱工程。每当我拿起圣诞节期间的报纸，看到一个无亲无故的老年女人的故事，需要几百美元，她的生命才不会终止，我就对我母亲说'那是我所害怕的。在我85岁的时候，所有的家人和朋友都不在了，因为我自己没找个伴儿，我就这样死去了'。"我想知道为什么用的是"没有个伴儿"而不是"没有孩子"。也许对兰妮特来说他们是一回事，或许因为没有伴侣的女性比没有孩子的女性更容易遭受耻辱。

女权运动，心灵伴侣及单身

理想的心灵伴侣是怎样出现的？它的起源能易于解释它的吸引力和局限性吗？从20世纪中叶开始我就追踪有关单身和婚姻生活的轨迹，70年代早期我曾拜读过激进的女权主义作家的作品，我发现她们表达过类似心灵伴侣的理想在19世纪中期，当婚姻作为压迫女性的枷锁，更多的女性维持单身状态时，美国中产阶层流行寻求心灵伴侣的文化理念。参见柏拉德

朱莎·柏拉德：《"最好的或者什么也不是！"新英格兰19世纪的出身》，参见：《社会史期刊》，2000年夏季刊（第33卷4期），947~948页，下同。。那以后，我还读到她们对异性恋爱情以及对她们提倡的方式：基于更亲密和融洽感情上的更平等的相爱关系——二者不均衡的批判性评论。但我也发现大多数激进的女权主义者都是单身，她们对单身生活没有预见性。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后代初期，在人权运动、新左翼运动、反战运动及反文化运动中，许多骨干分子中的年轻女性与她们的男同事分裂，形成了一个独立妇女解放运动。一些极端激进的群体及个体最初拒绝异性恋爱情、婚姻，批评家庭。在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女权

主义者的圈子里，早期的参与者能回忆起那段时期的事情，如果结婚或者有异性恋爱关系的，她们就会感到尴尬。然而，另一种选择不是成为单身，而是成为女同性恋者。但是拒绝异性间恋爱和婚姻这股风很快就过去了。这又很快遭到像贝蒂·福莱顿那样更温和女权主义者所发起的维护婚姻变革发起者的反对。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和中期，平等的伴侣——不管是异性恋的或是同性恋的——都得到所有女权主义者的高度评价，不过年轻的女权主义者强调婚恋关系中情感的满足。

第14节：新单身女性(14)

舒拉密斯·费尔斯通是早期最有影响的激进女权主义理论家之一，也是批评婚姻言论发起者之一，她改变了从婚姻到爱情的对话体。在1970年她的原创性书籍《性爱的辩证法》舒拉密斯·费尔斯通：《性爱辩证法》，纽约：班塔姆图书公司，1970年，下同。，一本谈论有关爱情的问题而深受大家喜爱的小册子中，她简洁地列出异性爱情是如何成为“被权利的不平等所阻碍、扭曲或玷污的”这一章的“爱”参见费尔斯通：《性爱辩证法》，18页。。但是，费尔斯通要改革爱情，而不是拒绝爱情。她预见了男女真正平等时基于“自我转换”的健康爱情存在的可能性。“在两个平等人之间的爱情应该是丰富的，通过对方能放大自己……彼此能参与对方的存在就像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口。”费尔斯通：《性爱辩证法》，17页。

费尔斯通的爱情观没有强调性爱，她的完美婚姻的观点没有考虑到一个女性没有找到合适男人的任何选择。费尔斯通坚信平等和理想爱情的可能性，与她的贬低单身女性生活形成鲜明对照，她认为单身女性的性革命反而受到男人的利用有趣的是费尔斯通可能利用在第一次女权主义浪潮中对单身女性的否定评价来批评60年代后期的单身女权主义者。她写到20世纪初的激进女性和改革者：“她们投身于不成熟的运动之中，很多人付出一生而毫无回报——只能成为令人生畏的，深受痛苦的，老处女似的那类社会工作者”。。单身女性是“‘年轻女人’的不安定状态……或者成为某个人余生的‘第三者’，用来激怒人家的妻子，证明他的阳刚之气或独立性，被他的朋友们议论为他的最新的‘取乐的’战利品”费尔斯通：《性爱辩证法》，26页。。

另一本书《性敏感区的斗争》在1972出版。作者英格里德·班吉斯26岁，与女权主义群体没有正式联系，她对理想的心灵伴侣的描述超越了费尔斯通，更符合时代观念。《性敏感区的斗争》这本书受到了女权主义者的追捧，影响广泛，后来在1991年再版。班吉斯探寻性与

爱的实质。她想要的是“情人、朋友、知己、伙伴、导师和拥护者，和他做爱会有一种超凡的美”英格里德·班吉斯：《性敏感区的斗争》，哈柏—柯林斯，1991年，101页，下同。。班吉斯清楚地解释了它的实际意义：

我们想得到热烈的而不是稳固的爱。我们想被关心、得到体贴、受到重视，不是抽象的，就像男人经常重视女人的那样，但是日积月累的日常琐碎使生活变得紧张而复杂。我们在男人身上寻找我们在自身上所需要的，寻找力量、多样性、承诺、热情和敏感，人类共性的统一英格里德：《性敏感区的斗争》，224页。。

虽然班吉斯知道她的理想很不容易实现，她还是拒绝妥协。她问道：“我怎么能在渴望温情、沟通、充满热情的生活、健康的亲密，以及外表等这些方面让步呢？”英格里德：《性敏感区的斗争》，216页。

然而，班吉斯叙述了她被男人利用的许多负面的经历，但没有写到男女之间力量的不同及这种不平等如何扭曲爱情的。班吉斯论述了社会规范的改变，论述了她个人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导致她的内心充满矛盾，没有安全感。

我不可能在50岁时还是个完全柔弱的女性，在60岁时成为被解放的、性自由的女性，70岁时变成好战的、反性的女性……我还继续做一个充满矛盾的不确定的人。我相信爱情，也害怕爱情；相信稳定，却生活在一个完全不稳定的境况之中；相信婚姻，我又从没有冒险去尝试……我渴望自由又不懂它是什么。我恨我欲爱时，我爱我欲恨时英格里德：《性敏感区的斗争》，209页。。

尽管她有些理想主义，不情愿妥协，有个人冲突，但班吉斯从未想象过自己一直保持单身。她特别想兼顾婚姻、孩子、工作这三方面英格里德：《性敏感区的斗争》，222页。。《性敏感区的斗争》这本书写成几乎二十年之后，在它的一个新版本的前言里，我们得知班吉

斯还没有孩子，过着长期的独身生活，她成了“相当独立的女性”。她承认没有想到会这样度过余生。

第15节：新单身女性(15)

快到40岁时，我相信尽管我所有的生活现状似乎事与愿违，有那么一天我会发现在自己的家里，同出色的丈夫还有五个孩子在一起，我们团坐在餐厅里吃着丰盛的美食，那是我开始为一个大家庭料理的，有婶婶、叔叔、父母，以及各种朋友，我们聚集在一起谈论着契诃夫戏剧里的人生百态英格里德：《性敏感区的斗争》，xxxiii。。

不论费尔斯通还是班吉斯都没有把爱情的理想和将要保持单身的可能性联系到一起，其他的女性却把追求理想中平等的爱作为她们离开婚姻的理由。乔伊斯·奥伯伦（笔名，1968年就开始投入到女性解放提高意识团体活动中），1970年用这样的一句话开始了她的文章：“两年前，有一个小孩的已婚的我，同另外一个人坠入爱河。”在标题为《真爱胜过安居》的文章里，奥伯伦写到了她决定要离开丈夫，即使她清楚她的情人不想要长久的关系。她知道她的母亲为了婚姻而放弃了爱情，奥伯伦决心放弃婚姻去寻找真爱。同许多在70年代离婚的女性一样，奥伯伦乐观向上。可是其中有许多人惊奇地发现她们自己在80年代三十八九岁时还依然单身。离了婚的苏珊·巴克斯，1985年出版了一本关于自身困惑的畅销书，命名为《这一切不该发生》

苏珊·巴克斯·克里恩：《这一切不该发生：三十以上的单身女性的生活告白》，纽约：康梯组莫图书公司，1985年，下同。。

女权主义者——70年代变革规范的前卫，没有把她们的承诺与找到理想的爱情联系到一起——她们的信念不必安居——增大了保持单身的可能性。如今，年轻的女性或许不了解这种联系，然而崇信这种文化理想就意味着人到中年的女性可能继续寻找心灵伴侣，我认为，这样的结果会不利于她们的幸福。心理学家克伦·刘易斯，一个单身女性，阐述了重视夫妻关系从而凌驾于所有其他亲密关系之上的个人代价：“任何时候单身女性都不会确定她们永远不会结婚。这种模糊性总是给人们带来一丝希望：或许那个合适的人会在下周的某一天，下个

月，或是下一次的假期、下一次的公务会议、在你下次遛狗的时候来到你身边。只要存有希望，就会有莫名的痛楚。”

克伦·盖尔·刘易斯：《生活圈中的单身女性》，见：《女权主义者心理疗法重建》，纽约：吉尔福德出版社，1990年.181页，下同。

因为浪漫的爱情在现代文化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要超越心灵伴侣作为人生幸福的标尺，就需要发展出一种多维的人生观。

亲密情感的另一种观点

现代西方有关亲密的看法超出了分享肉体空间，超出了家庭生活和同床共枕的亲密，还意味着扮演比主要关系中的妻子或是不可忽视的他者还重要的角色。亲密不同于性爱时的身体接触，更确切地讲，如今的亲密关系需要相互间的袒露，情感上的分享，表白你的内心情怀。处在亲密关系中你就会和另一个人之间有深深的理解，心有灵犀。如此心理上的亲密是理想的心灵伴侣的核心，可这种亲密怎么同性爱联系起来则是个更大的问题。

今天“关系”还意味着性伴侣。当我们问某人是否有关系时，我们并不意味着同朋友、家人、亲属、邻居或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心理学家西莉亚·凯兹格尔发现在女同性恋团体中也是如此，“‘你同她有关系吗？’——意思是‘你和她有性行为吗？’似乎是只有性才使关系值得评论。”但这种关系不必满足我们理想概念上的亲密。

已婚或同居了的女性主要抱怨——根据我的研究发现，由数百个其他人证实——她们的性伴侣（尤指男性）“不交谈、不倾听、不‘表露他们的情绪’，不关心、不感兴趣”朗格福特：《感情的革命》，91页。。更为极端的是，意味着长期生活在一起的配偶彼此会成为陌生人。

相反地，社会学家发现婚姻状况好的女性不是把她的配偶当做心灵伴侣，而是当做最好的朋友。友情似乎是保持幸福而长久关系的关键

第16节：新单身女性(16)

。另有研究表明，婚姻状况不好的女性常常用女性朋友来补偿婚姻中缺少的情感亲密

。

如果友谊成了婚姻中亲密关系的模范，或者是对不很完美的婚姻的补偿，为什么友谊不能给那些没有性伴侣的人提供亲密情感呢？尽管友谊没有戴着浪漫或心灵伴侣的文化标识，我们确实把亲密关系当做当代友谊的精华，而把友谊当做亲密关系的主要根源

。劳拉·巴普诺写道："我们想从关系密切的朋友那里得到互通情感的机会，来分享内心深处的隐私，倾听并关心我们的每日忧伤……就是这种情感沟通的愿望使得在研究中一次又一次地提到友谊。"

劳拉·巴普诺：《交往隔阂：为什么美国人觉得如此孤独？》，新泽西：鲁特格斯出版社，2001年.162页，下同。

许多人不是和心灵伴侣，而是和朋友拥有最成功的持久的亲密关系，虽然偶尔心灵伴侣这个术语被用做理想的知己。

然而，在两个女朋友之间的心灵相吸，通常是一种脆弱的结合——脆弱是因为"她们过于依赖对方，并感觉对方是第二个自我"，桑迪·切茜写道。"二者之间任何重要的差异隐含着幻想破灭时的破坏性力量。"

但在多数情况下，亲密朋友没有心灵伴侣那样融入，她们有更多的界限以及在相似和差异方面保留更多的相互影响的空间。同心灵伴侣相比，朋友之间更容易既保持自立又有亲密关系。

后边的章节列举了范例，以此说明友谊和朋友圈在单身女性生活中的重要性，心理学家斯蒂芬妮·多利克表示，摆脱理想的亲密关系的心理能够凝聚更多的人。

懂得你不依靠和你有亲密关系的重要的他是一种极大的安慰。这种人心理依赖会降低人的自我判断能力和自责能力。独立的你能直接

接触生活，用不着在一种等待心境中忍耐……天涯何处无芳草，没有一个会成为特殊的他，但其中许多人让你有在乎的那种内心情感，在意你在做什么，在意某种特别的方式。这让你的生活不再笼罩在神话中，渴望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缺少从中憧憬的快乐，取而代之是趋于定形斯蒂芬尼·多利克：《亲密与孤独》，纽约：w.w.诺顿，1991年，244~245页，下同。。

然而，为了认识到生活中的亲密，如今的单身女性必须各自拒绝心灵伴侣的浪漫理想。这个过程不容易，如同在后边的章节里我们看到的那样。一些单身女性怎么会为了得到亲密而拒绝需要伴侣的观念呢？她们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才能超越玛丽亚和兰妮特所达到的境界——有可能接受她们会单身度过余生？是什么使她们乐观对待这种前景呢？

承认我们和朋友间的亲密关系还存在一个问题：单身女性是怎样满足她们的性需求的。对所有的中年女性来说，拥有满意的性生活都是个问题，但是单身女性没有文化指南，无人指导她们在稳定的婚姻之外，或者独居生活之外如何获得性满足。

很少有小说、故事或神话来描写单身生活不同方式的性行为。

——《都市性爱联盟》

“刺激性的标题，但读后却不是这样，”当我向一个朋友介绍本章内容时，她说。这段话来自洛曼，伊霖森，马罕，佩克和尤姆：《都市性爱联盟》，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4年.235页，下同。“你会看到在性方面失意的中年女性，她们很愤怒，因为与她们同龄的男人在勾引更年轻的女人。”可是她错了——认为大多数中年女性在性方面失意，这个普遍反应也是不对的。我作了有关性生活在单身女性生活中的重要性的调查，使我惊奇的是我收到了各种各样的答复。一位40岁的女性说性爱“过分渲染”，而一个快60岁的女性却说性爱“相当重要”，是生活中必需的。以性爱为重的女性几乎总能得到满足。我发现：真正让人难以琢磨的是爱情，不是性。

我的朋友很可能这么说：“有刺激性的标题，但是女人是不和女人谈论性的；我们谈论婚恋关系，至于性，如果谈论，那只能是对性伴侣说。”我研究的大多数女性都公开地谈论婚恋关系，但对她们的性生活都没有详细地讲。然而，玛拉·戴特维勒和桃乐茜·索娅，以后的章节我写到的两位女性，谈论了很多有关性爱的具体内容。玛拉和桃乐茜享受性爱而不期望得到长久的浪漫爱情，可她们对待性关系也不是随随便便，对一夜情也不感兴趣。这些单身女性追求性爱，对心灵伴侣不抱幻想，可她们还追求有共同兴趣、共同活动和友谊。

第17节：新单身女性(17)

许多单身女性与玛拉和桃乐茜不一样，她们俩对性有清晰的看法，而大多数女性——不管结婚还是单身——宁愿在亲密关系和伴侣关系之外独立地处理她们的性生活。我认为她们的性生活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不是当做效仿的模式，而只是试探性地考虑并解释我们自己的性爱欲望。

女性不愿意谈论性方面的事，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对性欲的迷惑以及性与亲密情感及伴侣的关系。我们怎么知道肉体想要什么？我们怎么知道想要的性关系在道德上能得到认可，在心理上是健康的？如果在渴望的亲密关系中肉体却没有得到满足会怎么样？如何面对我们被某人的性感所吸引，可他又没有达到我们在婚姻或者同居关系中所需要的条件？

如果女性谈及她们的生理需求难以启齿，那么对于性冷淡就会更加困惑，极不情愿谈到这个话题。20世纪中后期的性解放运动认识到了女性的性能力虽独特，却与男人不相上下。然而，这次运动没有探讨在性欲和性行为方面广泛存在的个体差异。独身，曾被传统的宗教团体所推崇，清教文化也自然接受，现在逐渐被当做不健康和不体面的了。直到最近，女权主义者和性解放主义者都把独身当做性领域的一部分，认为它是有意的、道德的，或宗教上的无性行为。结果，几乎没有女性乐于接受独身这个词，也没有几个人讨论它，或者把它作为一种可以改变的境地，或者认为它是所经历的一种积极方式。

如果一个人在她二三十岁的时候过着积极的性生活，但又独身了20多年，我觉得有义务提起独身这个问题——这与参与研究的许多女性相关，她们却很难有机会来讨论。有一位女性南希·迪安，用一种特别的创造性方式表现了她的性欲，而不是和别人发生性爱，这种行为为考虑独身开通了新方式。

因此，我的研究集中表现了单身女性的两种性生活经历——一种是独身但还过着性生活，另一种是有性关系但不需要长久或深层次的亲密交往。两者都不符合规范的文化形式，把女性的性生活同浪漫的爱情或与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之后，发现大多数的女性或男性更喜欢在爱情、依恋或执著基础上有性爱行为。但是独身和有多个性伴侣使单身女性的性生活比已婚的或同居的女性更有特点。

90年代著名的调查《性在美国》显示，几乎有1/3年龄在18到60岁之间的未同居的女性在前十二个月里没有性伴侣——高于被统计的任何其他的团体，根据不同的性别、年龄、婚姻或住宅状况、教育程度、宗教、种族和人种的群体

。更新的调查显示，在年过四十的未同居的单身女性中独身占更高比率根据2003年（由美国退休协会承办的）对3501名年龄在40到69岁的单身者调查发现，60%的单身女性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没有性爱经历（与男人的45%相比）。参见www.aarpmagazine.org.与2001年的没有同居的法国男性和女性的性爱经历相比，结果发现虽然单身美国人比法国人有更多的性伴侣，但却更经常处于没有性伴侣的状态。调查还发现与法国女性的52%相比，年龄超过50岁的78%的美国单身女性在过去的一年里都没有性伴侣。。调查还显示，从未结婚或离婚后的女性一生中比已婚女性有更多的性伴侣。《性在美国》的研究者们得出结论，单身的人们拥有“更多的性伴侣，总的性爱次数较少。”迈克尔，伽农，洛曼和考拉塔：《性在美国：一项权威性的调查》，波士顿：里特布朗，1994年，119，下同。

女人的性爱，我认为，是个性化的。她们特有的性欲有生理上的因素，与性有关的文化观念也塑造女人的性行为

。个人化的性选择出自于复杂的生理互动，与文化观念、社会网络以及她参与的机构有关

。在20世纪的后半叶，有关性爱的文化规范和以前对性有约束作用的婚姻制度一直在争论，处于变化之中。20世纪中叶的性解放运动

是从对年轻的单身女性的婚前性行为持肯定态度开始的，这为我们在21世纪改变对性和成熟单身女性的看法创造了条件。

第18节：新单身女性(18)

超越《性与单身女孩》

《性与单身女孩》成了1962年度的畅销书。37岁的作者海伦·葛丽·布朗（很快成了《大都会》的长期编辑）宣称，“性感女人就是享受性爱的女人。”布朗不仅试图打破男人和女人有双重性标准的看法，还挑战把单身女性看成没有魅力且保守的陈腐观点。她写道“事业女孩是性感的”，“男人喜欢和有头脑的女孩同床共枕”。以轻松的、直率的、实用的写作风格，《性与单身女孩》不仅提倡与待嫁的人有婚前性行为，还要有随意的性爱——一定数量的性行为——对于有工作的单身女性而言。相对于乱交行为，性冷淡以及缺少性高潮更是布朗为之奋斗的不幸的事。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本书是20世纪60年代性革命的缩影——本书的特点是最早公开认可女性婚前性行为是合法的，在其影响下产生了一系列的文化变革，在1960年介绍了避孕药，1973年促使最高级法院对罗诉韦德案的判决，使得流产合法化。有关这次革命，历史学家大卫·埃伦写道，虽然没有中止女性的性宣传，“为争取个人的独立意识，摆脱对性欲和性自由的惧怕心理，为开拓新纪元铺垫了道路。历经长期的奋斗，女性终于可以像男人一样，最大限度地抓住使自己性欲得到满足的机会”。

可是布朗的宣言不是20世纪60年代发出的唯一声音，她的性观念与早期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强调平等的爱不是单纯的性的学说恰恰相反。性爱只是沟通爱情的一种方式，只在一夫一妻制中得到认可。然而，一夫一妻制可以有婚前性行为，是连续的行为。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说，这种理想的爱情演化成了今天的心灵伴侣模式。关于爱情，布朗阐述得很少，可是她对单身女性随意性行为的合法性的看法，创造了现在依然存在的可供选择的模式，这种理念体现在美国有线电视公司播放的，深受公众欢迎的电视连续剧《欲望都市》中。

但是《性与单身女孩》和它的姊妹篇《欲望都市》给四十多岁的单身女性带来了什么影响呢？我想这种启示有积极的作用，但是是有限的。布朗有助于单身女性声称个人生活的完善是合理的，而不单单把家庭生活看做女性个人满足的唯一方面。成功和性感的范例有助于中年单身女性敢于挑战老处女的传统观念。有头脑和性感不再是描绘女性时要禁忌的词了。然而，布朗更强调单身女性用性吸引来追求更多的目标（事业和婚姻），而不只是注重性本身的愉悦。单身女性的“肉体成了主要的资本，她的资源”，希拉里·拉德讷说，“她必须调整自己适应这种消费文化，和异性恋所说的女性模式（她一定是个女孩，漂亮、性感、活泼、恭顺）。”这些特点都能在女孩这个词中看到。

性关系

当今文化大肆宣扬性，女人的各种亮丽形象令人眼花缭乱，年龄在15到35之间的女性讨论婚姻之外的性话题不绝于耳，如婚外性行为，甚至65岁之后的女性也在讨论性。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很少有讨论谈到40到65岁之间的人的性行为，这些人不在性行为活跃之列。我们听到许多有关三十多岁的单身女性有多个性伴侣（如在《欲望都市》中），但是却很少听到有五十多岁的女人还这样。描写性和中年单身女性的书籍没有成为畅销书，因而这方面的话题没有引起大范围的讨论。比如如果一个朋友告诉我，海伦·格丽·布朗于20世纪90年代写了一本有关中老年女性的书我就会很奇怪。我从未听过《黄昏恋》，里面有很长的章节描写的是五十多岁女性的性问题。

在我的研究中，我发现一些四五十岁的女性，追求的性关系包含了志同道合和友谊的成分，不一定是永久或内心亲密关系。我关注了其中两个人的生活，玛拉·戴特维勒和桃乐茜·索娅，她们两人明确表示性爱在她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玛拉有过的婚恋关系（丈夫及后来与一个已婚男人的性关系）没有满足她的性和其他情感的需求。持续了十五年的性关系使她保持了独立自主及很强的个人意识。桃乐

茜经过失败的婚姻之后，第二次婚姻给她带来了性的满足，她沉湎于性爱之中，没有期待得到婚姻或内心的真爱。这种开放的性爱行为使她很平静地接受了与严肃婚姻无缘的现实，只好去面对可能永久单身的生活。

第19节：新单身女性(19)

性表示通向自主、自强

我知道玛拉·戴特维勒还住在那个地方，因为我在公共场合看到过她几次。2003年5月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吃惊地听到了她那欢快的声音："我很愿意再和你谈谈，"她说，"我的生活变化很大。"我和玛拉的最后一次谈话是在6年前，也就是1997年，那时她中风刚刚治愈，中风差点毁了她的事业。1994年我们初次见面时，玛拉已经离婚五年了，但是情感上还与前夫有着牵连。她的前夫比她大10岁，他们同居九年，又有了9年的婚姻。当玛拉6岁的时候，她那酗酒的父亲遗弃了她，她和自己的单身母亲艰难地生存——有时还靠福利生活，我认为这种赤贫的生活至少解释了她的一部分痛苦的缘由。

什么使她重新快乐起来了呢？我没有想到玛拉全力摆脱了两个持续很长时间的性伴侣，因为最近的几次采访中她都没有提到他们。在单身了近30年的时间里，52岁时她第一次约会。玛拉虽认为自己已经"过了好时候了"，但她喜欢引起别人的注意。她那苗条的身材，卷曲的黑发，很平常的脸庞，使她风韵犹在，虽不是那种张扬的美。通过参与社区的自愿性工作及朋友的关系，她同时在与四个男人约会，还拒绝了其他两个人。她自豪地说，这些男人从44岁到59岁不等，有着不同的体魄，来自不同种族、不同的国家，从事不同的职业。对于玛拉来说，约会不单单是性爱的概念，她感觉很自由，因为她不仅能仔细地体验到男人身体上的魅力，同时也看他是否有潜力发展健康的相互间的关系。然而几个月之后，她与一个男人有了包括性生活的特殊关系，但是没有同居，也没有彼此间长期的承诺。

除了失败的婚姻，以及离婚后独自抚养一个十几岁儿子的各种困难，她体弱多病，生活又多不开心，玛拉怎么会这样乐观的呢？追溯到她的童年，有贫穷、父亲的遗弃给她那幼小的心灵留下创伤的原

因，但是她也透露了早年那些开心的事，其中积极的性行为成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玛拉出生在德国，在美国西部长大。为了躲避债主，她的家不得不频繁地搬迁。她父亲工作很不稳定，“因为他嗜酒如命，好色，还是一个赌徒，”玛拉解释道。她还记得家里总是吵架，乱糟糟的一片。她父亲经常离家在外，几个月后，他会捎信儿给玛拉和她妈妈，搬到新的地方去住。她还记得在爱达荷州的一个卡车站，父亲在那里做充气工作，母亲在礼品店工作。她妈妈的婚姻持续到玛拉6岁时，她在加州中部的一个城镇安家落户，拒绝再与她的丈夫漂流。他从来没给孩子任何一分钱抚养费，从那以后，玛拉只见过他一两次。

玛拉和她妈妈住在城镇边一个有补贴的房子里，那里看不到一辆小汽车，也没有公共车辆来往。她妈妈48岁了还给人做保姆，在城镇里来回穿行。后来她买了辆车，但是她们还是很贫穷，玛拉还记得学校里的孩子们笑话她有补丁的衣服和穿破了的鞋子。有一次她患了牙痛，因为没有钱去看牙医，她哭着睡着了。她妈妈不喝酒，不吸烟，也没有找男人，她一心抚养玛拉。“一次，我妈妈用半个小时的午餐时间开了一路的车从市区来到我的小学，因为我们班正在集体表演节目，”玛拉回想道，“我以为我会是那里唯一一个没有家长的孩子。当时我妈妈穿着工作服一路开车过来，听完我唱歌，再开车回去，连午饭也没吃。显然她愿意为我做任何事，她非常爱我。这件事一直鼓励着我。”

为了帮助结束这种窘境，玛拉12岁时就给人看孩子、修剪草坪、送报纸。玛拉说贫穷使她感到很自卑。14岁时，她们的生活有了起色。她热爱学校生活，不久她成为为有天赋的学生准备进入大学的特殊项目里的一个成员。她的妈妈只有小学一年级的教育程度，没办法辅导玛拉的功课，却鼓励她努力学习。虽然玛拉想上大学，想找比她妈妈的更好的工作，但是她也梦想着坠入爱河，嫁给一个很有钱的人，以便能“再也不生活在饥饿和无家可归的恐惧之中”。

第20节：新单身女性(20)

14岁时玛拉开始初恋，一直持续到她21岁。她的男友介绍她与受过教育的中高阶层交往。他的父母安德森夫妇，毕业于奥伯林学院。父亲是教师和剧作家，母亲是有抱负的小说家。他们是60年代放荡不羁的文化人，家中是作家和艺术家的交流中心。安德森夫妇把玛拉请到家里，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她同他们一起进餐、野营，享受这个知识分子家庭给她的氛围。他们还帮助她准备去大学深造，建议她选择什么样的高中课程，如何申请奖学金等。尽管存在着文化差异，去度假或特殊场合时他们总是带上她妈妈，玛拉回忆道："他们令她着迷，没有使她自惭形秽，不谈论让她消极的一面。"由于这个原因，玛拉的妈妈还经常让她在安德森家过夜，也不猜疑玛拉会与男友睡在一起。到她14岁的时候，安德森太太让她服用避孕药片。虽然她的性观念很开放，玛拉还是信守一夫一妻制。

在他们去同一所州立大学前的那个夏天，玛拉和男友决定住到一起。玛拉知道她那"保守的"妈妈会反对。于是玛拉就在她妈妈去走亲戚的那几天从家里搬出。尽管接下来的局面弄得很紧张，她妈妈还是为女儿能够完成学业而自豪。直到几年前她妈妈去世，她们一直保持着很近的关系。

大学三年级时玛拉与男友分手，因为她看到他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没有上进心，懒惰，一直要靠她工作来养家，他经常被解雇，因为他"不想从事一个与他身份不符没有体面的工作"，她解释说。离开他后，她很快就和另一个男人开始了新的关系，但是和那人一起"没有真正的性和谐"。就这样，毕业后她来到了海湾地区。

玛拉的性早熟从来没有像其他年轻女孩那样影响她的独立自主意识和抱负。出生在50年代末、60年代就要来临之时，玛拉受益于文化观念的改变，避孕药具的使用减少了对怀孕的恐惧。但是由于儿时受到贫穷和父亲的不良影响，导致她走进有伤害性的婚恋关系。

在洛杉矶的一家舞厅，22岁的玛拉结识了32岁的杰克·迪安，他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带着两个孩子，一个8岁，一个4岁。玛拉被他吸引有多方面的原因，杰克是“一个成熟稳重、工作刻苦、精力充沛、能保护你的男人”，也是“一位深爱着两个孩子的好父亲”，玛拉解释说。因为他的前妻不忠于他，杰克说他将一直恪守忠诚。“一个没有情人的男人，”玛拉激动地说，“天啊，幸好他不像我父亲那样！”

不到一年，玛拉搬到杰克那里去，发现生活不是像她想象的那样充满诗意。杰克的前妻一旦发现他与玛拉在一起，就来找麻烦。为了支付杰克给前妻的赡养费及孩子的抚养费，玛拉和杰克不得不节俭着过日子。玛拉要一直工作来支付他们一半的生活费，由于没有受更高的教育，她只能找到那些枯燥的、工资低廉的工作。杰克不想再婚，玛拉在他家里的处境尴尬，这很成问题。他的父母和孩子都反感她。虽然杰克是个好父亲，但情感上他不能全身心地对她好。

这种关系维系到了第八年的时候，玛拉发现自己怀孕了。杰克要她去堕胎。30岁的玛拉想要保住这个孩子，可她又想起自己的妈妈那样艰难度日，她不能再去面对一位单身的“未婚”妈妈这个现实。然而，她最终鼓起勇气，给杰克下了最后通牒，他才勉强同意娶她。过了几个月，他们在一个酒乡的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玛拉认为他们结婚就有机会过上好日子。

可孩子出生后不久，杰克就开始有了情人，他向玛拉坦白了这件事。玛拉崩溃了，有一种被骗的感觉。“我待在那里，因为我没有钱也没勇气离开他，”玛拉说，“没有福利补贴，也没有必要的资金来养活我和孩子，我不能重新过我童年的生活，那是一段灰暗的时期。”不久玛拉进入了一家研究生院，成为一名婚姻家庭咨询顾问。这一教育过程对她自己有“很明显的治疗效果”。“我知道我和丈夫的关系是如何陷入困境的，”玛拉解释说，“我们俩都有苦涩的童年，彼此间又捆绑得太紧，可能我们彼此拥有的那种最亲密的关系，同别人再也不会有了。”玛拉一边“莫名地痛苦着”，一边放慢同杰克分手的进程。

第21节：新单身女性(21)

玛拉的自信心空前下跌，她还不能离开他，但是，为了战胜自己的沮丧，她也想找一个情人。她依然相信一夫一妻的生活方式，是出于绝望她才走这一步的。她开始了婚外恋，那个人比她丈夫年龄还大，她对他温情脉脉，那人对她也很好，他们的性爱很和谐，但他不是她的心灵伴侣。这种开放的婚姻——杰克找了一个更年轻的女人，玛拉找了一个年龄大些的男人——持续了六年。玛拉认为这样很不健康，可她找到了心理平衡。然而，杰克对她的这种关系感到愤懑，耳边经常听到他的辱骂挖苦之声。

由于有学历和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玛拉最后从家中搬了出来。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杰克难以接受，他花钱雇了一位出色的律师。在离婚财产分割上，玛拉几乎没分到什么。但是，杰克不像她父亲，支付了孩子的抚养费，也没遗弃他们的儿子。他们成功地分担着照料儿子的责任。

她离婚后，玛拉和男友巴特想在乡村的集体住房住下来。可这种安排不利于她那10岁的儿子，因为这离他父亲太远了，而且巴特对孩子也不太随和。于是玛拉搬到一个距离杰克10英里远的小公寓里住，那是用她离婚所得的财产买的。她找到了一个好工作，在一个乡村机构里做一名心理治疗师，她开始筹建一项小的私人事业。

玛拉和巴特继续保持性伴侣和朋友的关系，可是他们都没有承诺一夫一妻的生活。玛拉也不期望他与自己的儿子有关联。巴特住在另一座城市，周末时他会来到玛拉的住所。对玛拉来说，性爱就是他们之间最重要的联系。

大约离婚4年后，玛拉与詹姆斯相爱了，他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他们是几年的朋友了。玛拉发现她的情感有了回报，这次她与一个有几个小孩、比她年轻的男人开始了长达10年的恋爱。玛拉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有这种婚外情的人了。“他的婚姻很美满，”玛拉说，“他

从来不忽视我，我们俩都觉得这是不幸中的奇迹。我真的把他当做我的心灵伴侣了。”玛拉解释从这种暧昧关系中她得到了什么：

尽管我不想使之浪漫化，但那种关系是我曾经拥有的最健康的一次。显而易见，它包括了忧伤、痛苦和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然而，这是第一次有人真正地爱我，看出我的弱点，看到我的缺点，也看到我犯的错误。他会始终如一地爱我，呵护我，用成熟的方式——比我以前认识的任何男人更爱我。我们都很惊奇彼此的感情似乎永不褪色。

玛拉和詹姆斯基本上每周见一次面，他们没有频繁做爱。在早期的一次采访中，玛拉说没有性生活她就感受不到幸福。“它是人们结合的纽带，”玛拉说，“也是精神沟通的途径。”但是处在心灵伴侣的关系中，玛拉就像我在第一章里所讨论的其他人那样，性不是放在第一位的在对一百对夫妇的研究中，社会学家培波·施瓦兹发现最亲密的内心情感沟通（心灵伴侣）趋于性爱的次数较少。她解释说：“这种最亲密的内心情感沟通形成不是因为性的吸引——激情性爱的一个因素：一心想填补婚姻中两人情感亲密的空白；一心想缩短两人的距离和消灭彼此间的等级差距……夫妻间可以通过对话和沟通来解决这些问题。”（施瓦兹：《你了解的爱情和性爱都是错的》，8~9页）。。再者说，最基本的准则总是保证詹姆斯的妻子和孩子绝对受到保护。“我们做的事没有破坏合法的家庭生活，”玛拉说，“我们两人总有一个意志坚强的，当一个人意志不坚强时，另一个人却能耐得住。”玛拉没有向任何人说过这起婚外恋。我认为她同朋友巴特的性伙伴关系，反倒促成了这场婚外恋，也避免了玛拉迷失自己或陷入曾经同她丈夫那样的状况。

在上次采访她的两年前，玛拉结束了与朋友巴特长期的性爱关系，一年后，她又终止了同已婚男人詹姆斯的情人关系。这两件事都是玛拉主动提出结束的，没有留下怨恨的情绪。现在儿子已经长大，她身体也变得强壮了，精神状态也有所改善，玛拉想寻找不像前两种

那样受限的特殊关系。这个决定是受参与建立良好的社区生活的活动启发而形成的。她开始积极地参与教堂活动、峰峦俱乐部、大赦国际、自愿护理社区花园及成人识字项目，到处可见她的身影。通过这些组织，她结识了许多朋友。“我认为走出去更有可能制造机会结识他人，就是遇不到任何使我心仪的人，我的生活也变得充实了，”玛拉总结说，“要想获得健康的关系，你就不要害怕当这种关系出问题时会怎么样。”这样，目前她尽量去约会。玛拉不是在找心灵伴侣，她想要的是健康的肌肤之亲和性爱的愉悦。她想再过同居生活，但她知道做一个单身女性也不错。“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喜欢我这样，”玛拉总结说，“有一个伴侣真的不错，但我坚信他会真正支持我，能够带给我亲密的情感。”

第22节：新单身女性(22)

不像我研究中的其他独身女性，玛拉主动谈到性欲及更年期对她的影响。“我的性生活变化很大，进入更年期，我的性欲迅速衰退，”玛拉说，“以前，我觉得自己性欲过于旺盛，这点对于女人来说不太常见。现在我或许处于我这个年龄的正常状况。但对我来说是一种警惕，此刻我正在寻找药物刺激的方法。”对于讨论女性更年期之后异性恋以及同性恋性生活的种种复杂的因素的结合——包括生物的，社会的及文化方面。参见朱莉·A.威特尼瑞奇：《性，更年期与文化：更年期性爱导向与对女人性生活的意义》，见《性别与社会》，第17卷第4期（2003年8月），627~642页，下同。

玛拉不合常规的性欲和恋爱生活没有妨碍她成为一个好母亲，虽然她为不时地离开儿子感到内疚，她觉得要想成为一个好母亲，自己还需要一段时间。玛拉和杰克共同处理儿子青春期的复杂问题，他在学校有一些棘手的事，又沾染了毒品和酒精。“这使他的生身父亲和我的关系比以前走得更近。”玛拉说。杰克和玛拉现在是朋友，聚在一起吃饭或是偶尔出去一个晚上散步。虽然考虑到过去想重新回到杰克身边这件事还在伤害她那颗痛楚的心，毕竟他就是玛拉和他们20岁儿子的家。儿子还和她住在一起，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找了女朋友，已经是个懂事的成年人了。

然而，在摸索非一夫一妻这种生活方式的道德性和可行性的过程中，玛拉经历了与单身和已婚人的暧昧关系，这些或是隐秘的或是公开的，她处理不同关系的能力——为了亲密与詹姆斯在一起，为了性爱与巴特在一起，为了家庭与她的前夫在一起——她成长为一个对生活满意的单身女性。不论目前她想寻找既有性爱又有亲密情感的关系是否成功，玛拉已经营造了满意单身生活所需的各种支持要素。一个最初我采访时最不幸的单身女人，在我研究结束时已经演变成过得最

满意的一个了。她有能力拥有，并且行动起来，以性欲为媒介，我认为是一个关键因素。

性关系是单身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桃乐茜·索娅走入房间，看起来非常健康，甚至比八年前我第一次看到她还要年轻（她现在已经快60岁了）。在桃乐茜49岁时，头发焗了色，浓妆艳抹的。但是现在的她依然有着姣好的面容，梳着短发，看起来更自然了，苗条的身材，散发出自信和稳重。当问到是什么改变了她的生活这个问题时，桃乐茜的第一个回答就是她增加了一个体育项目——竞争性强的帆船比赛——她依然喜欢远足和健身运动。重视身体锻炼表明她把重点放在身体的愉悦感受上——对她来说，这能使她过上积极的性生活。

桃乐茜已经离婚（第二次）13年了。她告诉我，在这些年中，平均每年有一次恋情。与我所研究的其他任何女性相比，中年时的她拥有的性伴侣最多。其中有一次桃乐茜与情人的关系持续了两年，有两次她独身了一年多，还有几年她不只拥有一个性伴侣。除了一些失误外——一个男人精神不正常，还有一次在圣诞期间，她和一个男人发生了性关系，仅仅因为她情绪有点低落——桃乐茜从来不与不能建立联系的人发生性关系。她也不与已婚男人有恋情。桃乐茜不随意与别人做爱，但是一旦深陷爱河，她就不在乎这些了。即使她的人生观、价值观与我的有所不同，我开始羡慕桃乐茜有能力找到合适的男人，还羡慕她能从容对待和别人又聚又离的这些关系。

她不是那种放荡的人，她在南方中上阶层的一个传统的核心家庭中长大——她的父亲是个牙医，母亲是个家庭主妇——桃乐茜22岁大学毕业时，成为一个空中小姐，她嫁给了和她第一次同居的那个男人。这场婚姻只持续了5年，桃乐茜解释道：“我不爱那个人，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爱，当时我很不成熟，所谓婚姻一旦身处其中就是那么一回事儿。女人的目标就是抓住男人，有点像钓鱼，你钓上来的那个应该好好照顾你。可惜我们两人都没有沟通的本事。”

第23节：新单身女性(23)

桃乐茜的第二次婚姻——从35岁到45岁——要严肃得多。她嫁给了一个自己爱的离过婚的人。他们俩有很多相同之处，双方又多沟通，但是在身体和性情上也有不和的地方。他有严重的睡眠问题，经常很压抑，与十几岁的儿子之间的矛盾颇深。他没有多少钱，就搬到了桃乐茜那里。不久他情感上变得冷落，性生活也随之冷淡。桃乐茜回忆道："我觉得自己被剥夺了性爱的权利，因为他有严重的睡眠问题，得在另一个房间里睡。我感觉不到爱，非常痛苦，因为我的确很爱他，事实上我又很孤独，有很长时间我不敢说出来。"尝试了五年婚姻咨询，甚至性方面的咨询之后，桃乐茜请他离开她的家。如同第一次婚姻那样，虽然很强烈地感觉到了失败，她还是主动结束了这种关系。

离婚之后，桃乐茜觉得松了一口气，又焕发青春，快乐的种子又发芽了。她继续一个人"工作"，作更多的心理治疗，加入妇女团体，阅读有关自助方面的书。在第一次采访期间，那时她离婚将近5年了，桃乐茜声称自己有了很大起色。她总结说："我现在更自信了，有很多交往，冒了很多风险，清心寡欲，我在养精蓄锐。"

桃乐茜从来没想过要孩子，对她来说这不是个问题。就她母亲而言，尽管经济上有保障，是个全职太太，家务活又有人帮忙，但是她清楚地记得母亲一直都在抱怨作为一个母亲有多难，她付出了多少代价。桃乐茜说："我不想要孩子，直接与我母亲的不幸有关，我潜移默化地感到这会是个沉重的负担，如果有孩子就不可能感到快乐。"

在这两次采访期间，由于种种原因，桃乐茜没有谈到与父母断绝关系，拒绝与他们来往。当父母拒绝和她一起去咨询时，她就再也没有去看他们。虽然她与妹妹的关系密切，多年来她和妹妹的丈夫以及他们两个长大的孩子有联系。桃乐茜缺少成为满意的单身女性的两个条件——很强的家庭观念和与下一代有交往。的确这种缺失解释了桃

乐茜在她四十多岁时“想找到一个男人，和他建立真正完美的关系，一个相互支持的关系”的想法。她不在乎再婚，但是如果她能找到合适的人时，她又想和他住在一起。桃乐茜总结说：“我喜欢性，没有性生活我会很想。”

但是八年后，没找到这样的人时，桃乐茜对保持单身的前景依然持乐观态度。找到一个伴儿“还是我的第一选择”，桃乐茜说：“但是这次要比我曾经有过的好得多，那个人能给我的生活带来色彩。我逐渐意识到我可能找不到合适的人了，但我要继续自己的生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与一个垃圾男人相处还不如自己一个人过。我现在的日子不错，不时有人在这住上一段时间也挺好的，但是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喜欢有私人空间，我真的需要它。”我们不禁要问，她的生活质量怎么样?她真的从不开心的童年和互不来往的父母的阴影中走出来了吗?

桃乐茜有自己的家，在采访期间，她卖了在城里的旧房子，因为它需要不断地维修。她在郊区买了一个小一点儿的却更新的房子，距离她的工作单位较近。新房子离她徒步旅行的小径更近了。她现在养了一条宠物狗，邻里间有了更多的交往。桃乐茜说：“在这我很开心，我把这座房子叫做‘老太太’房，因为能一直把车开进车库，所有的设施都在一个楼层。我在尽力还清房款。这样当我老的时候，就有地方住了。”

在一个与加州大学有联系的研究院里工作了许多年后，桃乐茜从秘书干起一路提升到现在的项目经理，虽然她的工资是大学发的，她需要筹集大笔资金并且要负责这项研究的公共宣传——维护网站运行，编辑出版书目及小册子推销研究结果。她喜欢这项工作和那个小办公室，只有10个人。她唯一抱怨的就是她获取的薪水较低。一直以来，她都是自立的，她为自己从来没有依靠过别人的资助而骄傲，甚至是她结婚的时候。考虑到种种好处和养老金，她想留在大学系统里

工作，也想找到待遇更高的工作。虽然工作很卖力，她却不把工作带回家，这样就保证有时间花在她喜欢的户外活动上。

第24节：新单身女性(24)

同多数参与研究的对生活满意的单身女性一样，桃乐茜有一个好朋友圈。她的朋友都是单身，一些是从未结婚的，另一些是离了婚的。多数是女性，也有几个男性朋友，她与他们从没有性方面的牵扯，也没有浪漫的关系。这些朋友中也有彼此相识的，桃乐茜把他们当做她的大家庭。她总是在节日里受到邀请，还常常举办盛大的圣诞晚会。她和朋友们度假，要比她从前同父母或是第二任丈夫在一起过快乐得多，他们拒绝庆祝假日，甚至也不过生日。

除了这些好朋友，桃乐茜同单位的同事关系随意，但是她不参加他们的社交活动。她已经成了帆船队的一分子，但除了帆船运动时，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交往，他们与她的朋友或工作都没有联系。桃乐茜说："我觉得穿梭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很有趣，我很喜欢这样。"

由于她要比同龄的女性（甚至是男性）精力旺盛得多，桃乐茜很难找到同她一起去旅行的朋友。于是她决定一个人去度假。她选择能遇到他人的环境——地中海俱乐部和欧洲的徒步旅行团体。这两次旅行她都结识了有趣的人。在第二次旅行中她结识了一对已婚的夫妇，后来他们把她介绍给那位妻子离婚的弟弟——她现在还和他相处，尽管他住在中西部。

桃乐茜与其他对生活满意的单身女性不同的是她大胆地追求性爱。"我曾经想如果没有可能和他结婚，我是不会与他上床的，"桃乐茜回忆道，"可是很快我就说'去他的'，绝不会有对婚姻认真的人。我的性爱对象换来换去，以此为乐，再和我一起去游行。"在每一次外遇之后，为了保护下一个情人，桃乐茜都要作一次艾滋病测试，她说："我很负责的。"

桃乐茜通过很多渠道约会男人：体育运动，朋友，邻里帮忙，报纸上的征婚广告，还有网上的速配网站。这种开放的观念令她很容易找到男人——例如，那个同她一起住六个月的男人，那个她约会了两

年甚至订婚的男人，其他一些男人她没有过多地投入感情，只是发生性关系而已。

桃乐茜讲了和一个退休男人之间的事，他就住在附近。他挺引人注目的，又喜欢帆船，还因为他看来很富裕，她想象着和他去旅游。但是最主要的，桃乐茜认为这样“做爱会很方便”。在他们上过几次床之后，他承认自己阳痿，而且服用伟哥也不见效。桃乐茜失望的是他没有事先告诉她，也没有谈到这方面的事。“我想和能跟我说真话的人在一起，我可以和他一起‘解决问题’。”桃乐茜解释说。她相信一个有自尊的男人应该坦率。

性爱使桃乐茜感到惬意——伴随它那种强烈的自身感觉——显然她能平静地对付出现的种种不和谐的关系，或者是她先结束，或者是他主动结束。桃乐茜计划嫁给她在帆船比赛中结识的一个商人。他们床上床下的合拍吸引了她，就像他的富有对她有吸引力一样，但他不是她的心灵伴侣。桃乐茜想着如何卖掉自己在城里的房子，打算搬到三十英里外，同他住一块，而且还在附近找了一份新工作。她早就计划卖掉自己的房子，可这时她注意到他有很多顾虑，于是她推迟放弃原来的工作。当桃乐茜和他面对这个事实时，他承认还没有做好准备。桃乐茜不想和他这样混下去了。“我想我摆脱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虽然那时很痛苦，”在他们的关系破裂几年后桃乐茜说，“我觉得他没有能力承担责任与我没有多大的关系，而源于他的过去，他曾经历了几次失败的婚姻。”

2003年接受采访时，桃乐茜已经和中西部的那个男人相处有4个月了，就是他姐姐同桃乐茜一起参加欧洲的徒步旅行团体时介绍的那位。当林恩到旧金山来看他已经长大的儿子时他来找过她。桃乐茜对林恩一见钟情，他比她年轻两岁，是一名超级运动员（自行车选手，不是帆船成员），非常潇洒。他已经离婚6年了，看起来似乎没有承诺方面的问题。他个性开放。但从一开始，桃乐茜因为预想要形成一种严肃的或是长期的关系而有所保留。林恩是个共和党人，天主教徒，

而桃乐茜是佛教徒，民主党人，选举的是拉尔夫·纳德。她能和一个选举乔治·布什的人走到一起吗？林恩已经从高技术工作岗位下了岗，用了两年时间接受教师培训。桃乐茜认为这种精神可嘉，但是为他能否找到工作以及经济是否稳定而担心。前6年他和他妈妈生活在一起这意味着什么？他说那给他的老母亲和未成年的孩子一种家的氛围。而对桃乐茜来说，这就意味着他没有房子而她却有。

第25节：新单身女性(25)

自从他们第一次见面之后，桃乐茜和林恩开始了频繁的电子邮件往来，并且在电话里频繁聊天。在他们有性关系之前，甚至在第二次约会时，林恩邀请她一起出去度假，他早就计划好了去欧洲。虽然她颇爱出游，而且这次行程听起来也蛮诱人的，但只有他们有过性生活后，桃乐茜才会同意去。林恩抽不出时间到加利福尼亚来，桃乐茜就去中西部过复活节。她不知道57岁的她在他妈妈的房子里进行他们的第一次性爱会是什么样子呢？林恩说过他的妈妈是“通情达理的”，可是桃乐茜首先明确在房子里他要有自己的空间，不能与他妈妈的卧室只是一墙之隔。不管怎样，桃乐茜还是觉得不舒畅。在那的第二天她就对他82岁的老母亲说：“您的儿子看起来不错，但我还不是很了解他。我来这里是因为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去欧洲，我想搞清楚我们是否合适。我不想花几千美元买了去欧洲的机票，耽搁三周的工作，结果却意想不到地糟糕。正常说，我不想我们的关系发展得这么快。”老太太回答说：“好孩子，你可真聪明。”当他们的性生活过得很快乐时，桃乐茜这才解除了疑虑。

当林恩到加利福尼亚来看望她时，他们的性爱过得更加完美，在一起有很多乐趣。桃乐茜谈到她是怎样和林恩进行电话性爱的——她第一次这样做。

在欧洲之行几周后，桃乐茜来还我以前借给她的那本书。她说这次游行说不清楚是什么滋味。她想享受当下，林恩想发展长期的关系。他建议在6个月内在海湾地区安置下来，搬到她那儿，再找一份工作。这使桃乐茜想起她的第二任丈夫的情形，那个被她看做带来灾难的人。即使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桃乐茜也不打算和他有长期的承诺关系。在旅行结束时她把她的想法告诉他，他表现出非常失望的神色，说她“不可救药”。桃乐茜回应道：“我们本不该开始。”

桃乐茜和玛拉与我所研究的大多数女性不同，因为她们有能力把性欲和渴望亲密情感或者长久的关系分别对待。这种并不浪漫的方法给了她们自信和承受打击的能力。因此，她们对新的性伴侣更开放，从容对待，不管他是不是合适的人，也不怕受到伤害。她们不再自信能找到真爱和长期的关系了，控制着自己的性追求目标，这有助于她们接受单身生活。她们把性、爱情、家庭分开的能力使得这两位单身女性面对网上约会以及答复征婚广告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

我研究的大多数单身女性不愿意网上约会，但是除了桃乐茜和玛拉之外还有一些人对此是持开放态度的，因为她们很需要性爱。保拉·利特尔今年59岁，32岁离了婚，之后陆陆续续有过许多一夫一妻的关系，一直持续到54岁。最近这5年她没有特殊关系了。就算对自己的单身生活感到幸福和满足，她还想“至少找一个男人”，因为她的身体还很硬朗。她期望这种关系能给她带来美好的性生活和某种精神上的情感沟通，但是对各种伙伴关系持开放态度，“可能是旅伴，可能是约会的那个，也可能与我住在一起的人”。保拉解释了她决定尝试一次网上约会。或许阅读这些故事能帮助她弄清她的意愿，思考过去是怎样对待性爱和情爱的。她能够像桃乐茜和玛拉那样把性和亲密关系、家庭分开吗?

我所研究的另外一些单身女性——那些对性爱不感兴趣的，还有那些把性爱只能发生在长期的相爱关系里的——她们不会被网上约会和征婚广告所吸引。那些五花八门的约会途径意味着她们不敢确定自己永远不会与任何人有约，因为她们中的许多人得知她们的朋友或同事通过婚介机构找到了伴侣。但是对盖尔·帕莫这个48岁的离婚女性来说——性爱远不如友情重要，网上约会太压抑了。“那似乎在铤而走险，”她说，“我可不愿意去冒险。”虽然很少有这种情况发生，她宁愿通过朋友来约会别人。41岁的两性恋者埃米莉·雅各斯（将在第六章里出现）持相同意见。“独身没什么，我想要情感上的沟通。”她解释道。埃米莉在回答我的问题——她想要什么样的关系时没有谈论性，

她倾向通过朋友介绍的渠道或者两人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拒绝“没有一人是真名”的互联网。然而，像埃米莉这样的独身女性因为缺乏对性的兴趣而找不到社会的支持。

第26节：新单身女性(26)

正确对待独身

20世纪的性革命没有给独身带来应有的地位，它使得性成为衡量个人身份、个人健康和生活幸福的重要指标。“50年前若要一个单身女性承认她喜欢积极的性生活是需要勇气的，”英国作家萨莉·克莱恩说，“如今需要勇气的是说不喜欢性爱。”在过去，甚至是女同性恋的性行为也被污蔑为病态，现在则担心的是“处在长期关系中的女同性恋者缺少性爱生活”。美国非裔作家堂娜·玛丽·威廉姆斯说如今独身受到蔑视，甚至超过了同性恋。“一个同性恋者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比一个实际上独身的人更容易接受。”威廉姆斯总结说。

在20世纪中叶，没有性的生活就是不健康的生活，这种观念已成为社会规范，第一次提出是针对已婚人，很快就被所有成年人所接受。这种性作为基本要素的理念——不是主要为传宗接代，而为了身体和心理健康——结合弗洛伊德把性作为基本的生物驱动的观点，一种自然的冲动，性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流行术语，与每个人都是密切相关的。性学专家和医学博士勒诺·泰弗在《性不是一种自然行为及其他》这本书中，针对性不仅对健康是必要的，同时也是积极的性别标志的广泛流行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我在泌尿科工作了许多年，有人来这儿说“我阳痿了”，我说：“那又会对你怎么样呢？”他们看着我好像我神志不清一样。他们说：“什么，我没办法做爱了！”我就以一种对话的语气，眼睛看着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做爱呢？”他们会对我说：“你什么意思？人人都需要性的呀。”他们就是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他们不能回答是因为词汇贫乏，实在是太贫乏了。有时候有的人会勉强挤出几个字来说：“它意味着我是正常的。”好像不能够有性高潮就不正常。缺少它意味着不能称之为男人，对女人则不然这个引言来自布伦南·莫伊拉：《异性：与什

么都不在乎的性心理理疗师有关性与社会的挑衅性对话》，见：《女士》，1999年8/9月。。

泰弗开了伟哥处方给那些真正想要的人，或给那些希望满足性伴侣的人，而不仅仅为了使男人更觉得自己是男人。

生活在一种大肆宣扬性的文化氛围中，性被当做人的心理健康之必要。如果一个女人（或男人）说自己不喜欢性爱就很有可能被大加责难。诗人桑德拉·蔡登斯坦，结婚46年了，在她和她丈夫过了几年的独身生活之后，发现了一种两人都满意的有规律的性爱方法。那时她鼓起勇气以诗来表达她的性爱态度：

我到了/64岁才开始懂得/如果我不想/手温柔地放在乳房上，/手指轻擦乳头，/一个轻舔，勃起的阴茎/碰撞我的躯体，/我有同样的权利/不要去想/如同他情不自禁的欲望/这种不要去想/是主动的，值得尊重的，/这种不要去想/不是冷淡/做他的好女人。

蔡登斯坦继续问道："读者阅读的感受和我写的时候一样美妙吗，还是很不舒服？自私吗？坦率吗？不是自发的吗？对我而言部分是这样，我一直想成为火辣的性感女郎，有激情的女人。似乎现在——最后——正好……我用了多年来接受而后——更难于——表明这种需要，没有歉意和自责。"桑德拉·蔡登斯坦：《裸露的真理》，见：《女士》，1999年8/9月。我认为，蔡登斯坦决定发表这首诗是受她的已婚身份、性欲旺盛驱动。如果是一个单身或独身的女性发表了这样一首诗，她将立即被污辱为男人恐惧症或性冷淡，一定是糟糕的病态性恐惧症。

最近，大众媒体的多篇文章呈现了这样的迹象：在已婚的两性恋爱和同居的同性恋者中隐藏着大量的独身者

。但这主要被看成是一种不幸的理由，一种性功能障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伴侣中一个需要性爱而另一个不需要性，这肯定成问题，但是双方都同意独身会是个社会问题吗？

这种性爱对于个人幸福以及身体健康是必要的批评观点，以及实际表明不管长期还是短期的独身可能会比以前所知道的更普遍，这些都对性爱的本质提出问题。虽然一些以性为研究命题的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还是把性欲看成纯生理结构或者主要的社会结构，绝大多数人趋向认同人的性欲取决于生理和文化复杂因素的互动作用而形成。另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性动力是有性别差异的。根据2001年的针对多种不同项目的研究调查表明，一般来说，男人的性欲比女人更频繁、更强烈，调查从下面几方面来研究：自发地想起性，性幻想的频率及多样性，有性交愿望的数量，想要的性伴侣的数量，手淫，喜好各种各样的性体验，以及其他方面。那些作者，同时也是心理学家，得出结论："在接近十几项不同的调查里，我们没有发现一个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的性欲更强烈。我们认为综合考虑调查的数量、质量和集中各种证据表明这个结论是无可争议的。"

第27节：新单身女性(27)

这一结论还暗示了女性独身可能会更容易些。的确，这就是作者们得出的结论。他们引用一个研究表明，“对于男人而言，担心被拒绝成为避免性爱的主要原因”，而对于女性“报告显示缺少这方面的兴趣和愿望”

。支持这一结论的另一位心理学家发现，对于女性来说“独身状态不一定是一段痛苦的心路历程”。更确切的是，“对于一些女性来说，那更像到市场去逛一圈”

。然而我们一定要记住，这种概括掩饰了性欲以及独身的原因存在着巨大的个体差异。

尽管这样，对独身消极的文化评价还在继续。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我乐意问起女性的性生活，而不问她的独身情形。虽然有时候是出于自发的，我从不直接问我的研究对象有关独身的事。即使我问过，我猜想大多数的女性会拒绝使用这个词的。在目前的文化气氛下，没有人会称自己独身，很少有人会说她选择或喜欢独身。可接受的说法只是暂时禁欲，正在寻找心灵伴侣。一个独身又浪漫的女性是允许的。

虽然独身有别于纯洁和贞操，由于天主教义把三者联系起来，这种区别变得语义模糊了。90年代披露了大量牧师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性骚扰的丑闻事实，使得独身这个词有了更多的负面内涵。这一丑闻强化了独身是一种不健康状态的文化理念。牧师的独身被看做一种难以达到的欲望——在性压抑和不成熟状态导致的性无能。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是我们要分清被迫单身和特殊时期个人作出最佳选择的单身。基于下面的个案研究和我的阅读资料，我提出了一个可供参考的独身理念。

性感而充满激情的独身

直到最近，作家们成功地尝试了把独身当做一种可行的和快乐的选择，尤其是对中年女性来说。堂娜·玛丽·威廉姆斯的《性感独身》和萨利·克林恩的《女性、激情和独身》两部书尤为重要，其中列举了独身生活的许多益处。

她们提出，没有性伴儿释放了女性，从而使女性专注于自我实现、创造性及个人能力

。“独身肯定会有足够的时间来解决自己的事。”我的一个参与者说。女同性恋研究者临床医学家乔安·罗兰写到了她自己的独身经历——这也适用于异性恋的女性：“不考虑接下来的性关系——是否与期望的一致，是否性爱和谐，是否关系会持续下去，是否这种关系对朋友有意义——因为我自己是自由之身。”

她可以无拘无束地去关心别人——朋友、大家庭、邻居以及更广泛的团体。因此，独身造就的独立自主意识与个体或公众的伦理标准是一致的

。

另外，克林恩表示，独身使女性从枯燥不满的性生活中解脱出来，从而简化了生活，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别的兴趣上，尤其是在工作上。独身能促使精神提升，专心发展更广泛的朋友和家庭圈子；独身使一些女性远离了人与人之间的暴力

。接受独身生活的单身女性对心灵伴侣、男女关系或是性爱都没有期待。超过50岁的异性恋者，包括那些想找到伴侣，但又意识到有成败的可能性的那些单身女性相对于老年女性缺少男性配偶，由于男性的死亡率较高，以及更高的再婚率，事实上男性趋于找相对年龄小一些的女性结婚。，更倾向于在她们的独身生活里显得性感和充满激情，这与玛拉和桃乐茜的做法截然不同。威廉姆斯和克林恩分别介绍了性感单身理念，条件是借助其他的身心愉悦方式——触摸、拥抱、音乐、舞蹈、美食、有刺激性的文化活动——能够代替性爱

。

性欲独身与手淫不同，虽然克林恩和威廉姆斯都反对手淫，她们的观点是肉体的满足不集中表现在性交和高潮上。性调查的结果验证了她们的主张：性活跃的女性比独身的女性更喜欢手淫

迈克尔，伽农，洛曼和考拉塔

：《性在美国》，165页；另一个由美国退休协会对45岁以上年龄的统计发现，77%的没有性伴的女性说她们没有手淫的习惯。

佩尔森在另一个对性幻想的调查中发现有最佳性爱体验的中年人也会发挥最大的性幻想空间。她得出结论："性幻想不能当做缺少性体验的补偿"（佩尔森.埃塞尔·斯柏克特：《性感世纪》，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9年，255页，下同）。。"尽可能地，"威廉姆斯说，"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我都体现出性感，穿着的衣服、睡觉的床单、挂在墙上的画，甚至我的祷告也是浪漫和赋有激情的。一天天地，我学会了通过我的所有感觉来体验生活。"堂娜·玛丽·威廉姆斯：《情感独身》，纽约：费尔西德图书公司，1999年，21页。但是性欲旺盛的女性如玛拉和桃乐茜能够通过性作用促进自我发展。为什么性作用阻碍一些女性实现自我而对另一些却能实现自我价值是一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心理探索。威廉姆斯意识到性只是为了好玩而已，其余的生活就是工作。因此，她曾经完全依靠男人寻欢取乐。现在她放开自己，想尽办法去玩威廉姆斯：《情感独身》，114页。。同样，克林恩认为，更多的对象和活动都能激发女性的感情——艺术、旅行、舞蹈、政治、教士、家庭、亲密友情及上帝。在参与研究的女性中我发现了一个没有性爱但性感多情的绝好例子。

第28节：新单身女性(28)

弗拉明戈舞蹈的火辣激情

49岁的南希·迪恩一直单身，也无子女。一个周日的下午，她邀请我去体验她生活中新的激情展示——弗拉明戈舞。她要为家人朋友表演个小节目——跳舞。最后我找到了这个地方——只有一层的长方形建筑物，低矮昏暗，藏在市郊的一个商场里，与一个按摩场所相邻，上面有一个不显眼的招牌——弗拉明戈舞蹈练习厅这是一个假名，与同名的任何组织没有关系。——表明它的存在。在里面，两面墙上的镜子使这小地方看起来大些，地板上铺的暗色调的油毯显示出更美好的生活。当吉他手开始演奏，舞蹈者随着不连贯的旋律用脚跟踢踏地板，一个普通的美国式的房间现在变成了西班牙南部城市塞维利亚的一个土砖砌的咖啡馆。

为了忘却紧张的工作生活带给她的烦恼，南希每周来这里两次，跳弗拉明戈舞尽情放松一下自己。南希对待工作和舞蹈都很认真。她是一家大型投资公司的股东，由于她开放但严谨地对待业务往来，以及对女客户的诚信而受到尊重。南希披着一头金发，身材苗条，衣着庄重，不浓妆艳抹，说话语调柔和。人们都因知道她脾气平和，有能力处理好各方面事情而敬重她。

只见一个女人在弗拉明戈舞练习厅闪亮登场。她身穿一件黑色的连衣长裙，紧紧地箍在屁股上，附带的还有低到了膝盖下面的飘逸的裙子，南希的红色饰物衬在黑色连衣长裙上非常惹眼——闪亮的深红色口红，大大的绛红色的环形耳环，插在头上的一朵超大玫瑰花。她开始了独舞，只见她挺起身子，眼睛闪着晶莹的光芒，随着音乐不停地摇摆屁股。两英寸高的鞋跟随着复杂的旋律敲击着地面，南希摆动上肢以优雅的舞姿摩挲她的裙子，然后双手抬过头顶，手指在空中优美地划出曲线，手腕弯曲成漂亮的拱形。

“你怎么，”表演结束后我问南希，“会跳弗拉明戈舞呢？”她回答说10岁那年，她姐姐和高中同学一起去西班牙旅行，给南希带回了一瓶称做玛哈的西班牙香水。瓶子前面是穿着弗拉明戈舞蹈装的一个女子的图片。“那种香味对于在加利福尼亚长大的中产阶级白人女孩来说非常有异国情调，”南希说。不时地，长大成年的南希会在电影和公共广播电视的几个专题节目里看到弗拉明戈舞。“我怦然心动了，”她说。但她从没为此做过什么，直到40多岁时她在当地教育节目里看到了一则西班牙舞的培训班广告。那里教的民间舞有点“弗拉明戈的意思”，而不是纯粹的弗拉明戈，但南希喜欢这个学习班，她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参加了三四次。每一次，她都能多学一点儿复杂的舞步。班里的一个同学告诉她，弗拉明戈舞练习厅有更高级和更专业的培训。就这样她一直在那儿学，现在差不多有5年了。

9年前，我第一次和南希谈到单身的话题，那时她40岁。那以后，像现在一样，南希清楚地表明她从来没有故意选择不结婚。她的生活还谈不上安定下来，虽然完成了工商管理硕士的学业，但还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最近她同一个爱过的但爱骂人的男人分手了。“我本该和他两个月后就分手，而不是两年，”南希说道。同我所采访的其他女性相比，南希声称她对自己的单身生活很满意。

现在我已经一个人生活16年了，从二十三四岁时开始的，我的确喜欢这样子。在生活中我之所以高兴，其主要原因就是我能照顾好自己。我这么做强化了我的自我意识、性格意识以及自己的力量意识。我喜欢独处。我喜欢进来就把东西放下，或者进来就把东西放好，我想怎样就怎样。让我放弃这种自主性会很困难，虽然有时我也会渴望情感的联系及忠诚的伴侣。

早在5年前，她35岁左右，南希患上慢性疲劳综合征，还得了几次肺炎，病病歪歪地熬了两年。即使这种艰难的处境让她觉得很脆弱时，她也为自己能拜访朋友，从困境中挺过来而自豪。她的单身生活变得越来越稳固了。

作为教师家庭里5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南希在加利福尼亚的中心山谷长大。她的妈妈结了两次婚，又离了两次婚，与第一任丈夫有3个孩子，南希和姐姐是她第二任丈夫的。南希14岁时父母离异，她的母亲没有再婚，她父亲的第二次婚姻也很快夭折。就是离婚之前，她的家庭生活也谈不上温馨。“家里有太多的沉默，”南希解释道，“许多看法和感情都不能表达，甚至要离婚也没人告诉我。一天早晨我走下楼时，我父亲正在整理他的东西。”

第29节：新单身女性(29)

那次父母离婚之后，南希感到更加孤独了，因为没人把她“放在心上”。她妈妈去了纽约，南希和姐姐同父亲和父亲的新婚妻子生活在一起。南希和继母相处不好。离高中毕业还有三周时，她父亲就把她轰出家门。那个夏天她和朋友们住在一起，而后就上大学了。她的父母供她上学，但她再也感觉不到自己有个家。南希刚刚30岁时，她母亲去世了，她和她父亲的关系依然疏远。

那些有不幸童年的单身女性，她们把感情投资在找婚恋关系上（参见第四章），南希变得很自立。她不仅喜欢一个人生活，还喜欢一个人去旅行。1994年她骄傲地实现了独自一人去欧洲的旅行。2003年她时而度过几个没人陪伴的假期。她喜欢制订自己的旅游路线，按自己的计划进度行事。作为一位独行的旅行者她遇见了许多别的游客，经常同碰到的一对夫妻，或另一位单身女性、男性游览一天或一周。

40多岁时，南希创造了许多能使她过满意的单身生活的条件。在她喜欢的领域她获得了一个长久位置。她买了一所房子，距离她哥哥家只有几个街区远，又重新和住在附近的两个姐姐取得联系。现在她们兄弟姐妹四人以及其他一些有重要关系的人一起度假。南希为这个重新建造的家庭而格外兴奋，这里有她的近亲属，包括她的侄女、侄儿，她和他们保持亲密的关系。另外，南希还营造了一个朋友网络和几个团体——一个围绕她的工作岗位，一个在弗拉明戈那里。两个社交圈子开始重合。在舞蹈表演场地，她把我介绍给一些同事，包括公司的副主席。当我问南希有关这些到场者时，她回答说在和同事的谈话中顺便提到了舞蹈，她们要南希邀请她们去看舞蹈演出。最初，因为考虑到弗拉明戈涉及到她的部分私生活，她不想带她们去那里，因为那是一个远离工作的地方。可是现在她很高兴已经克服了那种感觉。她的交际圈融合了工作和私人生活，表明她更加接受自己了。

是跳舞，不是工作、家庭、朋友或社交，使得南希的生活充满了活力和歌声。舞蹈唤起了9年前遗忘的快乐。看过跳舞后的几个星期的一次采访中，我问南希跳弗拉明戈舞对她来说是不是一种性感交流方式。“我不知道是否该用性感这个词，”她回答道，“但它无疑表达出纵欲、激情、欲望、情感。所有这些使得我成了一个性感的人。同伴侣间的性爱是美妙的。”她继续说，“但这是另一种表达同样活力的方式。”南希欣赏弗拉明戈舞的情感化，能表达从“世俗的快乐到对命运的强烈不满以及这两者之间的一切”。虽然南希说她已经独身一段时间了，她不会标榜自己是独身。弗拉明戈舞中释放出来的纵欲和激情有利于她那没有长久情人的单身生活。

通过舞蹈来表达情绪似乎对一个成长在无法表达感情的家庭里的女性来说完美无缺。舞蹈强调独舞和群舞，而不是两人一对，象征性地支持单身生活。虽然男人也跳弗拉明戈舞，他们很少和女人结伴，如果结伴，也不把舞伴看做像在古典芭蕾舞或拉丁舞如探戈中的那个样子。弗拉明戈鼓励成熟和年老的女性跳舞，而不是让女性从属于男性。它是以重在自我为特点的舞蹈。

弗拉明戈的感情力量来自表演者自身沉浸（原文如此）在艺术中，呼吸着艺术生命。弗拉明戈是一种深深地表达亲密情感的艺术形式，这就是弗拉明戈与典型芭蕾的区别。这两个动作正好相反，芭蕾是置身于空中，追求轻巧，移动中几乎没有重量，通过身体灵敏的技巧盘旋；而弗拉明戈舞是全力向着地面……舞蹈扎根在地面上，好像那里有强大的磁铁引力玛德琳·克劳斯：《养女克劳斯·施耐德.安达卢西亚的吉卜赛舞蹈和音乐》，俄勒冈：阿玛迪斯出版社，1990年，95页，下同。。

南希的舞蹈教师给她起的艺名叫科里斯巴，西班牙语的意思是“火花”，或是给舞蹈点火的人。弗拉明戈，实际上是南希生活中的火花。她摆动身体表达强烈的欲望和激情，有时表达痛苦和愤怒。南希把这种性感的舞蹈和她的单身生活结合起来映照出，也强化了她的自尊、

个人力量及自主性。代替寻找心灵伴侣，南希已经找到了一种表达深情的方式，这来源于与自己的世界完全不同的民族和民间体验，它们娓娓地向她道来。

第30节：新单身女性(30)

强调性生活，而把独身打上不正常、古板、性冷淡、清教徒似的和禁欲的烙印，在这样的一种文化氛围里，有人会轻易责怪南希的性生活。那些信奉流行心理学的人认为她害怕情侣关系，有承诺恐惧症。他们可能会说弗拉明戈舞表达了她父母对她的冷落以及对前一个爱人谩骂的愤怒。如果他们的分析属实又会怎么样呢？这会使南希感受到的满意生活无效吗？多年的心理治疗或不断的网上约会对她会是更好的选择吗？我们能说只有她找到了一个亲密的性伴侣后她才会真正的幸福吗？或者我们能够称赞她把富有性感的方式渗透到她成功满意的生活里吗？

我研究的其他把性欲同生活联系起来的独身女性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式。单身母亲喜欢孩子那肉乎乎的身体，宠物为其他的单身女性提供了身体接触。有一些女性在田园和自然中找到了使感官愉悦的途径。一些女性不太性感，还有的女性很向往但还没找到除性关系以外的方式。我们在第七章里会遇到一个48岁的单身母亲盖尔·帕默，她说通过手淫来定期释放身体性欲，但是她想要的是与性爱相关的拥抱和触摸。

性方面的调查证明了独身对很多单身女性适用。《性在美国》显示，“调查结果推翻了没有伴侣的女性性受挫的理论，相反，我们发现没有伴侣的女人或男人更少想到性，他们没有性也过着很快乐满足的生活。”迈克尔，伽农，洛曼和考拉塔：《性在美国》，87页。1999年，美国退休协会进行的一项关于美国45岁及以上人群的性观念和性实践调查发现，他们“印证了同家人朋友的亲近联系对他们的生活质量比满意的性关系还重要”苏珊·杰克比：《伟大的性：它的时代特点是什么？》见：《现代成熟期》，1999年9/10月，43页，下同。。

现实地估量到不可能达到心灵伴侣的理想，南希·迪恩、玛拉·戴特维勒和桃乐茜·索娅成功地对待她们的性欲。把性欲、性同心理上的亲

密或长久的关系区别开来，她们找到了多种多样的不同方法满足性爱、亲密和对家庭的需求。她们强有力地掌控着自己的性欲。我研究中的另外一些女性——如在更广大社会里的那些——更加困惑，不确定及对自己的性生活感到矛盾重重。

从对性的反应中，从她们对性生活的满意和不满意中，单身女性与已婚女性没有多大不同。然而，性得不到满足的单身女性与有配偶的女性相比更公开化，这样她们被标榜为可怜的牺牲品使她们更容易受到伤害。但是单身女性有更多的社会空间和文化支持去找到解决的办法，因为对她们来说，不管独身还是同居，同已婚女性相比更易被社会所接受。

为什么玛拉和桃乐茜会有如此强烈的性欲，而且会这样接受她们的性需求呢？为什么南希会创造性地把弗拉明戈这种性欲发泄的做法与独身生活结合起来呢？目前性科学及性社会学和心理学还没有对这种个体差异做出解释，他们也不能够辨明生物学和社会生活交织在一起各有特色的路径。虽然不能作出解释，我们也可以肯定这样的性、性的活力和多样的性。

我们可以做出更清醒的决定，

我们可以运用更明智的战略，

我们可以更充分地理解后果。

——佩吉·欧伦斯坦《流动》

人到中年成为一名新单身女性——那就是说，接受自己的单身状态并能快乐地生活——这有一个漫长而且常常内心常常充满挣扎的过程。虽然我们没有有意选择单身，但是我们却做出了一系列的选择，引领我们走向目前的生活。

20多岁时，我们中的有些人选择了投身事业、政治或非传统的冒险行动。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找到满意的工作或闯荡人生，由此发展强烈的自我意识。假定我们30多岁之前生活伴侣就能出现，我们中间一小部分人不但追求非传统的婚姻，而且愿意尝试核心家庭之外的

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到我们三四十岁的时候，我们中有些人选择做单身母亲，假定我们不受生物机能的影响，会更容易找到一个伴侣。其他的人则坚定地选择不要孩子。之后我们有些人又选择离开了被虐待的关系或是令我们窒息的婚姻。不去寻找生活中的伴侣，我们专心发展事业，抚养孩子，寻找另一个可提供支持的来源。我们中有些人会被我们爱慕的伴侣抛弃，使我们觉得感情受到了伤害，失去了信任感，但是我们度过了这些生活的磨难。我们中的许多人经历的不只是一种坎坷。但我们谁都不会想象到自己在40、50或60岁的时候还单身。当然我们也没有想到作为单身女性的我们也没有感到孤单，会过着充实又满意的生活。我们同传统文化信息——一些人根深蒂固地认为——幸福取决于找到伴侣的观念作斗争并超越它。

第31节：新单身女性(31)

在整个30岁、40岁，以及向50岁迈进时，我们许多人都在坚守理想的心灵伴侣的理念，但是我们没有花大部分时间去寻找，而是在营造自己的生活。营建的许多社会支持因素与那些已婚女性建造的相似。但是，作为单身女性，我们通过文化不太认同的因素——亲戚朋友的帮助来达到目标而不是通过伴侣。常常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在为建造可行的单身生活添砖加瓦，在50岁时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当走出伴侣这种禁锢时，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很满足。

在下面的篇章里，我追踪调查了一些女性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使之走向单身的，其中的一位一直单身，有两个是离婚的女性，还有一个是我自己，以及我们为自己营建的支持因素。我们四个人代表了我研究中的新单身女性的多样化。我们中有三个是白人，一个是非裔美国人。有三人是母亲，其中的一个是女同性恋者，那个没生育的下定决心不要孩子了；一个是几乎没有过家庭的；另一个生活在大家庭中。就家庭来说，有三个生长在中产阶级家庭，另一个出生于工人阶级；我们两人的母亲是全职做家务，另外两个的母亲外出工作，同时也做家务。

我们四人做出的人生选择以及我们给自己创造的支持因素是所研究的其他单身女性生活的一个缩影，包括在后面的章节我要讲的那些人的故事。

对生活的选择造就长期的单身

我们的选择有其历史特殊性，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做出的。1965年后，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尤其是那些妇女运动以及为新生活方式辩护的革新文化提倡的理念，使得我们所有人的选择都成为可能，部分的选择由此塑造而成。这些变革思想与更传统的理想婚姻和家庭生活观念共存。在将来，不同或更广范围的选择可能会推动单身生活。而且，这些都是中产阶级的选择，以经济上至少适度有保

障、受过高等教育、属于白领阶层为先决条件。然而，我们没有任何选择一定意味着我们不得不保持单身状态或成为新单身女性，有配偶的生活也可以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是做出这种生活选择的女性不太可能花费过多的精力去寻找伴侣，她们也不太可能为了找到伴侣而委曲求全。

选择非传统的生活

选择非传统的生活方式或许与那些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的成年女性最有关系了，那时与今天的情况不同，核心家庭控制着个人生活，还有70年代、80年代早期选择离婚也不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和吉莉安·海尔德一直单身，选择不结婚但选择前卫的生活方式。瓦努娜·拉·布兰克和朱丽叶·科恩这些是虚构的名字，她们的身份识别特征已经改变。在1980年离婚，这种做法在她们的社交圈子里属于非传统的行为。

选择不结婚

吉莉安个子矮小，容貌漂亮，精力旺盛，在社区大学教历史和跨学科研究。1994年我第一次采访她时她54岁。她热爱教学，有自己的家，经济上有保障。从我听到她的故事，到接下来跟踪调查了8年，我看到她同我的生活经历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我俩都是1940年出生，来自中西部，吉莉安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里的独生女；我则是有类似家庭背景的三个孩子中的老大。我俩的母亲都是由基督教徒变成了天主教徒，都是全职家庭主妇；我俩的父亲都是专业人士，我的父亲是纽约州北部的康奈尔大学农业学院的教授，她的父亲是俄亥俄州的一个工业化农场城镇的律师。我们的父母认为自己的婚姻很和谐，信守婚姻直到白头偕老。吉莉安说她母亲在50岁时寡居，但她的第二次婚姻更美满。然而我们从十几岁起，都拒绝母亲的生活方式，我们都不想成为家庭主妇，就像我们感觉到的，她们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家庭生活而丧失自我的独立性。无独有偶，我们只是这一代人中的一部分，还有不少

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中产阶级成年女性，受过高等教育，但不想再重复我们的母亲的那种生活历史学家鲁思·罗森在《分裂的世界》（2000）第一部分阐明了这一点。以一个来自工人阶级家庭背景的黑人女性有同样的反映为例——拒绝复制她妈妈作为家庭主妇处于从属地位的生活——参见胡克斯：《关于爱情的全部》，第2章。。

第32节：新单身女性(32)

在我17岁那年，我对母亲说我从不想结婚。这不意味着我想一直单身，当然也不想成为老处女，我只是不喜欢她的那种生活方式。我母亲是个出色的厨师和裁缝。她为她的三个孩子做衣服，整理花园，做罐头食品，同朋友们玩桥牌，但她总是很消极。她不断地埋怨我父亲不回家，唠叨着要我把鼻子离书远点儿，责怪我长发凌乱，没有淑女的样子。她甚至贬低自己，说自己没有大学城里其他主妇聪明。我父亲却相反，他喜欢他的工作，每每到家，他的笑声和热情使他比母亲有趣得多，我更喜欢他的那种生活方式。我也需要事业，虽然我知道没有哪个女性的生活我可以效仿。这种惆怅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我在30岁时经常做噩梦：我被强大的力量卷到了郊区，不能抵制爱情和孩子的诱惑。我过起了事与愿违的生活，这使我痛苦不堪。

少年时的吉莉安，没有好好地想过将来，只知道不愿过她母亲的“狭窄而传统的生活”。吉莉安想逃离中西部，到东部或西海岸的大城市过更令人兴奋的生活。然而她父母催她进入了附近城镇的一所天主教学校，吉莉安在大学三年级时拒绝了一次求婚，之后到波士顿攻读硕士。对吉莉安来说，研究生学业不是她通往事业的道路，但促使她踏进一种文雅且更不拘于传统的生活。上世纪50年代大城市里兴起的垮掉的一代以及颓废派文化，性革命运动及60年代总的突变，为吉莉安探索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可能。

我确实想要事业，但是现实中的文化信息清楚地告诉我：对于一个女性，事业和婚姻是不能兼而有之的。大学时代的男朋友和我在1961年分手，那时我在康奈尔大学读最后一年，大学的第一年他就离开了医学院。他知道我要继续求学，想拥有自己的事业，也知道我在他们学校会很痛苦，因为那儿没有重点研究生院。他知道作为事业女性的我将会是一位糟糕的母亲。我眼含热泪地抗议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并不奇怪，因为我的大学教授没有一个是女性。我还不曾认

识过有事业的女性。不久我们就分手了，我申请到一所研究院深造。如果他不那么传统或更通融些，我是不是已经和他结婚了？这样行得通吗？我永远也无从知晓。

1962年春天，我接到了来自芝加哥大学的一个电话，电话里的那个人说那所大学正考虑提供给我一份学术奖金，他还想知道我是否打算结婚。我诚实地说没有，我得到了学术奖金。但这个意思很清楚，这次它出自权力机构。

这样的文化信息使我的选择变得复杂化。我接受男朋友和教授们的说法，事业和婚姻不可兼得。我坚持这种观念直到这种文化开始改变。1963年，在我读研究生的第二年，贝蒂·福莱顿出版了畅销书《女性奥秘》，在书中她主张女性要同时拥有婚姻、母亲身份和事业的权益，我认为那不太可能。对我有影响的则是她拒绝全职家庭主妇的模式，强调走出家庭、从事全日制工作的重要性。我很高兴新女权主义运动能够使女性事业合法化，但我想寻找另外的方式把事业和一种非传统的个人生活结合起来。单身就意味着没有性生活的处女，那是令人生厌的。我受到这种前卫文化模式的启发，如同吉莉安从中受到启发一样。

颓废派一直吸引着我。当我只有18岁时，我就意识到我会比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遇到的困难更多。然而，上世纪60年代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蒙·德·波伏瓦提出了一种有吸引力的方式。她拒绝结婚或同居，但却同哲学家让·保罗·萨特保持着伟大的不为痴迷情感所苦的爱情关系及不受婚姻关系羁绊的理性的伴侣关系。根据她的事例，我及其他一些第二次浪潮的女权主义者成为现在广泛流行理念的早期宣传者：彼此平等的心灵伴侣。后来我从传记中知道的一切使我的幻想破灭了，尤其是迪尔德丽·拜尔写的传记《西蒙·德·波伏瓦》，波伏瓦同萨特的关系是多么的不平等，经历了多少冲突，多少不满啊！我也如此，几次尝试着和心灵伴侣形成非传统的婚恋关系，却都以失败而告

终。30岁出头时我与一个人的同居生活使我失望至极。只有在我写这本书时，我才意识到这种理想既有吸引力又有不完备之处。

第33节：新单身女性(33)

我远离我母亲的生活，对配偶的不同看法以及我的事业心致使我偏离传统婚姻的轨道。30岁时，我获得了博士学位，我拒绝了一位会成为好丈夫的律师，因为我不想跟他到中西部去做一名政治家的太太。虽然我们有许多共同兴趣和价值观，但他既不是我的心灵伴侣，也不是伟大的爱人。更何况，那个我被卷到郊区过着传统家庭生活的噩梦还在困扰着我。

吉莉安在二十八九岁到30岁时的生活比我的选择更需冒险精神，事业缺少一些规划。1965年在波士顿完成硕士学位后，吉莉安自己驾车来到了洛杉矶。在那里，吉莉安经历了两次各十年的同居生活，第一次从25到35岁，另一次从39到49岁。吉莉安与第一个同居的男人结婚，仅为了得到他一张绿卡。她不把自己当做离异者，婚姻从来不是、现在也不是她的目标，因为对她来说，婚姻意味着失去自由，过她母亲那种狭隘、传统的生活。与她同居的人没有一个是“心灵伴侣”，但在两次的婚恋关系中，吉莉安享有很多自主性，尤其是第二次，她和拍拖者有各自的房子。她喜欢平日里有私人空间，周末一起共度休闲。虽然这两种关系都“挺不错的”，却也存在问题，吉莉安选择了结束这两种关系。

我只同居两年，但却在集体家庭里生活了8年。从37岁到45岁，我同一位年轻些的女权主义社会学家和她的伴侣（后来成了她丈夫）拥有一套两联式公寓。我们在70年代后期合买的房子，明确的目标就是要住在一起，但没有性的实践。我们每个人都有独自的空间，但我们是在一起吃饭的。这样我们成功地创建了一个家，成为朋友网络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在8年的关系中，我收养了一个小孩儿，我的同居密友——那个社会学家生了一个孩子。两个都是男孩，他们相差9个月。

当我决定进入一个集体家庭成为一个单身母亲时，我没有考虑到有可能会永久单身。一个客观的局外人或许会说：“你上次的严肃关系

是同暂时住在伯克利的那个离异的学者。他住在偏远的城市，有个不错的工作，孩子在读大学，而且不想再婚了。可是你们却没走到一起。你怎么能想象找到一个中年男人能或是想要插进一个苛求工作的单身母亲所在的集体生活里来呢？”那时我才没那么现实。那时我一直相信我能找到伴侣——如果不是心灵伴侣，那至少也是有平等关系的人。

然而，由于抚育孩子，我就没有多少情感空间去寻找伴侣了。的确如此，尤其这个集体家庭有了孩子以后，情况就不太好了，不想或不需要照顾别的孩子。而且我们对抚养孩子的观点不同，这是以前我们从未涉足的话题。尽管时而一起，时而分开做心理治疗，我们的家庭还是发展到了敌视的“离婚”地步，我们的团体解散了，我4岁的儿子也和他的小“弟弟”分开了。这个家庭比我最长的浪漫关系持续的时间长了一年多，而这次比同以往任何男人的破裂所受的创伤要深。

这样，在我45岁、吉莉安49岁时，我们发现自己试图营造一个非传统婚姻的想法失败了。我们都买了房子，结果却形单影只。我们都无法想象永久的单身女性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选择离婚

49岁的瓦努娜·拉·布兰克漂亮时尚，是一名非洲裔的美国律师。瓦努娜戴着大帽子，佩戴很多珠宝，走起路来风骚地摆动着臀部，却非常关心业务。和吉莉安、我相似的是，瓦努娜也出生在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稳定的家庭，但她来自工人家庭。瓦努娜在旧金山长大，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她父亲的去世宣告了父母57年的婚姻也随之终结。瓦努娜的母亲（未受过教育）是个家庭主妇。瓦努娜18岁刚出高中校门时，就嫁给了35岁的远房表兄。他是家里的朋友，同她父亲一起在建筑公司工作。她19岁时有了第一个孩子，她一共有四个孩子——两个儿子和一对孪生姐妹。瓦努娜和她的丈夫断断续续地住过旧金山及大海湾区的一个农村地区。在这两个地方他们都有超大的家庭网络。瓦努娜一直都工作。在孩子还小时，她晚上11：00到早上3：00在外面做

打字员工作，后来做过秘书和管理助理。她刚刚30岁时，业余时间修了大学课程。那段时间，她家住在一个乡村农场，瓦努娜负责饲养鸡、奶牛、管理花园，还要做饭、洗衣、辅导孩子。

第34节：新单身女性(34)

35岁时，瓦努娜离开了丈夫。那时她的孩子年龄从11岁到17岁之间，她还是一位秘书，没有获得学士学位。她的丈夫打骂她和孩子，因为她羞于说出在家庭受虐待之事，她母亲责怪她离开丈夫，一年没和她说话。不管是她那大家庭还是小的家庭都谴责她，与她断绝来往。他们都说女人不应该离开丈夫。瓦努娜回忆离婚以及离婚以后的处境：现在“家庭”对她来说，仅仅意味着她和孩子。

离婚后，我们的家庭平静了。孩子们知道当他们回到家里时，不会再有打架，不会再有叫喊，他们知道当我说我们要做什么时，我们就去做什么。好像他们都减轻了压力。尽管有来自外面的侮辱，但我们的家庭条件改善了好多，他们会告诉你百分之百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处境也改善了。如果我不离婚，我们就无法活下去了。那样也许我会死去或是精神崩溃，我的孩子也不会特别健康了。我一点也不怀疑我会重新好起来。我的做法会有点不同，但我会振作起来。

我探究瓦努娜为什么能下决心离婚。当我问到女权主义时她笑了。1980年她还没听说过这个词。后来，经过了大学教育，她成了一位忠实的女权者。在她离婚的时候，她一个单身的黑人女性也不认识。在她的超级大家庭里，每个人都是天主教徒，都结婚了。后来有4个表兄妹也离婚了，包括两个曾经躲着不和她说话的。她父亲虽然有时会喝醉酒，但从来没有打过她的母亲。所以瓦努娜知道家庭暴力不一定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大概最终成全她离开丈夫的因素就是她对就业情况和经济情况的无知。瓦努娜离开前没有攒下一点积蓄，她也没预想到她的前夫切断了对未成年孩子的经济援助。

最初的几年打拼是很艰苦的，家庭收入依靠三个孩子放学后到快餐店打工，加上她当秘书的微薄的收入。她和另外一个离婚的妇女交流经验：当无法准时偿还抵押贷款时，如何避免取消抵押品赎回权。

她经常处于恐惧之中，但逐渐地，有了孩子们的经济帮助及她自己升到了助理管理的位置，她的生活步入了正轨并继续自己的学业。

朱丽叶·科恩看上去与瓦努娜相反，她高高瘦瘦的，是一名充满活力的创办基金官员。她是犹太人，还有点男人气。她也是在1980年离婚的，与瓦努娜是同一年，那年她32岁，比瓦努娜小3岁。朱丽叶离婚时，女儿4岁，她的继子10岁。过了几年，朱丽叶35岁的时候，她成了女同性恋者。与瓦努娜不同的是，朱丽叶的离婚得到了家庭和朋友的支持，但成了一名女同性恋者显然属于非传统的行为。

朱丽叶生长在长岛郊区的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核心家庭，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她的父亲是个中级商务管理人员，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他们都是平凡的犹太教信徒，属于罗斯福民主党派。朱丽叶不仅受有工作的母亲影响，还受到祖母、外祖母的影响，她们一辈子都在做家庭小本生意。就在朱丽叶填写大学入学申请时，她的母亲劝说朱丽叶尽可能不要选“家政学”这个专业。虽然她的妹妹、弟弟都属于传统型——分别在20岁和21岁时结婚了——朱丽叶却是个叛逆者。她去了加利福尼亚，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读大学，后来到伯克利研究生院攻读硕士。不论在本科还是研究生期间，朱丽叶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她是学生民主社团的早期成员，后来又是其他的左翼和反战团体的成员。

1973年，她在伯克利的一个政治团体遇见了他，当时他们都是研究生。比尔有一个3岁的儿子，与孩子的母亲分居了。“我真正被吸引的一件事是他有一个孩子，因为我确实很喜欢孩子，”朱丽叶说，“我爱这个孩子，就这样我们组成一个速成家庭。”朱丽叶和比尔同居了，最后她屈从父母的压力——怀孕后要她结婚。他们同一年获取了博士学位，而且在波士顿不同的大学分别获得了教师的职位。他们生活在拥有平等婚姻的女权主义梦想里。就在他们在那儿的第一年，比尔患了精神分裂，被诊断为精神病。他们回到了加利福尼亚，便于家人朋

友住得近些。朱丽叶找到一个压力不大的工作，她现在还从事那份工作。

第35节：新单身女性(35)

比尔和朱丽叶的关系一直维持到1980年，那一年她离开了他。她不想回忆这几年，也不想谈到。朱丽叶的确说过离婚后有好几年比尔拒绝让她去看儿子，并且他与另外一个女人同居了。他和她还有了另一个孩子。1989年，比尔意外地死于一场车祸，那时他的女儿11岁，儿子17岁，小的孩子才5岁。幸运的是儿子又重新回到朱丽叶身边了，她协助三个孩子维持亲密的关系。

1984年朱丽叶公开表明自己是女同性恋者实属罕见，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没离婚时，就同一个女的有过性关系”，朱丽叶说，“我遇见了一位女性，就陷入其中，就是那样。所以这不是我人生中真正的创伤或戏剧性的事件。”朱丽叶的父母很难接受她的同性恋身份，但是她的弟弟妹妹，以及所有的朋友（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是异性恋者）对她非常支持。朱丽叶是非传统的，不仅在于她公开表明自己是女同性恋者，还在于她的那种同性恋形式。她女儿在家的那些年里，朱丽叶没有过同居，也没有成为女同性恋团体的成员。而是她保持着牢固的异性恋朋友网络，在大约6年的时间里，只有过短暂恋情。

离婚几年后，瓦努娜和朱丽叶分别与其他人相处过，与她们传统的婚姻相比，那属于前卫的行为。离婚8年后，瓦努娜遇见的也是非裔美国人，他是个跨国商人，比她小几岁。他的追求很有浪漫情调，但是他经常外出，因为他主要在海外工作。瓦努娜喜欢浪漫，也喜欢这种关系带来的自由空间。另外，他对她的孩子也很好，他们在一起5年，有两年半的婚姻生活。45岁那年，由于严重的心脏病发作，他死于非洲。随噩耗而来的还有超过10万美元的生意上的债务，需要她承担。真是世事难料，她在本地的一家餐馆外的人行道行走时摔断了脚。她起诉并赢得了官司。那笔赔偿多到足以还清大部分的债务。她的第一任丈夫也是在那一年去世的。

经过了几年随性的爱情后，朱丽叶又处于另一场恋情之中——同样有很多的自由空间——同伊丽莎白，她生活和工作在距这儿有4小时车程的地方。虽然她们从没有在一起生活过，如朱丽叶所说：“它真是一种美妙的，美妙的关系。”这种关系持续了8年多，但到她女儿杰西去东部读大学的时候，朱丽叶开始对她与伊丽莎白的关系不满意了。她渴望一个住得近些更性感的伴侣。她想把激情和友情合为一体。于是朱丽叶开始改变她们的关系，由情人到朋友。她们的关系依然亲密，朱丽叶说：“我们是好朋友，她是家庭成员之一，我的女儿和儿子真的很喜欢她。”

到了50岁左右的时候，我和吉莉安、瓦努娜、朱丽叶意识到非传统的关系不适合我们。但我们四个所做出的选择为我们从三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继续单身创造了单身生活所需的各方面支持条件。我们早期经历的非传统生活便于我们接受长期单身状态，但现在除了我们没有配偶外，我们已经营建了很传统的稳定的生活。我们的经历及那些在别的章节所描述的长期单身的女性，为营造满意的单身生活提出了六项必要（但未必充分）的支持条件。

精心打造满意的单身生活所需的支持要素

这六项支持要素是：满意的工作；同下一代的联系；拥有一个住所；同朋友圈和大家庭网络的亲近关系；社团；不管已有积极的性生活还是独身都要接受性行为。

追求满意的工作

在后来采访中产阶级单身女性新参与者时，我挑出没有权力和没有高薪职业的女性。虽然在研究的所有女性中，工作对她们来说都很重要，但很少有人在研究所工作或有显赫的职位，而且很少有人是工作狂。

对我们四个人来说，找有意义的工作——工作能给我们提供经济保障，而且能证明身份，有目标感——成为考虑的核心。我们都追求当时在家中别的女性没有的高学位，没有从事过的专业。到了中年，

我们都不再坚持这些，而是把工作与生活上的选择和目标结合起来。我们都选择在一个地方住下来，而且通常在研究院工作，而不是搬来搬去追求更高的职业机会了。

第36节：新单身女性(36)

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在研究生院读第一年的时候，就决心要成为一名教授，但我知道这个目标很难实现。1962年到1966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的那几年，先是学教育学专业，之后是社会学，我的内心一直充满矛盾。我喜欢学习，也很用功。灰色的哥特式的建筑，小型研讨会上的学术探讨，强调各学科间的交流，还有不重视级别和资格的学术氛围，及几乎提供给所有研究生的适当奖学金，这一切使我觉得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不知不觉地，我在成为一个男孩子，以和男同学辩论来引起男教授的注意。但我还是女生打扮，尽管没有挑逗性，风格上——短裙、长筒袜、轻舞鞋。在一个12月份，我完成了所有课程并通过了申请博士项目的考试之后，我精心制作了圣诞甜饼（我母亲常做的），用盘子端给教授（全是男性）和秘书（全是女性）。他们都惊呆了，因为没有人认为我擅长家庭生活。

我没有真正的朋友，系里的一个女性朋友读完硕士就离开了，我一向看不惯那几个嫁给同班同学的女生，我和别的男同学都感觉她们不太严肃。几年后，她们中的一个人，还在婚姻之中，告诉我我令她感到望而生畏，相形见绌，我都不记得那时的我是什么样子了。我认识几个别的系的女生，但我们之间从不谈论个人问题。我也没有一个能密切交往的导师，尤其不喜欢给我上过课的两个女教授。我感觉她们很冷漠，她们的工作（作为夫妻团队的一员）我也不感兴趣。回顾过去，我确信看到男性在细微之处露出对她们的蔑视。在我读研究生的第二、第三年里，汉纳·阿伦德特是我敬仰的著名政治哲学家，就住在我那条街的对面。我能在自家的窗子前看到她进出家门，还去听过她的一些讲座。但是由于我敬畏她的博学，敬畏她那德国人的风格而始终不敢接近她。

虽然我从来没有考虑要背离这一职业道路，但是孤立于其他女性之外让我付出了代价，我经常感觉到孤独、彷徨。这一点以及我热衷成为知识分子的欲望，导致我与两个已婚教授的秘密恋情，他们中的一个在芝加哥大学的职业学院，另一个在国外的一所大学。这样我走进了有抱负的职业女性拥有的共同模式。虽然我心甘情愿地成为他们的第三者，但是这些关系没有给我带来快乐。

1966年我被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聘为全职讲师，在公共研究学院（非重点）给成人学生讲课。因为一个客座教授没来上课，就安排我给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上一门课。那时我还没有完成博士论文，也从来没有讲过课。26岁的我就被推到一个极其精英化和性别歧视的机构——几年后我才学到的一个词——在那里我是个很异常的人。接下来的两年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孤独最难熬的日子。

在我去纽约前，有几个教授和同学就警告过我要当心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他们由于引诱女研究生而臭名远扬。因为我是受聘在那儿的第一位没有配偶的年轻女性，也不是那些男教授的学生，他们认为我肯定会被当做“一块鲜嫩的肉”吃掉。

我非常恐惧，从来没有到办公室看过他们，甚至他们邀请我时，我也没去。我也很少撞见他们，因为我的办公室是在公共研究学院的底层，而他们的则在更有声望的研究生院或哥伦比亚学院。我在系里的教职工大会上的确见过他们，会议是午饭时间在男职工俱乐部举行，每月一次，但我们都无话可说。在会议开始时主席不止一次地宣称，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午餐会议有“三位可爱的女士”加入，这是多么美好时，我只能生闷气了。这个俱乐部是出于礼节作为例外才让我们参加的。

另外两位女士很少和我说话，她们彼此也不说话。其中一人只比我大几岁，是一名助教，也是本系的毕业生。大家都知道她是那个最知名的教授的情妇（后来成了第二任妻子）。我一直也弄不清楚她为什么躲避我，是因为我们在学术上没有相通的地方，还是因为她把我

当做一个竞争对手，或者是因为她也想成为一个男孩子，通过与另一个职位低的女性的比较来显现出她的完美。另一个女性年龄大些，大概在40岁左右，刚获得博士学位，教一门或两门课程。但是她的真正价值体现在她为系里的其他“明星们”编辑的学术期刊上。我很清楚我们三个都没有受到重视。

第37节：新单身女性(37)

从来不在乎在课堂或大会上讲话的我在这种场合下却感到沉闷，而且在这些可怕的午餐会上变得结结巴巴的，我唯一的安慰就是午餐后和另外三个职位较低的教员在校园里散步，他们也像我一样，是“局外人”，因为他们不是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的博士学位。这些男人抱怨说他们也感觉到被忽视了，接下来我们都嘲笑会上的假民主，因为真正的决定是由那三四个不定期碰头的明星做出的。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了两年后，学校让我离开，我被告知是因为没有完成我的博士论文。但是还有一个男的，也没有完成他的论文，却被留了下来。我不是不了解在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作为一名全职讲师被解雇具有的讽刺意味，于是就在街对面的巴纳德女子学院找到一个兼职讲师的位置。

1968年春天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发生暴动时，我兴冲冲地加入了，虽然我没有成为那场政治运动的骨干分子。我记得的一个片断就是述说等级被颠倒过来的情形，混在学生中的一些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占领了费尔维德大厅，那是最资深教授的办公地点。教授们为了办公室里拿不出来的研究材料而焦急万分，在楼前踱来踱去。研究生们邀请我们几个局外的低级教员加入到他们之中。我们告诉那些高级教授要检查他们的办公室。后来，社会学系的教职工开会讨论暴动的事。在会上我第一次大声发言，为学生辩护。当一个资深教师对我喊叫时，我当时是很开心的。现在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声音。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有关哥伦比亚学生暴动之事的。

一年后，也就是1969年的春天，我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妇女解放运动的成立大会。我记不起当时为什么定出了这样一个名字，我知道大多数参与的学生和教师都来自巴纳德学院。或许是为了尝试打破女生聚集区，或是利用哥伦比亚大学的名牌效应的缘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1972年，30岁出头的我去了海湾地区，部分是为了与一个男人相处，也因为我觉得那里既有城市生活的便利又有户外活动的自由。与纽约比起来，那儿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似乎更开放些。一年后我放弃了在纽约城市大学皇后学院的终身受聘（但非终身任职的）工作，到圣何塞做了一名讲师。虽然恋爱没有结果，但我决定如果我能在高校找到一个稳定的教学职位，我就留在北加利福尼亚。1975年我在桑拿马州立大学得到了一个助教的职位，在那里我的职位最低，但又在教书和创建女性研究系方面很有成就感。我的几个同事对我的决定倍感失望，他们认为我应该更认真地对待我的事业，在一所更有名望的大学里任教。但我想停止漂泊了，我需要朋友、团体和一个家。这个决定我绝不后悔。

吉莉安最终也从事教育事业，却经历了一个更曲折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中期她来到了洛杉矶，为的是要改变一下生活方式，不是为了追求事业。在一家洛杉矶法律大公司当秘书一年之后，她厌烦了。她申请攻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博士学位，1966年被录取并开始了她的学业。虽然她是一名好学生，她还是觉得被忽视了，而且没人鼓励她去申请奖学金和助学金。在整个研究生教育期间，只有一名教授是女性，所读的书只有一本是由女性编写的，导师很少指导她。

她用继承的财产（父亲留下的）支付了大部分学费。但为了挣到生活开销和避免再做秘书，她申请了社区学院的教师职位。她得到了一个，后来又得到另一个，虽然需要坐通勤车去工作单位。她发现自己喜欢教书。她熟悉的讲课方式在那里不适合，于是她尝试课堂上有更多的师生互动，这样教学效果令人相当满意。1970年她在一所社区学院找到了一个暂时的全职工作，由于她的嬉皮士男友跟随而来，他们搬到了离工作单位近的地方。虽然教书占用了她的时间，1978年她最终还是完成了学业。然而，多年来她没有在院校里获得一个永久的职位。这些年她艰难度日，因为她的工作处于不稳定状态。但在同事

们的帮助下，以及她自己多年的优秀教学，她最终得到了一份永久的工作。她现在还在那里，依然热爱教书。和我相比，她所在的系和学校给她提供了更大的社交团体。

第38节：新单身女性(38)

我们来看看瓦努娜的生活轨迹：她是一个黑人，出生于工人家庭，18岁结婚，有4个孩子，从事多年的秘书工作，最后晋升为专业人士，这些都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她离婚后那几年，从37岁到47岁，尽管面临着经济困难，瓦努娜还是完成了硕士学业，继续获取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又取得法学学位。她在自己曾经当秘书的那家大公司做了一名律师。然而不久，她又到一家小一点的公司，因为她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工作及时间。她与另外3个女律师成为这家公司的合股人，专门负责家庭和离婚方面的案子。虽然她喜欢这份工作，工作很认真，但瓦努娜把家庭放在第一位。她拒绝了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出差多或需要重新安置的工作机会。

她的第二任丈夫去世后，也就是她步入50岁时，家庭责任也相应地少了些，瓦努娜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工作上。虽然还喜欢法律诉讼案件，但她开始参加有关少数族裔、女性及法律方面的学术会议。2002年最后一次采访时，她告诉我她正要首次参加在欧洲举行的类似会议。

朱丽叶，大约比我和吉莉安小8岁，比瓦努娜小3岁，在追求高学位、通往高级职位上的道路上却是最一帆风顺，遇到的挫折也最少。但她的丈夫病逝后，她在自己的事业计划方面做出了最大的让步，虽说找到了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凭着政治学博士学位，在一家私人基金会做一名资金筹备员，为来自贫困家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她热爱这份工作，这使她有机会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社会激进主义运动发展而来的一些进步价值观付诸于实践。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工作很清闲，在时间和空间上允许她全身心抚养女儿，追求家庭生活。但对她来说，仅仅做家务是不够的。朱丽叶打算5年后她60岁时退休，她已经准备好做一份兼职工作。她正在修一些课程想成为合格的私人教

练，已经在奥克兰的一家机构当自愿者，为有残疾的青年女性提供工作和私生活方面的咨询。

找一份有意义的工作，过着可维持的生活，能够提供经济上的自立和心理上的认可，但这不是单身女性生活的全部。新单身女性把自己的工作与生活的其他方面结合起来。已婚女性可能不会为了事业上的机会就搬来搬去。但有事业心的单身女性为了自己的事业升级常常需要重新安置，从而牺牲了稳定的家庭，失去了朋友圈及维持满意的单身生活所必要的团体生活。在第五章我探讨了令人满意的工作是如何促进单身女性的独立，反过来这种独立又是如何促进接受单身生活的。

建立与下一代的联系

明确地选择没有伴侣也要独自养育孩子则迈出了成为新单身女性关键的一步。很明显，和在要孩子问题摇摆不定的那些人相比，单身生活对于想要孩子但只有不错的同居关系的女性来说就更困难了。我们4人对养育孩子的事情经过了深思熟虑，没有摇摆不定，也没有放任自流

在对125个单身无子女的女性的调查中，伊冯·威星发现有目的地选择不要孩子的那些人“对自己更加自信，对生活更满意”（伊玛·威星：《无子女女性：修养人生》，新泽西：罗德吉斯大学出版社.2002年，28页，下同）。。吉莉安选择不要孩子，寻找同下一代联系的不同方式；我选择做单身母亲；瓦努娜和朱丽叶选择在结婚前为孩子做好一切物质准备，两人都成了合格的单身母亲。瓦努娜、朱丽叶和我寻找抚养上的帮助，但不是寻求来自我们的大家庭、前夫或者新伴侣的帮助。瓦努娜把她的4个小孩子组成有效的家庭单元。朱丽叶和我是从亲密的朋友中获得支持的。

吉莉安，在整个二三十岁期间“就没想过”要孩子。但在1980年她40岁的时候，尽管采取了避孕措施，在一次随便的性关系之后她意外怀孕了。她很明白自己从来不想要孩子，于是她选择了堕胎，吉莉安

强调不难做出这个决定。她很高兴堕胎现在合法化了，不像10年前她的一个朋友（在高级法院裁定堕胎合法之前）必须到国外去堕胎。另一件她觉得幸运的事是，她的母亲在生孩子这件事上从来不给她施加压力，并接受了她将不会有一个外孙的现实。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吉莉安希望她有兄弟姐妹，她更喜爱做一位姨妈。

第39节：新单身女性(39)

在我追踪采访她的这些年（从她54岁到62岁），吉莉安与两个年轻女性渐渐地形成了家庭式的组合。一个癌症晚期的好朋友请求吉莉安做她两个女儿的监护人，当时两个孩子都二十多岁，吉莉安“诚惶诚恐地把这事给承担了下来”。她知道，不管怎样她都无法取代她们已经去世的母亲，她试都不用去试。8年中，这两个女儿进入三十多岁时，吉莉安最初只是关注她们的经济状况，现在与她们“真正地关系密切”了。其中的一个“女儿”现在已经离婚了，另一个是同性恋，她的同性伴侣刚刚生了个孩子。吉莉安经常与她们一起度假。

我一直想成为一位母亲，但直到三十多岁时才得以实现这个愿望。我37岁时，在大学有终身职位，我开始认真考虑要孩子但没有伴侣的事情。因为，我已经组建了一个集体家庭，还没有真正地独自面对要成为一个单身母亲的现实。我潜移默化地受到自由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那就是女性可以同时拥有事业、伴侣和成为母亲。我把这种理念与反文化运动中提倡的另一种方式的核心家庭结合起来。我不要单独成为母亲，而是要在一个集体环境里。

我感觉到却没有说出来的是，有孩子会使我与家庭重新联系起来——父母和家里人虽然为我的事业成功而感到自豪，但不能理解我的政治观念及兴趣，也不能真正理解我的生活。孙儿孙女才是我父母最看重的，孩子也是我的弟弟妹妹生活的中心。这样，新旧文化观念融合的我在40岁的时候成为了一位母亲。虽然作为领养一个混血儿的单身母亲要比我所想象的还难得多，我从没有为我的决定后悔过。集体家庭解体后，我开始同另外一个朋友一起来照顾孩子。那个朋友是一个单身母亲，孩子比我收养时五天大的婴儿还早三周出生。我们的关系时好时坏，但我们一直是朋友，而且我们的孩子成了“兄弟”，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他们二十多岁。我会在第七章来讨论我作为单身母亲的经验。

瓦努娜同丈夫离婚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保护她的未成年的孩子。她结婚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认为他们会是个幸福的家庭，穿着体面的衣服出入教堂，大家都说孩子们有教养。实际上，瓦努娜认为“孩子们肮脏不堪”。离婚前，她的大孩子一直吸毒、酗酒，而小一点儿的与人断绝所有往来，她的一个女儿“吃饭都没有感觉”，另一个女儿谈到了自杀。离婚后，孩子们身心比以前健康得多，虽然大家还把他们看做危险人物。

因为他们是非裔，而且是单身母亲的孩子，人们就会认为瓦努娜的女儿会在高中时怀孕，儿子会成为黑帮成员或毒贩子，事实证明没有这样的事。他们都完成了高中学业，后来又都上了大学，又从大学毕了业，现在都有了很好的工作。其中三个孩子已结婚生子，还有一个女儿，在25岁时就已决定做个单身母亲。

在同一年里，瓦努娜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丈夫的相继逝去使家庭陷入了巨大的危机，又一次，瓦努娜和她的孩子们一起挺过来了。现在孩子们已是二十多岁、三十来岁了，他们深爱的继父以及无情的生父的去世给孩子们带来的打击和心灵的伤痛久久不能愈合，瓦努娜带着他们去海上巡游，她用信用卡支付，又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还清了债务，在海上度过的时间疗养效果显著。

自那以后，瓦努娜对孩子们付出的爱得到了回报，她的大儿子和儿媳搬到她那里来住，她不觉得孤单了，这样他们一起住了3年。大儿子离开后，她小儿子搬过来住了一段时间。1999年，瓦努娜的未婚女儿决定要个孩子后，回来和她一起生活。瓦努娜同意了，但是明确表示不要指望她照顾孩子。她的女儿负担了她那部分的生活费用，包下了厨房的活儿。她女儿依靠她姐姐、外祖母和看护小孩的保姆来照顾孩子。瓦努娜喜欢这样的安排，她有很多自由空间，同时从未感到孤独。

孩子们在别的方面也帮助她。在她坐通勤车上法律学校时，他们坚持要她买辆好一点的汽车，装上BP机。瓦努娜在学校里摔断了脚的

时候，孩子们都赶来看望。她的父亲去世后，瓦努娜为她母亲买了一套房子，离她家一英里远。瓦努娜对她的母亲一直怀有又爱又恨的复杂情感，所以她的女儿和儿子承担了大部分照顾外祖母的责任。

第40节：新单身女性(40)

在瓦努娜的生活中，家庭占据了中心地位。到2003年，她有了六个孙辈和一重孙辈。她所有的孩子和孙子都住在距她及他们彼此之间不超过方圆30英里的范围内。他们是好朋友，还经常互相看望。

与瓦努娜一样，朱丽叶的离婚使她成了单身母亲，对她仇视的前夫既不可能在经济上帮助她，更别说情感上的寄托了。可是瓦努娜还能够和4个孩子组成一个家庭，朱丽叶的女儿杰西，在离婚时才4岁。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住得离她很远，朱丽叶有一份全职工作，需要每周离开城里好几天（虽然不用做通宵）。朱丽叶没有让同性恋伴侣和她搬到一起，与她一起抚养孩子，而是找来了一群朋友来帮忙照顾女儿和她自己——那些人主要是在20世纪70年代时的政治运动时交的朋友，以及住在附近的一些朋友。

每个星期二的晚上朱丽叶和杰西都要和一对夫妇共进晚餐，埃米莉和乔，还有他们的女儿，她比杰西大3岁，朱丽叶同埃米莉和乔认识，因为他们一起参加过政治运动。第一周在他们家里会餐，下一周就轮到她家里了。这种会餐持续了10年。大人们还与他们的女儿保持很亲近的关系。清晨的6点45分朱丽叶准时把杰西放在埃米莉和乔的家里，他们会给杰西吃早餐并送她去上学。杰西喜欢她放学后的安排，如果朱丽叶不能及时地赶回接她回家，她的邻居桃瑞丝也会把杰西接回来吃晚餐。桃瑞丝是一个没有孩子的单身女性，在她们的生活中是个很重要的角色。“桃瑞丝保证杰西给我买生日、母亲节和光明节的礼物。”朱丽叶解释说，“我认为对孩子来说给予和得到同样很重要，一个单身母亲是需要帮助的。”

当朱丽叶听说她的前夫比尔死于车祸时，她求助于这种形式的家庭网络。她叫来埃米莉，让她和杰西待在一起。住在远处的朋友伊丽莎白，放下了手中所有的事情一路赶来，在此住上一段时间。桃瑞丝缩短了自己的欧洲行程，赶回来陪着她们。这样来自朋友的支持帮助

了朱丽叶，使杰西度过了困难的少年时期，能够进入一所名牌东部大学，后来到一所常春藤联合会的研究生院攻读硕士。

同下一代的联系可以通过自己的孩子或孙辈、侄女外甥、年轻的女门徒，或是同年轻人一起做志愿者工作。第六章描写有关无子女的单身女性，提供了另外的事例进一步论证吉莉安的亲身经历，旨在说明单身女性如何在家庭环境之外建立同下一代的关系。

置办一处住房

57%的单身女性拥有自己的住处克雷格·威尔逊：《单身和没有安居不同》，见：《今日美国》，2001年10月23日，下同。。如果对于超过40岁的单身女性进行统计，这个数字可能会更高。在我研究的过程中，有一定数量的女性买了房子或一套公寓房间。一些人的预付定金是父母或兄弟姐妹等人帮助支付的。对于少数在四五十岁还在租房子的人，拥有一处住房，不再为租房子担心受怕成为她们的首要目标。当然了，年轻的单身女性可以住在家里，而不用买自己的房子。装修公寓是她们创建自己的生活空间的一种方式。在《优涅读者》主办的在线小组讨论中的一个话题“单身并热爱它”中，年轻的单身们谈到，购买家具可以看做定居下来的一个标志。一位女性写道：“我就要到28岁了，去年我买了自己的第一张床，男人才不会这样的，这简直就是天壤之别。最酷的是我为自己买的，不是和别人一起来用它。”在阿特纳读者自助餐中进入1996年9月3日的“单身与热爱单身”，参见http://café.utne.com。

我们四个的实践经历（及参与我研究的其他人）表明，一个人不必一定要有婚姻才能享受令人满意的家庭生活。我们四个人都有自己的住房，追求丰富多彩的家庭生活。

吉莉安在我研究的女性中拥有最宽敞、最漂亮的房子建筑史学家爱丽丝·T.弗里德曼发现一些富有的单身女性与一些著名的建筑师联袂建设“20世纪欧美最有意义的最有创新气势宏伟的房子”。她解释说，这些单身女性旨在重新定义家庭生活：“作为家庭的前沿女性——不管

是单身、寡居、离异、女同性恋，还是其他的反传统的生活方式——她们重新定义了家庭空间，为年龄、阶层、性别以及性方面认定的一系列越轨行为提供自由的场所。通过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住所，她们阐明了有关独立女性生活价值的激进言论。”。她住在城市，房子看起来很有品位，装潢时尚，从窗子望去可以清楚地欣赏到河流的景色。吉莉安是在她母亲去世后买的这座房产，花费了部分的继承财产。起初，她还认为这房子一个人来用太奢侈，也太宽敞了，所以她就把房屋的一部分租给了小她15岁的同事兼朋友。她就那么做了，但是几年后吉莉安想尝试自己一个人来住。她想这样可能会感到孤独，也好刺激自己找个伴侣。相反，她发现自己喜欢一个人生活，并有宠物狗奥斯卡相伴。因为她的生活太忙，内心很“充实”，吉莉安发现她需要“一个巨大的空间和静谧的思绪来滤清所发生的事”。房子被分成独立的房间，看起来舒适，因为她的房子全在一层，吉莉安认为这样安排比较适合她这个年龄。到吉莉安家去改变了我起初的看法——认为她有工作狂的倾向，她也承认。但我现在明白了家庭生活是如何减缓了她对事业的投入。她自豪地陪我在她长满天然植物的美丽花园里观赏。吉莉安还为我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那是她昨天晚上为一次宴会烹制剩下的。

第41节：新单身女性(41)

当我的集体家庭解散后，我担心我会孤独，孤孤单单只有自己同儿子在一起。和吉莉安一样，我喜欢拥有自己的家。在一个做房地产代理的朋友的帮助下，我找到了一处能买得起的小房子，因为它有两个可出租的单元，可以用来支付抵押和房产税。逐渐地，我对房屋进行了维修和改进，同时为自己能找到和雇佣让人信任的、有时甚至有创造性的男女工人来对房屋进行改造的能力而增强了信心。我的儿子离开家后，我惊讶地发现，他在自己住的房子里已经做了多处修缮。最近，他打电话问我他铺的厨房地砖是否有问题。他提醒我他观察过给我们家厨房和浴室铺瓷砖的人是怎样工作的，他还帮过忙。我忘了这件事，没能答复他的问题。但我很高兴他能定期修理我的房子。我一直喜欢下厨房，虽然不是什么美食家，还是一个不错的家庭大厨。我从来没有认真地教过儿子做饭，没指望过他准备饭菜，但我很满意他和女朋友一起下厨，花很多时间尝试新的花样，有时还为我做饭。

我儿子是19岁时离开家的，但是又有一个比他大10岁的年轻女性搬到了他的房间里，她是我的一个老朋友的女儿，正在完成伯克利的学业。同一个自立的成年人住在一起，与和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相比，我们有更多的共同爱好以及相似的生活方式，这使我感到欣慰。她的入住推迟了我一个人生活的过渡进程，我已经23年没有独处的经历了。两年前萨莎搬走了，这使我人生中第一次有了空闲的客房。梅·萨顿在她的《孤独者期刊》中写到："这种生活的价值还没有被充分意识到：一个人独处时，敞着门的房间，为了给陌生人，为了迎接、珍惜新朋友的到来而准备。"

梅·萨顿：《孤独者期刊》，纽约：w.w.诺顿，1973年，130页，下同。我喜欢这种安静（除了爱叫的狗外），让房子保持我喜欢的状态，经常有朋友过来，为来自郊外的朋友或家庭成员保留房间。

结婚后的那些年里，瓦努娜住在一个农场里，不仅要干活挣工资、照顾孩子、做全部的家务活、做饭，她还得侍弄一个菜园，还会养鸡，或养猪。她在菜园里做罐装食品，储藏食物，经常累得精疲力竭。离婚后，瓦努娜很高兴地卖掉了农场，并搬到了一处更小的房子里，位于市郊地带的住宅区。她那温馨的小屋装修得引人注目，瓦努娜很高兴她的女儿和母亲承担所有的厨房工作。现在她喜欢和家人在一起的这种家庭生活。

正相反，朱丽叶可能是我采访中最具家庭特点的女性。她喜欢厨艺、园艺，还喜欢操持家务。她的女儿长大以后，一周里有六个晚上她都烹制“美味素餐”。我们将会看到，在她女儿去读大学离开家后，对孩子的爱加上喜欢家庭生活导致她的一场可怕的婚恋关系。现在她五十五六岁，一个人住在重新装修的房子里。她说：“我喜欢住大点儿的房子，喜欢做饭和招待客人，喜欢拥有自己的卫生间。我喜欢安静，不着急让人搬进来。”朱丽叶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再有一个伴侣生活在一起，但是她很清楚她要去哪。“我不会离开这个房子。”朱丽叶声称。与我采访过的别的女性一样，朱丽叶幻想着她的伴侣就住在隔壁，或住在下一个街区。

单身女性需要一处住房，但是我所采访的没有几个女性一辈子是自己独居的，如果一个人住，她们也与朋友圈、近亲在内的大家庭、社团及街坊邻居有着很紧密的联系。在第八章里我探讨了其他女性创造另一种新方式的例子——同亲戚、朋友一起生活，或保持自己独特的生活状态。

发展与朋友圈和大家庭成员的亲密关系

要成为一名新单身女性，需要的不只是一间住房，有满意的工作，以及决定是否要孩子的问题。一个新单身女性——无论是单身母亲还是没有孩子的——都需要在危难的时候有可以依靠的朋友圈或者家庭，伴她一起度过难关，为她提供温情和亲情。朋友不是一个排他的关系，美国文化强调在友谊中公平和互相支持等重要品质。与大多

数的家庭和浪漫关系相比，朋友更支持单身女性的自立。年过40的单身女性，尤其擅长建立和保持友谊，常常拥有相当大的朋友网络。

第42节：新单身女性(42)

朱丽叶的朋友网络，现在包括她以前的情人伊丽莎白在内，能提供给她关心、支持以及亲密的情感。朱丽叶和她的朋友分享她的情感和内心想法，寻求心灵相通和相互关爱，而不是和她的家庭。我的朋友圈，像朱丽叶的一样，是在参与20世纪70年代的新左翼运动及女权运动时形成的。我的大部分朋友都是女性，主要是单身女性，还有少量的夫妻及男士。我长期住在一个社区有利于形成友谊，另外住在集体家庭也方便结交新朋友。但只有在集体家庭瓦解后，我才意识到我结交了大量朋友，他们给予我的友情、情感上的支持、同伴关系，以及提供的实际帮助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在我们的共有房子办理完复杂的出售手续之前，我的一个朋友让我用她的房子作财产担保，这样我就能够用临时贷款买新房子。除了单身母亲给予的主要帮助外，其他的朋友，不管是单身母亲还是没孩子的，常常过来倾听，围坐一起，就抚养孩子问题提出建议。我也交新朋友——通过我的儿子、在工作中，或者通过别的朋友的介绍。城里新来的女性通过认识我的朋友的介绍也来拜访我。再以后，寡居的、刚离婚的女性、正面临离婚的女性都把我当成她们的朋友，把我当做快乐的对自己的单身生活满意的人。我惊奇地发现自己有这么多的朋友——尽管我与其中的几个有过矛盾——我还是觉得我们的关系是让人满意的。

对于吉莉安而言，工作场所成了她拥有很大的朋友网络的主要来源。我在1994年第一次采访她时，朋友们为她提供了度假和旅行所需的日用品以及陪同的伴儿。当她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时，一些朋友给予她所需要的全方位照顾。她也帮助照顾一个身患癌症的离婚的朋友，一直到她去世。她的一个朋友的女儿同她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就像年轻的同事那样。但是，起初吉莉安没有充分意识到她有这么大的朋友圈。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化氛

围里，对核心家庭的改变往往以失败而告终，而且成年人之间友谊的重要性也是避而不谈。然而8年以后，吉莉安改变了她的观点。

1994年，吉莉安谈到通过心理治疗来减轻她由于母亲去世带来的悲哀，那时的她停留在自我摸索阶段，治疗的重点强调如何获得更成功的婚恋关系。2002年，吉莉安意识到心理治疗有助于她“了解自己和别人的内心世界”，她说这提升了她成功地获得友谊的能力。吉莉安长时间而且兴致勃勃地谈到她的范围较广的朋友网络。有一些是比她小10到15岁的以前的学生，大多数是女性，但她也有关系很亲近的男性好友。她的几个朋友是在她家里举行的婚礼，其中有男的女的。她的许多朋友现在都结婚了（包括一些女同性恋），吉莉安与他们关系融洽。一对已婚的夫妇每周一晚上都会在心理治疗后来到她这里。他们来这里缓解生活压力，吃着墨西哥玉米煎饼，一起看《古董巡回秀》。其他的朋友在生活的特殊时期——在离婚后、有创伤的时候以及重病恢复期也住过她家。

很多年以来，工作、教育及家庭责任致使瓦努娜没有腾出多少时间来栽培友谊之花。她住在桑那马乡村，那里是海湾地区少数族裔种类最少，而且非裔美国人比例最低（1.3%），这一切导致她找女性朋友。长大的孩子们成了她最好的朋友，但是，瓦努娜逐渐地创建了一个单身女性的朋友圈，这些朋友支持她，和她一起旅行及娱乐。她最好的朋友是在工作中遇到的两个美籍西班牙人。2002年，为了给一个表妹过生日，她从拉斯维加斯旅行归来，她表妹已经离异，现在成了她的好朋友。

对于不同的单身女性来说，朋友圈的含义截然不同，就像这些事例所证明的那样。我和瓦努娜的朋友圈以单身女性为中心，而朱丽叶和吉莉安却有更多的已婚的朋友。瓦努娜和吉莉安有许多比较年轻的朋友——其中有瓦努娜长大了的孩子，以及吉莉安以前的学生。所有的朋友网络都起源于一个团体——对朱丽叶和我来说是政治团体，对吉莉安和瓦努娜而言是来自工作单位。

第43节：新单身女性(43)

维持一个团体

新单身女性主要通过朋友网络来建造和维持团体。研究者发现，有四种类型关系——朋友之间、亲戚之间、同事之间、邻居关系——可以创建维系个人团体的网络，在这其中，朋友提供最大程度的关联

巴里·威尔曼：《地球村的网络》，哥伦比亚：西视点出版社.1999年，84页，下同。威尔曼发现在加拿大和美国的独立个体，平均来说，都与3到6个人关系亲密，5到15个重要但关系不太牢固的人，大约有1000个熟人；萨顿：《孤独者期刊》，85页。。朋友是在特殊的组织或环境下（学校、大学、工厂、教堂、体育馆）走到一起的人，从而形成今天社团的基础。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在《一个人的游戏：美国团体的瓦解和复兴》里，发现单身人与文化概念上的孤独和自私的形象不符，同已婚人相比，在家庭之外有着更广泛的人际关系。“与其他的人口统计学特点相一致的是，”他写道，“婚姻和孩子对于会员从事体育、参与政治和文化团体来说有负面影响……与统计中的单身人比较，已婚夫妇很少去参加俱乐部的聚会……单身及没有孩子的成年人比已婚人或成为父母的人对政治话题略微更感兴趣。”罗伯特·D.普特南：《一个人的游戏：美国团体的瓦解与复兴》，纽约：克蒙&斯克特，2000年。

邻里关系也可以成为团体的一个来源，比如朱丽叶。朱丽叶与街坊邻居之间的关系走得很近，这能为她分担不同的日常事务。她住在城市中心的一个街区，主要由只有一层的木房子以及小公寓楼组成。这个小区很安静，虽然它邻近两条繁忙的大街。在一个不为人熟知的城市里，这个小区的租房者和房主们形成了一个社团。他们大都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但是新来的人也会很快加入到这个团体中去。他们举行家常聚餐，交换食物，有困难时互相帮助。朱丽叶从单身母亲时起到现在她一个人生活，一直都维持着这种邻里关系。她说：“我的

邻居就是我的朋友，比如，最近我装修房子时，我在街对面的邻居家洗衣服。一个邻居给我送来了煮熟的鸡蛋，其他人邀请我吃饭，这就是一个团体了。”

接受性行为

我、朱丽叶、吉莉安都有过除婚姻关系之外的性行为，有时发生在没有承诺的情况下。虽然我没有明确地问瓦努娜，她只谈到了与两个丈夫的性关系。当步入四十多五十多岁时我们部分地接受了单身状态，逐渐接受性行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为了对最后一章的讨论加以补充及强调性欲的多样性，我现在来描述一下吉莉安和朱丽叶是如何谈论她们的性生活的。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名学生将吉莉安介绍给她的单身父亲萨姆，他比吉莉安大10岁。她发现萨姆很有吸引力，喜欢有他陪伴，很欣赏他能支持并关心她的工作。她羡慕他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他同孩子和孙辈们的关系亲近。他是一个很出色的人，他们有相同的政治信念。对吉莉安来说，“在各个方面他都表现得恰如其分”。

虽然她没有同他身处爱河，吉莉安最后仍同意做他的情人。“我很好奇，”她说，“因为离最后一次性生活到现在已经有10年了，我并没有过强烈的性冲动。我害怕自己会丧失性功能，但当我们发生性关系时，我惊喜地发现，自己竟然功夫十足。我的身体没有一点问题，非常棒。”但吉莉安没有停留在性关系上，她意识到自己真正想要的只能是与“人生伴侣”发生的有爱情的性爱，与一个牵动她“内心和情感”的人来享受人生之“性”福。吉莉安宁愿独身，也不要没有爱情的性。她同萨姆保持着朋友关系，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关系逐渐加深，这样一来，既有爱情又有性爱的关系有望出现。

相似的是，在五十多岁时我和瓦努娜也接受了独身状态。我们过去都有过和谐的性爱，不喜欢随意地发生性关系。我们过着充实的生活，而不愿意勉强自己迁就别人。而朱丽叶可不想一个人独身，她认为自己性欲旺盛，觉得女同性恋很难满足自己的性需求。朱丽叶解释

说：“性对我来说不像别的女性那样有太多的包袱，我不反对随意的性行为。但接受这种观点的部分女同性恋团体趋于年轻化。”

第44节：新单身女性(44)

我们知道，朱丽叶同伊丽莎白分手主要是因为她想要更多的性激情。虽然她不反对随意的性行为，但她更喜欢在一个同居关系、家庭的环境下有“激情伴侣”。她想要再次度过早年经历的同性恋生活，那是她早期婚姻中理想的日子。我们在下一部分考察了她的婚姻为什么行不通。2003年春天我最后一次采访她的前一年，由朋友安排介绍了一个女同志，这个朋友知道朱丽叶和那位女性都不会对“严肃关系”感兴趣，两个人都想要的是床上床下的乐趣而已。结果她们的确很有乐趣，并开始了一种婚恋关系。

从支持结构到意识改变

虽然单身女性经常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新单身女性所需的必要因素，但有了这些并不意味着一个单身女性会自动地接受、满意自己的单身状态。只有我们四个人在四十五六岁快到60岁期间经历了幻想破灭的过程，我们才真正接受单身生活，并承认它是一件好事。

对于瓦努娜，她的第二任丈夫的去世是一个转折点。1994年瓦努娜49岁，她的丈夫去世有几年了，她是我首次采访时很少几个没有去找伴侣的女性之一。她说：

现在同孩子和孙子们在一起，我的生活很充实，他们都住在我附近。我也想找一个，但我认为那只是因为我所受的一夫一妻制的教育的结果，我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这样做。或许到了那个时候我的期望已经改变。我并不想找仅仅为了让他围绕在我身边的一个男人。如果他是令人讨厌的家伙，我宁可没有他。我可不想一开始就要做出许多让步。我也不想去按他的安排去做事。我需要明智的鼓励以及其他方面的鼓励。我不知道是否可能在一个人身上会发现所有这些。现在我生命中第一次，我真正担心的就是我自己。

2003年初我读起这些话，回想起那时的瓦努娜，一晃已经8年多了。她还是单身，还是坚持同样的认识。她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支持结

构——尤其是她拥有自己的家，让她满意的律师工作，朋友补充了牢固的家族网络——这一切为她满意的单身生活奠定了基础。

对我来说，成为我人生转折点的是集体家庭的破裂。我吃惊地发现我喜欢在自己的家中同儿子在一起。作为一个单身母亲我已经安于这种令我满意的生活，周围有支持我的朋友圈和松散的社团，我又同父母、外甥、侄儿等恢复了联系，还有我喜欢的教学工作以及建立了一个女性研究的项目。这一切安顿下来之后的3年，我决定去找会成为好丈夫的以前的男友。在我寻找心灵伴侣期间我拒绝了他，我是不是犯了个大错误?

我正要去中西部，一方面给我的父母庆祝结婚50周年，另一方面也为了崔姆博格大家族的重新团聚。因为要从他住的城市路过，我事先给他打电话并约好和他见面。那时我的两个修女姨妈带着我7岁的儿子去了自然历史博物馆，我和拉里这是一个笔名。在咖啡馆见面。他已经娶了另一个律师为妻，她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成为他的股东，他们一起抚养她前一个婚姻的孩子。多年来拉里在州立法机构供职，作为民主党员在共和党选区重新参选了许多次。他在过着自己在30岁出头时憧憬的生活，他一定会是个好丈夫，但是我认识到我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当告诉他我与之不同的生活时，我更加意识到自己真的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我已经创造了适合我的单身生活。我拥有一个家，也是一个家庭主妇，住在大学城里，却与我母亲的生活完全不同。40岁时单身的我收养了一个孩子。在追求全职事业的同时还抚养一个混血男孩，这并不意味着我在重复母亲的生活。就像我的父亲，我是一名教授，但我是从事女性研究的教授。放荡不羁的文化人混合在城市郊区，也在改变着它。第一次，我预见到这可能就是我永久的生活方式。

在快到60岁的时候，吉莉安找到了似乎合适的伴侣，后来却意识到那不是她想要的，她这才开始接受自己的单身生活。1994年，吉莉安想要一种“美好的、深刻的、一对一的关系”。她责备自己没有投入

足够的精力找伴侣。“我希望我将找到一个长期的、深爱着的伴侣，”她说。“但是眼下的情况却是我没有这样的关系，我也没有在这方面付出很多。我还在旁观中。54岁的我或许不应该那样做。”2002年决定同萨姆分手之后，吉莉安那时已经是62岁了，感觉和以前大不相同。她还是一个人生活，但她更加“平静、安定和快乐”。虽然如果有人对她有好感，她对性爱还是持开放态度的。但她不再像以前积极地寻找伴侣，也不为缺少伴侣而悲伤难过了，不认为保持单身是自己出了问题。她的单身生活还是“很不错的”。因此，8年来吉莉安的生活没有发生什么改变，但是她的看法却变了很多。

第45节：新单身女性(45)

直到50岁时朱丽叶才放弃她那个理想伴侣的梦想。对她来说，这就意味着和女同性恋伴侣一起抚养孩子。1995年第一次采访的时候，朱丽叶刚刚遇到了帕特。帕特是一个有着5岁的儿子，比她年轻得多的女性。她们约会了8周。帕特似乎满足了朱丽叶渴望激情和伴侣的愿望，让朱丽叶高兴的是第一次她有一个“住在十分钟远的路程，在同一座城镇，有同一个区号”的女朋友。

但是朱丽叶对未来有所顾虑。“我不清楚是否想同别人一起生活，”她说，“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有一起居住的人，因为我女儿就在私立学院上学，但是显而易见它是我的房子，你要按我的方式做事。当有个人住在你的房子里时，你就要同他商量，我不想那样。在一起生活，给他洗脏袜子，我可不想这样做。”8年后读到她的原稿，朱丽叶真希望自己能听从当时的考虑。

相反，朱丽叶把自己的房子租了出去，带着儿子搬到帕特那里生活。她从同伊丽莎白的极端的关系，两个人过着分居的生活，到和帕特一起生活。回想起来，朱丽叶意识到她早期预想的传统的夫妻关系：“她有一个孩子，我想同伴侣一起抚养孩子多好呀。我女儿4岁时我同丈夫分了手。现在有机会在一个核心家庭里和同性恋者抚养孩子，我想：‘噢，我从来没有那么做过的，尝试一下太酷了。’但事情并非这样简单，只有一段时间还不错，但终究行不通。”

虽然心灵伴侣的理念似乎对朱丽叶没有吸引力，她不相信作为女同性恋的女权主义者的她已经接纳了核心家庭的文化理想。朱丽叶将近50时还和帕特一起拍拖。“和一个只有6岁的孩子给我礼物庆祝我的第50个生日真是够怪的。我自己忙于家庭教师协会和学校午餐的事。我认为‘这可不是我想象的50岁的样子。’现在过生日时，我同成年人来一起庆祝，这样感觉好些。”朱丽叶同帕特在5年的关系中一起生活了4年，但是当朱丽叶回到自己的房子时，帕特非常痛苦，并不再与她

有一点联系。不像她与伊丽莎白（现在已找到一个新伴侣）那样仍然保持着紧密的关系，朱丽叶现在与帕特没有任何来往。

当我问及朱丽叶10年之后她会在哪儿时，她回答说她肯定会和伴侣住在同一个房子里，她绝不会再搬出去。

单身生活的必要支持因素——住房；称心如意的工作（但不把它当做生活的全部），满意的性生活或一种安逸的独身状态；与下一代的联系；朋友圈子及大家族网络；社团——这些也同样是有伴侣和已婚人的支持因素。当我们步入到成年时，我们中没有几个人能真正知道我们的生命会何时结束。倘若如此，对于20、30、40岁年龄段的单身女性来说，重要的是更加清醒地追求这些目标。不管她们是不是希望有配偶，这都成为以后有更加丰富的生活和更多选择的一个铺垫。相反，把主要精力花在寻找伴侣而忽略生活中其他的方面就可能成为不幸的来源。当新单身女性成为新的文化焦点并被接受，那么年轻女性在通往单身之路上就不必做出叛逆的选择。成为一个长期单身的女性，无论是离婚的还是一直单身的，都将被当做通向美好生活的几种传统道路之一。

现如今，所有长期过单身生活的女性在经历了漫长的生存磨炼后，会逐步改变自己，适应并接受这种生活。但不是所有的单身女性都能顺利过渡到这个阶段，甚至历经重重困难才会如此的。就连前一章中提到的在二三十岁做出同一选择的女性，虽然她们为长期单身赢得一些支持因素，在五十几岁时也可能会故态复萌。也许她们投入大部分精力找寻合适的配偶而忽视了其他关系，如忽视与大家庭、朋友、同事及团体的关系。

与本书中的其他女性不同，雷切尔·布朗和贝丝·吉尔曼，在我追踪采访她们生活的这段期间变得更不快乐。两个人的大半辈子过的都是单身生活：雷切尔没有孩子，贝丝是单身母亲，带着两个有不同父亲的非婚生的孩子。在分析她们这种不快乐生活的原因时，我从一位爱尔兰自传女作家诺拉·奥法琳那里得到启发。她是《爱尔兰时报》的专

栏作家，也是都柏林的电视名人。在90年代后期，我读了《你很重要吗？一个都柏林女人的偶得拾零》这本书。此书于1996年在爱尔兰出版，很快就成为畅销书，1998年一个美国出版商再版印刷。那时，由于奥法琳对单身生活的失望使我一度深受困扰，这种自怜成为本章的题目。一读到它，我就会想到许许多多和奥法琳、雷切尔以及贝丝一样的单身女人的生活。

第46节：新单身女性(46)

过的是反传统的生活，想要的却是传统的家庭

雷切尔、贝丝和诺拉·奥法琳都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她们乐于接受六七十年代的生活方式以及当时的政治变革。如果说她们在23岁时比我们在第二章提到的那些女性更加叛逆，那就是她们太想找到一个真正的心灵伴侣了。

雷切尔·布朗认真、风趣，表达力强，性格外向、和善，一见面我就喜欢上了她。这个51岁的从未结婚的女人已经建造很多支持结构来维持可行的单身生活，但却由于没有找到爱情而不开心。在这点上，她与我采访过的那些女性没什么两样。

出生在中低阶层的犹太家庭，雷切尔和两个弟弟在美国的克利夫兰长大。17岁时（大约在1960年），雷切尔认为自己属于比特尼克族，加入争取民权的示威游行及激进的诗歌阅读社团。她对艺术史很感兴趣，上大学期间她就住在克利夫兰。60年代中期她大学毕业，那时她还是个处女。后来她去了纽约，在那里获得了戏剧艺术的硕士学位，在此期间，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雷切尔有一帮反传统文化的男女朋友，这些人对待性很不严肃。后经一些女朋友的介绍，她参加了激进的女权主义运动。雷切尔接受了这种改变，这使她经常处在矛盾之中——从性革命的捍卫者到批判者，从批判婚姻家庭到挽救婚姻危机的革新者。

起初雷切尔喜欢这种放荡的生活，她意识到“当你和想要睡觉的那个人在一起会发挥多大能力”。但她也会受到伤害——当她偏爱的几个男朋友和别的女人上床时。60年代后期，雷切尔去阿根廷待了一年（部分是因为她的硕士项目），之后又回到美国。她吃惊地发现那些老朋友发生了变化：“我们彼此说过，‘这种活法很有意思的，我们一辈子就这样过了，永远也不结婚，我们要表明人生是另一个样子’。但当我回来看到大家都结婚了，我说，‘嗨！我们继续那样过有什么不好

吗？’”现在雷切尔急切地想找到合适的人安顿下来，她又说：“我的标准太高，我不想像我妈妈那样以离婚而告终，我要的是天长地久的婚姻。”

她先在纽约，后又到旧金山（70年代搬到那里）。雷切尔在高中和社区学院任教。80年代后期雷切尔辞去了教学职务。在一个很富裕的郊区的博物馆里任兼职经理。这家博物馆装修漂亮，资金雄厚，但她的个人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她想自己可能会和别的女人发生浪漫关系，所以有一段时间她确信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但经过5年的实践并未获得更大的进展，雷切尔承认自己是一个地道的异性恋者。

1995年我第一次采访雷切尔，她有自己的房子已经8年了。她热爱自己的工作。她的父母都已去世，她的两个弟弟已有一个结婚生子，就住在附近。在她看来，和家人一起过感恩节对她很重要，但必须得和自己的弟弟争取这个机会，因为弟媳喜欢到外地过节日。经过商量，一家人包括单身弟弟在内最后同意在一起过感恩节。

雷切尔很想要孩子。30岁时她做了一次流产，因为她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抚养一个孩子。快到50岁时，在心理上她已经做好准备要个孩子。可那时她“身心疲惫”。一个年轻人和她住在一起来创造家庭气氛——她邀请了一个阿根廷朋友的儿子和她一起住了一年，他19岁，在美国上学。她渴望“短暂的亲情”。她和16岁的侄女、10岁的侄儿关系融洽。此外雷切尔有自己的朋友圈，尤其是同那些男同性恋们打成一片。其中有些人是她在博物馆认识的，还有一些是艾滋病预防机构的志愿者。

尽管创造了许多条件来维持可行的单身生活，她还是很不开心。她觉得二三十岁非常享受的性自由在四十多岁时带给她的主要是伤害。在前10年里她有过短暂的恋爱关系，却没有真正的稳定的婚恋关系。她接受心理疗法有5年了，这期间她对父母失败的婚姻，母亲对婚姻的信赖性，还有她母亲对婚姻的指责对她造成的影响有了深刻的见解。通过心理治疗她逐渐意识到“我不像自己想的那么不可救药，实际

上我已经开始相信有人会爱上我”。可她还是对自己有许多消极的看法。她称自己“关系迟钝”，“缺乏实施能力”。在本采访组的另外一个女性认为，过去雷切尔在两人关系上的许多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

第47节：新单身女性(47)

8年后在老地方我又见到她，知道她还是单身一人。我们在听她继续讲她的故事之前，先来认识一下贝丝·吉尔曼。

贝丝轻声细语、举止文静、很有魅力，这一切掩饰了她所经历过的叛逆生活。她和雷切尔年纪相仿，却有着不同的生活背景。我第一次见她时，她50岁，有两个同母异父的孩子，15岁的儿子和25的女儿。贝丝没有嫁给他们的父亲。她在18岁时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

贝丝在大学一年级结的婚，因为她当时已经怀孕，但不幸的是在婚礼当天就流产了。贝丝和丈夫辍学后搬到丹佛和他的父母一起生活。婚后的甜蜜很快就过去了，那场婚姻持续不到一年。贝丝在丹佛工作了一阵子，不久就去了亚利桑那，这离她的老家很近，她在那完成了大学学业。60年代中期，她大学三年级时，贝丝去法国学习，后又到欧洲各地旅游。她回来后从政，把自己看做一个革命者。贝丝是学校民主社团的一名创建者，同一群政治同盟一起搬进了集体住宅，这些人成了她的核心朋友。现在她还和其中的一些人关系密切。

贝丝既有激进的政治观又有传统的家庭观，这种理想与她的经历不符。现在她谈到："有朝一日我会遇到一个伟大的有浪漫思想的革命者，他会成为我的理想伴侣。我女儿的父亲在我怀孕时就抛弃了我，那时不能选择流产，一没地方可做手术，二没有这种想法。"

贝丝25岁时再次怀孕，她在社会服务专业获得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接受律师助手职业的培训，在法律服务部门工作。她和有孩子的其他女性住在公共住宅里。贝丝的母亲得知她未婚先孕后非常震惊，想让她把孩子寄养出去。1968年孩子出生，室友和附近的朋友们都来照顾她。她觉得自己似乎有了一个家，她也期望会找到另一半。她公然违抗母亲的意思，独自一人抚养她的女儿埃米莉。后来贝丝的母亲特别喜欢埃米莉，和埃米莉关系融洽。

1975年，她住的公共住宅解散。贝丝决定搬到加利福尼亚，住在圣克鲁斯。她最好的朋友也是一位单身母亲，她们又重新安顿下来。她们一起照顾孩子。贝丝在大学找到一份秘书工作，并学习西班牙语。不久她又搬到旧金山附近的一个郊区去，那里有她的朋友，也有更多的工作机会。起初她在一家大的社会服务机构当秘书，由于她会说流利的西班牙语，又有法律专业的背景，以及出色的组织才能，她逐渐晋升到今天的项目经理的行政职位。

70年代后期，贝丝从事监狱的法律援助工作，她遇到一个有名望的黑人政治囚犯，他正在监狱服刑，18个月之后被释放。她爱上了他，不久他们就同居了。或许他就是她梦想的伟大的革命者。他们两人都不相信婚姻，但贝丝认为自己找到了心灵伴侣。后来她怀孕了，这次她不想再当单身母亲了。她知道自己可能会成为这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可她希望她的另一半能成为一个好父亲，给予孩子更多的爱。他们在一起生活了4年，贝丝的幻想一点点破灭了。那个人没工作，在街上闲逛，沾染了吸毒的恶习，还出口骂人。贝丝说："我不会让儿子在这种人身边长大，那个人命令我和女儿做这做那，他不尊重女性。所以我不客气地把他撵走了。"

贝丝快40岁了，带着14岁的女儿和4岁的儿子，没有朋友能帮助她。作为单身母亲，贝丝可以和朋友们谈论她的问题，但她们都不能帮忙照顾孩子。埃米莉讨厌上高中，性格叛逆。所以贝丝给埃米莉的父亲打电话，他从来不照顾孩子，只是偶尔给点儿钱。他还住在亚利桑那，目前收入不错，有稳定的恋爱关系。他同意让埃米莉和他试住在一起，在图森上高中。贝丝的母亲、姐姐和其他家庭成员就住在附近，埃米莉很喜欢他们。埃米莉和父亲有了交往，在新高中表现出色，这使贝丝的心里感到一丝慰藉。她高中毕业了，正等着上大学。

1994年我首次采访她时，贝丝在多年没有感情生活之后，与一个男人约会6个月了。贝丝认为她最终找到了心灵伴侣。虽然她没想要结婚，但50岁的贝丝渴望与永久的伴侣在一起生活。贝丝有很多朋友，

但她说她的社交圈里很多是夫妻。她不只一次觉得心灵孤独。9年后我和她单独见一次面，才知道那次恋爱使她多么失望。

第48节：新单身女性(48)

诺拉·奥法琳比雷切尔、贝丝大几岁，在一个比较保守的环境中长大，在二三十岁时过着反传统的生活。虽然诺拉·奥法琳在事业上比雷切尔和贝丝成功、出名，但在她身上我还是看到了很多单身女性具有的相似之处。

由于申请了奖学金和来自家庭、朋友的经济支持，诺拉·奥法琳在加州大学都柏林学院学习英国文学。在60年代早期，在英国赫尔大学修过一年的研究生课程。后来诺拉在爱尔兰得到最佳奖学金，这足以支付她在世界任何地方上学的费用。她选择了牛津大学，又学了两年，有了牛津大学的学位。她在加州大学英语系当一名讲师。几年后，她和男友一起回到英国，在英国广播公司找到一个职位，为新开放大学人文学院制作节目。她喜欢挑战、旅游，不久又调到英国广播公司的另一个部门，成为新公众节目“开门”的制片人。

尽管她对工作感兴趣，工作有创造性的表现，但二三十岁的诺拉无意只发展事业。她在自传中写道：“我生活的目的就是爱与被爱，以某种方式那会得到实现的。同时，我也兼顾工作。”诺拉·奥法琳：《你很重要吗？》，都柏林：新爱尔兰出版社，1996年。关于个人生活她很矛盾。年轻时，她经历了两次持续时间较长的严肃的恋爱关系。她想过和他们两人结婚，诺拉写道：她在找一个她爱的人，和他生个孩子，但她不想当个家庭主妇。她最佩服的两个爱尔兰女性都是著名的单身女作家（其中一个是莫拉·拉韦蒂，那时是爱尔兰知名的女作家），但她认为她们是孤独者——她不想自己像她们那样

奥法琳：《你很重要吗？》，85~86页。。

诺拉最严肃的一次恋爱关系是和英国作家鲍勃（长达10年），他们的关系充满了波折，两个人都另有他人。虽然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她生活圈里的文化观念允许她与别人有性爱关系，诺拉还是渴望一个美满的婚姻。鲍勃曾经想娶她，可诺拉拒绝了，部分是因为天主

教家庭的反对，部分是因为她的理想——嫁给一个她想要的男人。诺拉·奥法琳承认她对爱情过于理想化，她崇拜一个英雄式的伴侣。

三十八九岁时，她和鲍勃两个人的关系开始走下坡路，她借酒消愁，决定和鲍勃分手（1977年）。她回到爱尔兰，办了一个收视率很高的电视脱口秀节目，后来又成了一个受人尊重的专栏作家。但是她对自己的个人生活还没有成熟的看法。她逐渐意识到在日常生活中“理想主义成了摧毁的因素，它表现为一种怀旧、一种追逐，或者某种更好的东西——更势不可挡的感情——甚至比实际发生过的最好的关系还要好”奥法琳：《你很重要吗？》，128~229页。。

那些年诺拉一直没有怀孕，她觉得很幸运。39岁时她意外怀孕，但很快就流产了，她不记得当时的感受了。50岁时，她在自传中写道：“我还不清楚。”奥法琳：《你很重要吗？》，161页。但她承认她不能接受没有孩子的状况，“我一生中大部分都会是不称职的母亲。但现在的我会成为一个好母亲。但是太晚了，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小孩，当母亲给他穿毛衣时还在那不停地蹿上蹿下，或在公共汽车我前面的座位上靠在窗户上自言自语。他们真是太可爱了。”奥法琳：《你很重要吗？》，192~193页。

像雷切尔一样，诺拉回到了都柏林，与一个女子（另一个爱尔兰作家、女权主义积极分子）内尔·麦克莱伦好上了。和雷切尔尝试着与女性建立浪漫关系不同的是，诺拉对内尔的爱恋与日俱增，她们买了一所房子在一起生活长达15年。这使她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有了一个家，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喝酒度日，现在她身体比以前更健康了。诺拉从来不用女同性恋或双性恋这样的字眼。她把这种关系称为爱的伙伴。五十五六岁的时候，当她们的关系终止时，她受到了伤害，感觉很失落。

失败的婚恋关系

前几章描写的女性在婚恋关系上当然很不成功。当婚恋关系破裂时，一些人的感情受到伤害，在失败、自责中痛苦不堪，成为婚恋的

受害者。但是她们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自己的生活中，其中有一些人是为了孩子而付出。在我跟踪报道她们生活的时候，这些女性轻描淡写地说起她们的失败关系。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们放弃了只有找到新伴侣才是幸福的必要条件的想法。然而，雷切尔、贝丝、诺拉虽然还不能摆脱在恋爱关系中受到的挫折和伤害，但她们依然表示出要找伴侣的强烈愿望，因而经常忽视生活中其他方面的关系。

第49节：新单身女性(49)

2003年6月我在雷切尔家里再次采访她，离我第一次见她时已过去了8年。59岁的雷切尔风韵犹存，穿着时尚的衣着，像以前一样风趣活泼。她住在一个富裕郊区的前卫小区。她带我看了她漂亮的房子——视野好，装修得很有艺术特色。

但从雷切尔的谈吐中一下子就能看出她不满意这所房子，她说到地段昂贵，还有她讨厌住在离市中心太远的地方。她正考虑卖房子，她需要变化，有可能用卖房子的钱去旅游，还可能住在墨西哥、巴厘岛或国外的某个地方。雷切尔是一个没有“家”的概念的女性。

不久，雷切尔讲道，在前8年她花太多的精力找伴侣，结果她又一次失败了。在那段时间里她有过两次重要的关系，一次持续了6个月，另一次一年多。时间较短的那一次对她来说更有意义。雷切尔遇到了麦尔，他们在晚会上相识，麦尔大半辈子都是单身。她55岁，麦尔58岁。与前几次关系不同的是，在这次关系中性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麦尔的矛盾情绪或性功能障碍。但是对雷切尔而言，他们的交往富有情趣——笑声不断，心心相通，彼此体贴。当麦尔结束这段关系时，雷切尔的心都碎了。她说：“我用了很长时间才恢复过来，我的心在哭泣。”

可能是害怕其他人责怪麦尔，雷切尔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她又是做心理治疗，又是参加恋爱关系的交流会，这对她的心理恢复很有好处。她尤其喜欢的一次主题是“人生作品”。这是受了《找到你喜欢的男人》这本书作者的引导。听从交流会老师的建议，她强迫自己在网上约会。通过速配网她遇到一个男人，和她相距有4个小时的路程。她解释说：“第一见面我们都说不像是一对，但还是上床了。性爱真伟大，使我们走到一起。我对他很依恋，但是他后来甩了我，那是两三年前的事了。他伤害了我，但没有另一个人对我伤害得深。”

尽管近几年来雷切尔没有一个成功的网恋，她还坚持网上约会。如果她考虑记者李·瑞奇有关网上约会（或征婚广告）与现实的约会过程巨大差距的分析，也许她会做得好些。

目标——亲密——关于一个完整的人；她的社会背景、工作、朋友、家庭以及她建造的生活、兴趣、倾听的方式、分享的方式，她必须给予多少以及她想要索取多少。整个过程——像电视征婚和征婚广告这样的机构，使她脱离了她的社会背景，只注意到她不得不展示的——面容、体形、磁带上两分钟内说话简练的能力或45分钟的咖啡时间

李·瑞奇：《现实中的单身女性：30个女人在婚姻世界中的探索故事》，波士顿：法伯&法伯，1996年，149页，下同。。

由于雷切尔把大部分精力花在寻找浪漫的关系上，生活中的其他关系她顾不上了。那群男同性恋朋友不再往来，她又交了三个新朋友，其中的一个是在网上速配认识的："我俩见面时都没有感觉到异性吸引，所以成了最好的朋友。现在我们还是朋友，我猜爱情带给他的是痛苦，很多次他受的伤害太深了。"

他住在一小时车程外的地方，可能因为他们俩同病相怜，但雷切尔觉得有必要和他分手。那两个新交的女朋友，一个住在4小时车程远的地方，一个住在纽约市。这样一来雷切尔附近没有朋友，没有定期可见的朋友圈，雷切尔把自己称做"隐士"。她承认自己需要更多的朋友，但没有具体的实施计划怎么找朋友。

自第一次采访以来，雷切尔与家庭和下一代的关系更加疏远，她对阿根廷那个年轻人付出的母爱也没有得到回报。雷切尔说："他现在在硅谷工作，挣的钱比我多，不给我打电话，有一次他来时正赶上我和他父亲吵架。我觉得他儿子没有告诉他我对他的帮助有多大，因为他的儿子当时很窘迫。我觉得自己受到了他们的怠慢。他们没有因为我为他们付出的一切而感谢我，我为他付出太多。"

她与住在附近的两个弟弟之间也有矛盾，她与弟弟两年见一次面，还是在他生日的那一天。雷切尔不喜欢与他弟弟拍拖6年之久但还没有同居的女友。雷切尔经常能见到另外一个弟弟、弟媳、侄女和侄儿。在逾越节、感恩节及其他节日时，雷切尔总是跟他们在一起过。去年的感恩节，作为客座馆长的雷切尔在洛杉矶待了三个月。她弟弟带一家人来她那儿过节。雷切尔说："结局闹得很不愉快。"雷切尔在生二十多岁的侄女和十多岁的侄儿的气，"他们把沙子带进房间，弄得到处乱糟糟的。"她弟弟护着孩子，这使她更为恼火，雷切尔称做"人格诋毁"。从那以后他们都尽量弥补，可七个月过去了，依然有些裂痕。雷切尔认为不经常见他们更好些。她以前太依赖他们了。在洛杉矶的事很影响她和侄女、侄儿的关系，再也不像以前那么亲密了。可以看出，雷切尔的家庭关系一般，与下一代的关系也不令人满意。

第50节：新单身女性(50)

虽然她不再渴望生个孩子，但雷切尔不愿承认自己没有子女。她看到自己同有孩子的人相比处于劣势：“我看到与我年龄相仿的人的孩子结婚生子，他们的生活似乎比我的充实得多。十多岁时看起来很平常，但当了爷爷奶奶就很有魅力，这一切看起来像自动形成的团体。”

作为一个单身女性，更糟糕的是在博物馆与合作经理的长期冲突，这场冲突最近演变为公开的战争。雷切尔详细地描述了她的同事，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7年，雷切尔承认他有才华，工作非常出色，她却从未喜欢过他。谈话时，她表示出他给她造成过危机。最近，又有一次冲突，关于谁要负责有关女性的一次特别展览，雷切尔觉得理所当然应该由她来做这件事，她呼吁与他们俩约谈的董事会主席由她来负责这件事。交谈过程中，雷切尔失去了理智，竟然辱骂了那个同事，当时他冲出房间。经过反思后，雷切尔给他和主席写了一封道歉信。后来，那个同事撤销了投诉。即使明年雷切尔的合同还可以续签，她真不知怎样继续在那儿工作下去。

目前雷切尔正考虑从她热爱的并为她提供身份和社团的岗位退下来。她还想另外再找一份工作，可能她会成为一个游记作家，也可能来完成她业已从事多年的电视剧本。但这两个选择似乎都不足以令她兴奋。

雷切尔现在又孤单又沮丧。除了在博物馆发生的事外，那里对她来说不再是社团基地，那儿也没有她真正的社交团体。她想到的解决方案就是找到一个令她心仪的男人建立永久的关系。社会心理学家在争论这样的方案是否会使单身女性真正幸福。根据一次对15岁以上的24000人的个案研究表明：婚姻只能带给个人短暂的幸福，几年后人们就感觉不到比婚前更幸福了。理查德·卢卡斯和同事做出总结：“一般来说，婚后人们满足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卢卡斯，克拉克，乔治里斯，迪纳：《重新考察幸福的适应性与固定模式：对婚姻状态的变化反映》，见：《个性与社会心理学》，2003年，第84卷第3期，537页，下同。

采访雷切尔之后的几周，我再次和贝丝·吉尔曼联系。我详细询问了9年来她抱很大希望的那次关系。贝丝回忆当初她被乔吸引，乔比她小10岁，是个魅力四射的政府官员。贝丝与他度过了非常美好的时光。她加入了自己热爱的骨干分子团体，他们在一起共度了4年。贝丝喜欢住在一起，但乔拒绝了。“我们住得很近，”贝丝解释说，“乔总想有自己的小空间，以前他总是住女方的房子，关系破裂时他就没家了，所以他不想重蹈覆辙。”除此之外，贝丝知道乔不想和一个十几岁的问题少年住在一起。

她的儿子约翰是个“来自地狱的少年”，高中就辍学在家，开始酗酒吸毒。贝丝用药物治疗他的精神颓废，要求他去工作，做家务活。她和儿子度过痛苦的3年时光，这段时间乔也和他们在交往。

在第四年，贝丝觉察到乔对她说谎，可能已经说很长时间了。他又有了别的女人，贝丝悲痛之中提出与他分手。她知道他俩之间不会很久，可能他是个感情骗子。事隔4年多，贝丝和我谈起这件事时，说自己还没有完全从那次感情伤害中恢复过来，她不再想找另一个男人了。她接受自己的单身状态似乎不是出于积极的因素，而是由于幻想破灭。另外，她把婚姻当做幸福的唯一选择，无形之中又限制了她创造积极的单身生活。

贝丝一直没买房子，想找一个“革命者”的想法阻碍她做一个中产阶层的房主。就在她和乔关系破裂后，她长期租房子。当租赁楼被卖掉后，她被迫搬到另一个城镇。搬来搬去和关系的不稳定干扰了她的正常生活，她的朋友也都与她疏远了。

贝丝和乔在一起的那些年，她的三个好朋友——一对夫妇和一个单身都搬走了。因为贝丝没有时间交其他的朋友，她的精力都放在乔身上，和其他的夫妇仅有一些社交活动。贝丝没有费心寻找新朋友。

虽然她还偶尔联系或碰见从这儿搬走的朋友，贝丝需要的是在当地找到朋友，她需要有人和她一起去看电影、听音乐、出去闲逛，这些以前都是她单独和乔进行的活动，她也需要能一起旅游的朋友。

第51节：新单身女性(51)

但是几年来，由于贝丝婚恋关系带来的失落情绪，她没有走出去。由于她长期做监督工作，这不利于交新朋友。我问："你以前的那个政治团体怎么样？现在你已经完全从感情中恢复过来，那不是交新朋友的好地方吗？"贝丝回答："我和乔在一起时，政治团体是我俩关系的一部分，当地的许多政治活动我都积极参与。可当我们分手后，因为他在那里，我终止了在那儿的一切活动。如果我参加某项活动，他总在那儿，这真是尴尬的局面。我不敢面对人们问我：'乔在哪儿？'"

我肯定看起来很吃惊。贝丝说道："我需要退出一阵子，这样会对我有好处，但我不想永久退出政坛。或许我该学会谅解，毕竟这事已过去4年了，我不再渴望得到他。但我就是不能容忍最信任的人对我说谎，那就是背叛。"

有证据表明宽恕有助于贝丝对生活更满足，能结交新朋友。有关宽恕研究的概要，参见戈雷戈·伊斯特博卢克：《进步的矛盾》，纽约：兰登书屋，2003年，第8章，下同。

和雷切尔一样，贝丝的婚姻关系一直很不顺利，虽然她有家庭生活，有称心如意的工作，但在贝丝和乔分手后，她没有了家，也失去了往日朋友的关爱，周围没有支持的团体——这对单身生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支持。

诺拉·奥法琳的《你很重要吗》是她在与内尔终止了长达15年的关系之后的几年间写的。比起雷切尔和贝丝来，她拍拖的时间要长得多，这样一来，在她五十几岁时，单身的沮丧情绪会更严重。和她们一样，诺拉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她急于找到一个新伴侣——心灵伴侣，一个男人。诺拉写道：

在我身边有无数人想过，你需要另一个人才能完善自己并且别人也需要你去完善别人——在一起时你能展现出最美好的世界，奉献最

美好的你……我生长的时代和文化氛围告诉我，我的附近会有个人——我的另一半——在我的身边走，那个人会看到我。但是一个女人过了成为性伴儿的年龄……谁又想了解她们？如果她们没有伴侣会怎么样？如果她们不是为人母、为人妻、为人爱呢

诺拉·奥法琳：《你很重要吗？一个都柏林女人的偶得拾零》，纽约：亨利·霍尔特，1998年，178~180页，下同。？

诺拉用凄婉的语言结束了这个自传："那就是我描述的生活……任何事物都是它自己，彼此分散又彼此靠近，由同一材料构成但彼此又不相容……没有稳固的堆积；一切都是瞬间发生，在我面前呈现一个远景：虚无却难以形容的空旷。就在二者之间——风景中的石头和广阔蔚蓝的天空——那就是我所在的地方。"诺拉·奥法琳：《你很重要吗？一个都柏林女人的偶得拾零》，188页。

两年后在美国出版的自传后记中，诺拉回忆了当她得知自己写了一本畅销书时非常吃惊，惊讶于发现"我考虑的个人问题原来对别人也有价值"诺拉·奥法琳：《你很重要吗？一个都柏林女人的偶得拾零》，190页。。她收到上千封来信，这些读者向她表达了她们的烦恼，对她的崇拜和爱戴。让诺拉遗憾的是，她以前的情人没有一个人写信给她，没有一个人约她。

我最后采用的书名《你很重要吗？》，但很长时间我都想用"个人公告"。因为它很直白，尤其它坦白——逃避地，太渴望我不能满足的性欲。曾经有大量信件涌来、产生反响时，我甚至开始希望有那样的事发生。或许有人读了这书，找到我，改变我的一切？但什么也没有发生。我要出去，外面会有赞美、感觉甚至戏剧……我回到我安静的房间。我会问我的猫和狗："当我出去时，有什么白马王子、公主从烟囱下来吗？没有？我想也没有。"

诺拉·奥法琳：《你很重要吗？一个都柏林女人的偶得拾零》，206页。

后来，有个男人有这方面的意思，可在约会时他没露过面。诺拉·奥法琳坦率地总结道：“即使我的追求是拙劣地模仿爱情，我永远也不会停止。”诺拉·奥法：《你很重要吗？一个都柏林女人的偶得拾零》，214页。

第52节：新单身女性(52)

家庭出身与单身生活

考虑到底是什么因素引起三位女性不幸的单身生活时，我开始关注她们生长的家庭环境，并与同样是单身但能精心设计满意生活的那些人作一比较。在第二章描写的我们那些人与母亲之间关系不亲密，谁也不选择复制母亲的生活。但我们都来自稳定的家庭，有着比较快乐的童年。我知道雷切尔和诺拉的情况不同，但对贝丝的童年了解还不够，我只知道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母亲和姥姥陪伴她度过忧郁的童年。第三次采访她时，确定她的童年的确很不幸，倒不是因为父母离婚这件事，而是她母亲再婚，她有一个动不动就辱骂不止的继父。

由于恐怕我的个案研究事例太少而不具有概括性，我假设父母关系不合和童年的阴影成为妨碍快乐单身的因素，但是这不至于摧毁一个女人有能力发展独立的自我意识，或为满意的单身生活精心设计的社会支持结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父母之间关系不和谐似乎可以导致女性内在地将其转化为一种文化信息：人的一生一定要有伴侣才会快乐。在第二章提到过的玛拉·戴特维勒和桃乐茜·索娅两个人就是这样认为，她们对自己的性能力非常自信，可能对于弗拉明戈舞蹈演员南希·迪安也如此，她们都有不幸福的童年。然而，通过施展女性魅力，这三个女性增强了自尊、自主性，这有助于创建支持她们长期过单身生活的社会关系。雷切尔、诺拉、贝丝能走出童年的阴影吗?

在小组采访中，雷切尔首先说起她的父母是“完全不同的两路人。这个糟糕的婚姻持续了23年，”她说，“他们喜欢完全不同的事，父亲爱钓鱼打猎，母亲不能容忍他在外面。虽然他们都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可母亲却喜欢读书。我母亲出生在正统犹太家庭，我父亲的家庭已经完全美国化了。”雷切尔说，她母亲鲁丝是个不开心、极为焦虑的家庭主妇，与丈夫汉克完全不相容，有闯劲的汉克在贫民区开一家五

金店。10岁时雷切尔非常同情她父亲。但现在她知道他有很多婚外情，其中一些持续几年。成年的雷切尔知道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是个非、美混血儿。

不幸的婚姻致使鲁丝经常把愤怒发泄到雷切尔身上，生雷切尔时难产的事经常挂在她的嘴边，鲁丝说当她疼得死去活来时曾请求护士给她喝毒药。后来不管什么时候，她对雷切尔生气时，她总说："我真希望当时护士把毒药给我。"鲁丝常常打击雷切尔的积极性，但有时也需要雷切尔在情感上的抚慰。例如雷切尔还是十几岁时，鲁丝找到一张汉克女朋友的照片给她看，寻求她的同情，从而打消雷切尔对父亲的依恋之情。回忆中雷切尔说："他们俩都缺乏沟通能力，完全不知道怎样达到自己的目的。"她还不得不扮演照顾他们两人的角色。

在50年代雷切尔的父母还没有意识到有可能离婚。在60年代早期，家里最小的儿子经营一家小吃部，汉克这时离开了家。现在最小的儿子已经长成个男人，工作也解决了。雷切尔只负责照顾母亲。她回忆起他父亲收拾东西要走的那天，只有5英尺高的鲁丝上演了一个戏剧片断，她成了主角。只见鲁丝在房子周围跑着，大声尖叫，手拿一把大菜刀，说要自杀。雷切尔既鄙视又恐惧她，她夺下刀，但她母亲又跑到地下室，雷切尔听到号啕大哭的声音，好像拿着汉克桌子上的锯刀。雷切尔静静地等了几分钟。"我看看她是不是好点儿了。"她想。当她到地下室时，鲁丝站在那出神地望着锯齿。雷切尔把锯拿走。"在那一刻我特恨我母亲，那时我17岁。"雷切尔说。

虽然鲁丝自杀未遂，但却患了神经衰弱。雷切尔渴望上大学，这样才能离开这个家。她不愿意上地方大学，住在家里照顾她母亲。鲁丝离婚几年后才平息那场婚姻带来的打击。在第四年时，雷切尔就远离这个家庭了。

雷切尔继续讲她的"连续剧"。她父亲的另一个女人不久"患了骨癌"，他不得不照顾她，按摩她身上的每一个部分——直到她离开人世。"我母亲说，'我不希望她得那病。'我肯定她是那样想的。但是如

果她的希望灵验，她一定会不舒服的。”后来鲁丝恢复过来，有了自己喜欢的公寓，作旅游计划。但59岁时她突然猝死，汉克不久也离开了人世。

第53节：新单身女性(53)

贝丝的故事却是另一番情节——更加平凡，缺少戏剧性，但几乎是毁坏性的。贝丝在东部出生，父母离异时她只有两岁。她母亲搬回到亚历桑那，那儿离她自己的姐妹很近。贝丝再也没见过亲生父亲。贝丝7岁时，母亲再婚，又生了一个女儿。和雷切尔不同的是，贝丝认为她母亲和姥姥都是伟大的母亲，但贝丝与继父的关系不和。“他们结婚时我母亲肯定30岁刚出头，他也是。”贝丝讲道。

起初我非常喜欢他，尽力引起他的注意。可是他一向对我冷冰冰的。孩子们从来不敢在他身边。我尽力让他喜欢我，他总是冷漠、挑剔，没有爱心，也不接受我。他不是长得凶，只是感情冷漠。我越来越恨他，一看到他就害怕、憎恶。虽然我请求母亲离开他，可母亲不想再经历不光彩的离婚，还和他在一起。我妹妹毕业后，那时我离开家已很久了，我母亲终于与他分手了。

贝丝说家庭因素对她影响很大。由于继父的仇视，她内心“伤痕累累”，这也影响到她和母亲之间的关系。“他打骂时母亲不保护我，”贝丝说。

幸运的是贝丝和姥姥以及继父的父母关系融洽，他的父母心地善良，有爱心。她和他们很亲近。他们也说从来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儿子对她如此苛刻。但是贝丝很小的时候这个奶奶就去世了，她与爷爷的关系也随之疏远。她奶奶是个内心坚强有爱心的女子，树立了美好的婚姻形象。贝丝这样描述她奶奶：

她意志非常坚强，有爱心，是她把家庭凝聚在一起。她一家人乘大篷车穿过大草原，住在南部达科他的一个草皮房子里。我奶奶嫁给了一个医生，成为有产阶层，在大萧条时期还过着富裕的生活。她有四个孩子，是个受人尊重的女士。作为一个已婚妇女，她上教师培训学院，在那时候还不多见。后来她成为一名幼教老师，爱孩子。战争期间她离婚了，她丈夫与护士有了婚外情，这在她住的小镇成为一大

丑闻，她更是觉得莫大的耻辱。她不允许自己在场时有人说起他的名字。这样她搬到了东部，帮助我和母亲。她们搬到亚利桑那在一起生活，一直到我母亲再婚。

贝丝高中毕业就离开家，选择在中西部的一个学校上大学，部分因为她想尝试与住在芝加哥的父亲联系上。大学一年级刚刚过几个月，她计划和男友一起开车去芝加哥看他。“那时我18岁，我真的，真的好想见到他，尤其是我有那么可恨的继父。我很想知道我从他那遗传了什么。他是一个新教牧师，从未再婚，也没有其他的孩子。”她从母亲那里得知她父亲酗酒。他们在一起时，他就曾经想自杀。但是给贝丝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能在教堂担任这样的职位。

就在她计划去芝加哥之前的几周里，她得知父亲死了——死于酒精中毒，她猜想。不管怎样，她决定去芝加哥看他母亲，她已经很老了。贝丝重温那段经历：“她和我一起待了几天，给我看相册里的照片，谈论他。她是位特别可爱的女士，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我不禁哭了又哭，我也见到了看望她的几位表亲。从那之后我再也没看见他们，我们没有任何联系。这是与我父亲那一方关系的净化，我想。”

大约4年前，贝丝母亲告诉她，她外祖父已经自杀了。当然，没有了亲生父亲，被继父虐待，再加上妈妈婚姻破裂的负面影响，贝丝对男人和婚姻没有一点儿好印象。她最向往的是一个理想的革命者。

20世纪40、50年代，诺拉在都柏林长大，住在贫富交叉的地方。她父母都受过大学教育，她父亲是个名人——都柏林的第一个记者，撰写日常社交栏目，如接待会、晚会、小镇每晚发生的事等。他出去时身穿体面的燕尾服，出入有私人司机接送。而她母亲带着9个孩子待在家里，经常处在缺钱的拮据状态，更别说有什么奢侈品了。但是诺拉（第二个孩子）真正面对的是情感上的贫穷。诺拉和其他的孩子都知道他们的父亲是个好色之徒，一个又一个的情妇，还有几个私生子。她母亲憎恨自己是个家庭主妇，不管孩子，每天借酒消愁。诺拉

14岁时，她父亲凑够钱把她打发到天主教寄宿学校，诺拉觉得自己有救了。

第54节：新单身女性(54)

一个痛苦的家庭留下的是复杂的情感，因为诺拉的父亲从来没有完全抛弃他们。“当你想应该恨他时，”诺拉回忆说，“他又会表现出爱心和一些感情细腻的举动。”奥法琳：《你很重要吗？》，163页。这很有诱惑力，因为平日里缺少母亲的爱。虽然她母亲对丈夫保持“伟大的感情”，她醉醺醺地讲述新婚时他们在一起美好的时光，任何一个孩子“她都不在乎”

奥法琳：《你很重要吗？》，172页。，诺拉说。她问：“我的父母怎么就不多关心一下他们身边的小孩子呢？他们怎么不把孩子们抱起来安抚呢？我父亲怎么就会用军用带子捆绑毫无反抗能力的儿子们呢？”

奥法琳：《你很重要吗？》，197页。

当她二三十岁时，诺拉重温她父母的生活。像她母亲一样，她喝酒成瘾。迷糊之中，她也和一个男人有着10年的特殊关系，而这个男人身边经常有别的女人。她像父亲一样，成了一名记者，这给她带来价值承认和乐趣。但她从未把工作看得和她的私生活一样重要。诺拉最后说：“不是巧合……在我父亲去世后，几年后母亲也离开人世，我身体越来越健康了。”

奥法琳：《你很重要吗？》，163页。

超越家庭的负面影响，成为新单身女性

像诺拉、贝丝、雷切尔这样的女性，不管是有伴侣还是单身，成长过程中没遇到快乐女性的实例，在儿童时还遭受虐待，她们似乎更长期坚守完美的婚姻是人生幸福的必要因素的理想信念。她们很难建立令人满意的单身或者有伴侣的生活。但是，贝丝和诺拉正在变化之中，雷切尔可能也在变化着。

贝丝不再寻找心灵伴侣，“一个完美的人在那等着我。”现在她说，“我很理想化——对于革命和婚姻关系。当然我父母没有给我提供

一个现实的美好婚姻模式。我没有什么可憧憬的，这种理想只存在于我的想象中。”这种意识表明贝丝对满意生活的新概念持开放态度。

密切的家庭关系促使贝丝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与她的孩子和外孙们的关系。50岁时贝丝是个单身母亲，是采访对象里最不开心的单身母亲之一。但在59岁时，她陶醉于孩子们的成功事业、彼此的亲密往来、与她的亲近关系。

贝丝自豪地谈起她女儿埃米莉的人生经历：在亚利桑那上高中和上大学时，她都回加州和贝丝、她弟弟一起度假。当她弟弟是个问题少年时，她就帮他解决问题。大学毕业后，她在美国军队服役几年，又回到海湾地区上研究生，拿到硕士学位，在旧金山找到一份好工作。贝丝很为埃米莉骄傲，她今年33岁，单身。贝丝这样说埃米莉：

她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女权主义者，也是一个环境保护者。她比我强得多，我年轻时妇女解放运动甚至不存在，我那时的政治信仰也模糊不清。埃米莉不喜欢粉红色，从不卷发，不剃体毛，不管别的女孩怎样说她，她就是她自己。她已经有长期的婚恋关系，但她不喜欢在一起定居。她可能担心是否会有孩子，但她从不谈起这件事。她的私生活很保密，但我知道她不想做个单身母亲，有孩子没有爸爸可不是她的选择。

贝丝对埃米莉单身的乐观态度表明她看待自己这种状况的变化。

贝丝儿子的变化以及她和他的关系更加戏剧化。约翰21岁时爱上一个高中刚毕业的女生。在约翰22岁、女友20岁时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她一怀孕，他们就搬到一起，他有一份好工作。2003年他们结婚，又有了另一个孩子。贝丝很爱两岁的孙子。她每周都抽出时间来照顾他。埃米莉也非常喜欢小孩，定期开车去看孩子，她想让他知道她是“姑姑”。

两年前贝丝57岁时，她第一次卖掉房子。由于租房子，她得经常搬家，离开她熟悉的房子、邻里和社团。她租的小房子位置好——她爱那个房子——要打折出售了，房主给她优先购买权。贝丝考虑到这

超出自己的支付能力，但埃米莉让贝丝的母亲出钱帮她。贝丝一直自豪自己能自立，从未向母亲要过东西。但出于女儿埃米莉的压力，她接受了母亲的资助，买了那所房子。她爱自己的小房子，喜欢长时间呆在花园里。

第55节：新单身女性(55)

然而，贝丝认识到只有住房和家庭生活是不完整的。我以前说过她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需要，她与政治团体重新取得联系，来结交新朋友。她要把精力放在——不是放在寻找关系上，而是第一次贝丝对自己的单身生活感到知足。

2003年我读诺拉自传的续集《差一点到达：一个都柏林女人的前行之路》时，我吃惊地发现她的观点也变了

诺拉·奥法琳：《差一点到达：一个都柏林女人的前行的路》，纽约：河源出版社，2003年，下同。。在新书中，诺拉·奥法琳批评了7年前《你很重要吗？》的结尾："我的视野多么模糊，一点儿微不足道的事妨碍了我的生活，时光一去不复返。其他的人在哪儿？现实世界中的石块、空气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在以后的那些年里，与雷切尔不同，但与大多数参与者相同，诺拉已经为单身生活建造了支持因素，并逐渐改变自己的意识来接受单身状态奥法琳：《差一点到达》，263页。。诺拉发现"幸福——或者如果不是幸福，达观的看法就是如何弥补缺失的部分并好好生活——已经在一点一点靠近我"奥法琳：《差一点到达》，149页。。她能够看到"长时间以来，这种观念一直在指使我们，如果我们不和别人在一起，我们就是二等公民，我们逐渐对此深信不疑"奥法琳：《差一点到达》，160页。。

由于这种意识的改变，她写了一部自传体小说《我梦见了你》（2001年），写的是有关一个爱尔兰女性中年单身的故事。她能够拒绝一个已婚英国情人的建议——她住在一个地方，他每周可以去那两次——实际上让她变成他永久的情妇。奥法琳清楚地阐明她思想的变化，使她改变了小说中的自我做出这个决定："我认为我的大部分人生都无力拒绝这种要求。"她写道，"我本不会衡量没有家庭、朋友、工作及团体意味着什么。我本来认为，或对或错，只要有书、自然界和

动物的陪伴我就能活得很滋润，只要像光束一样照到我，就像凯瑟琳的情人向她发誓他能。”但诺拉现在看到，“仅仅为爱活着这不符合凯瑟琳的性格。她已经变得博爱生活，即使为了诚实的感情，也不要毁掉自己的生活。”

奥法琳：《差一点到达》，147~149页。

诺拉生活中真正的变化领先于思想的改变。她在爱尔兰西部买了一座农舍，一个人生活得自由自在。她也谈到逐渐认识到友谊的重要性。与内尔持续15年的关系破裂之后，她搬到一个男朋友那儿，与一些男男女女重新建立起友谊。以前，她把友谊看做“所有关系中最平凡的，同爱情不能比的”

奥法琳：《差一点到达》，14页。。现在她认为，“友谊，日常生活中幸福的部分来源……让人知道什么是被爱”

奥法琳：《差一点到达》，152页。。

此外，诺拉描述了与她在世的七个同胞兄弟姐妹及他们的孩子及他们孩子的下一代重新建立的联系。她邀请其中的四个同胞及他们的配偶去意大利旅行一起庆祝她60岁的生日。她吃惊地写道：“我们这个家庭剩下的这些人从未一起度过假，连家庭集体远足都没有，一次也没有过。对我们而言，每一次聚餐都冒着风险。”

奥法琳：《差一点到达》，170页。现在，家庭一起度假每年一次。

刚过60岁，诺拉又有一次新的恋情。在那一阵子她正在写小说，住在纽约。在那里通过牵线网站，她遇到一个离异的美国律师。他们和他18岁的女儿在乡村农舍一起度过部分夏日，但诺拉自己不太满意。那个律师热衷于工作，长时间花在工作上。此外，诺拉觉得很难和他女儿一起拥有他，尤其是诺拉很不习惯她身边有小孩子。在新的自传中，她表示出这种不满情绪：

这些父母亲能了解在父母之外的其他任何人的感受吗？孩子一定要参与成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吗？我是指在约会看完电影《美女与野

兽》之后给他们做空心粉、奶酪、读故事、帮他们刷牙，找卫生纸，父母还能有时间做什么呢？可能父母觉得没什么，但是一个局外人也觉得没什么吗？谁会要一个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她作决定，谁对与一个成熟男人谈恋爱感兴趣？

第56节：新单身女性(56)

奥法琳：《差一点到达》，247页。

然而，现在诺拉以新的视角来看待这段关系的正反两面。她不再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当我开始发现我们有问题时，就期望我会重新找回独立的自我，这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奥法琳：《差一点到达》，232页。她意识到他们两人"多年形成的父女关系，彼此之间相依为命"。

奥法琳：《差一点到达》，233页。此外，诺拉感觉到爱尔兰既是家又是团体，她总结说自己不能放弃爱尔兰永久地住在美国："除他之外我和美国没有任何关系，除了他的半张床外美国没有我的位置。血浓于水，爱尔兰对我比爱情更重要……我想住在有我熟悉的政治家的地方；住在公共汽车上挨着我的女子和我的阿姨在一所学校供职的地方；住在人们不嫌麻烦交谈的地方；住在我能听到自己的语言，欣赏自己的音乐，听懂笑话的地方。"

奥法琳：《差一点到达》，236~235页。

在回忆录的最后，奥法琳没有放弃那个关系，但我觉得只有她和情人找到某种方式稳步发展非传统的关系，在单身和伴侣之间找到平衡（参见第八章），他们之间才得以维持。

诺拉主动解释她能够发生变化的原因，她认为写回忆录是个关键因素："要讲故事就得严肃对待事件本身，当然自己开始向健康方向发展……试图向读者描写自己的经历促使我更好地理解感受事件。"

奥法琳：《差一点到达》，192页~161页。

同样地，参与这次研究也有助于贝丝、我自己和被采访的一些女性，我们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它有助于看到我们完整的生活和文化所告诉我们的生活之间的断裂。我们逐渐看到自己生活中积极的一面，并且接受适合自己的单身方式。尽管童年时代心理上蒙受了阴影，如果诺拉和贝丝能够改变，或许生长在有负面家庭影

响的雷切尔和其他女性也能改变。或许看到自己的故事印在纸上，读到这段分析后，雷切尔能够转变她的人生观，还能从单身生活中找到一些乐趣呢。

当我独居写这本书时，我开始听起磁带上的小说，比如在厨房做饭或驾车在城边办事时，听小说伴随着我做一些事情，同时可以分散琐事的无聊。然而，有一次，我听到了使我明确对单身女性生活某些思考的内容，这就是2001年的畅销书乔纳森·弗兰森的小说《改正》，描写有关生长在美国郊区的那些中产阶级的不满情绪。总的来说这部小说与我所关注的主题关系不大，但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丹尼丝，是男主人公的妹妹，说了些引起我兴趣的话。由于不愿在斯瓦斯莫读书，丹尼丝辍学后在一个装修讲究的饭店找了一份工作，在那儿她找到了自己一生钟爱的工作，她爱上了厨师的生活。“她爱那疯狂的时刻、工作强度、菜肴的美感，”弗兰森写道，“她深爱蕴藏在吵闹中的静，一个好的梯队如同有选举权的家庭，在厨房的小世界里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地位，每个厨师都隐藏起自己在过去或性格中形成的古怪，即使在最有梯队精神的配合中，每个家庭成员都享有隐私和独立，她爱这一点。”

乔纳森·弗兰森：《改正：一部小说》，纽约：法拉尔·斯特劳斯&吉洛克斯，2001年。

丹尼丝的感慨表明满意的工作如何能培养女人的独立精神——独立与孤立或个人主义不同，而是由协助关系促进而成，也就是她所说的厨房梯队。要像有选举权的家庭，这种有关联的独立对女人尤为重要

二十多年来，女权哲学家与女权心理学家一直在争论是否独立自主是女性为之奋斗的合适的目标。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群女权心理学家在简·贝克·米勒的领导下，与韦尔兹利学院斯通中心联合起来主张独立（独立意识）的自我是一个男性的概念，来自倡导个人主义的社会。斯通中心心理学家认为独立意识不应该看做一个健康人发展的标

志。她们主张不要把成熟当做一个独立的、个性化的自己的进化，成长应该由创造力和维持各方面的关系来衡量。他们发展了关系中的“我”的概念，强调了理解别人的重要性。这些心理学家把女性通过关心别人发展自己的品质提升到了社会上的每个人应该渴望交友的显著高度。

第57节：新单身女性(57)

20世纪90年代，女权哲学家通过合并斯通中心的一些评论重新兴起独立自主的概念。她们发展了相关的理想化的独立自主意识，研究了个人只有通过反思、选择她们深入其中的社会关系才能取得自我定义、自我导向的技能。。

像一个独立的男人，这样的一个女人享有高度的自我决定权、自我定义，感到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人。她的工作成为自尊的一个要素，促进她实现自我心理学家安东尼·斯托尔声称，亲密的人际关系不是人们感觉幸福和自我实现的唯一要素。。所有这些“自我”的词都很重要，但与传统的西方术语“人造人”不同，有各方面关系的有独立意识的那些人通过支持的关系实现自己的目标。她可能重视隐居（“独处”，用弗兰森的话），独立的女性有各个方面的联系，不是孤独或孤立。她不是不喜欢和别人相处一个女人喜欢大部分时间独处比同样性情的有伴侣的女性做得会更出色，很有可能因为她不能营造维持单身的复杂的社交关系。参见鲁弗斯·安尼莉.一人派：孤独者宣言.纽约：马洛，2003，下同。。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不意味着孤独地生活，可能包括相互惦念或关爱对方。从事一份经济上自立又能实现自我价值的工作对于独立是必要的，但还不充分。一个独立的女性需要有工作之外的生活。

西方文化强调自我和自我价值的体现，独立的女性——不管是单身还是已婚——都自我感觉良好。我的研究以及其他的研究发现，这一点对于来自工人阶级和接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的女性也是如此例如，社会学家彼特里兹·普斯库拉发现蓝领工人、文职人员、职业奇卡诺人在工作中赢得自信，专业人士也赢得了强烈的身份意识。。但是相比之下，保持很强的自我意识——保持独立性——单身女性会比已婚女性更容易些，因为目前的社会文化氛围，鼓励女性找一个年龄大些、更强壮、更高、更富有、更聪明的人结合在一起。哲学家玛里琳·

弗里德曼发现即使在主张夫妻平等的家庭也妨碍女性的独立："夫妻中的一方在某种程度上受联合承诺以及夫妻身份的暗示，而不是受制于个体身份和承诺的导向。"取得独立性又保持美满的婚姻关系的女性就实现了文化理想，但这个结果可不容易达到。相反，单身女性，尤其是没有孩子的，有更广阔的社会空间来追求独立，如经常可以专注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我们已经看到大多数女性不选择单身生活，她们没有继续单身下去的人生规划，而是她们做出自我实现的选择，逐渐引导她们形成了有独特身份的完整的人的意识戴安娜·提赞斯·梅耶斯说明了七种类型的技能推动女性自主的过程，与我提及的营造可行的单身生活必要的那些因素相似。。这样，独立不是一个先决条件，而是长期以来精心打造满意的单身生活的结果。不同个性的女性，不管离异还是单身的——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独立。

然而，在这样一个社会大背景下，我们没有绝对的支配权，而男子通常有更多的权利，自我决定对于成为一个独立女性是必要的。在塑造自己的生活过程中，可能对于那些面对民族、种族、阶层、性别等方面有歧视的女性会更难些虽然我的研究课题中没有包括二十多岁的单身女性，大量的事实显示了女性与男性一样拥有婚前独立经济的重要性，这使得婚姻的平均年龄也相应地提高：女性提高到25岁，男性27岁（见国家婚姻工程，2001）。虽然现在二十多岁的单身女性通过工作赢得很强的自我意识，她们经常对如何把独立意识和亲密情感结合起来感到困惑。。

我考察三个没有子女的单身女性，她们通过追求有意义的工作创造满意的生活，从而增强了独立性。埃琳娜·莫拉里兹来自工人家庭，是个住在美国的三十多岁的墨西哥人，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她竭力搞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安妮·罗塞提是个四十多岁有创造力的企业家，为自己的个人生活打拼；玛丽·比舍普，五十多岁以前是个修女，为一个独立女性如何面对危及生命的疾病提供了参考。

第58节：新单身女性(58)

这三位女性，摆脱束缚（不依靠男人或为宗教信仰所羁绊）成为独立过程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中两个女性离异的结果与从未结婚的女性为改变生活做出的选择极为相似总的来说，与她们之间的不同之处相比，我发现从未结婚的女性和离异后单身的女性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她们三个都利用个人危机，把它当做一次机会来发展新的能力，拓宽自我定义的范畴研究离婚的最权威学者发现，女性页不是男性离婚后经常能建立一种新的自我意识，经历个人生活的转变和成长。。思考她们的生活进程，能够使我们检验单身生活如何促进自立以及评估自立生活的益处与代价。

从工人家庭的儿童到独立自主的女性的漫漫长路

我和埃琳娜·莫拉里兹见面时，她31岁，单身，刚开始博士论文的研究。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光滑的棕色皮肤，稠而光亮的黑发剪成很有魅力的短发，嘴角常挂着微笑，女人味十足。她戴着眼镜，显得严肃认真。埃琳娜说明她面对着平衡工作与个人生活之间的冲突。埃琳娜38岁时我们又见了一面。我发现埃琳娜的工作历程已经矛盾重重，与个人生活更加不和谐，这比7年前她预想的还要严重。

埃琳娜在加州中心山谷的一个小镇长大，她父母从农夫转为工人。她父亲在一家服装厂当门卫，她母亲有高中毕业证书，在一家儿童关爱中心工作。她出生时母亲33岁，两个哥哥分别13岁、16岁，埃琳娜的童年如同独生子的童年一样。

埃琳娜注意到她父母“总有一个小小的家庭图书馆”，“我们经常有报纸看，母亲总带我们去公共图书馆”。虽然她母亲在这方面可能与众不同，但是她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在许许多多工人阶层的墨西哥家庭都能发现的女性的坚强20世纪90年代对美籍墨西哥来自贫穷家庭的高中生的研究发现家长重视教育，尽全力帮助孩子在学校取得好成绩。另一个对获得博士学位的女奇卡诺人研究发现，她们的母亲在取

得教育成就方面起着主要的影响。参见甘德拉1996。其他的也注意到奇卡诺人的家庭和社会中女性力量和反抗的传统对女奇卡诺人的发展有主要影响。。她告诉埃琳娜她想做什么就能够成为什么。从7岁她参观旧金山时起，埃琳娜的目标就已确定一定要离开这个小镇。她知道教育是一条出路。在高中，埃琳娜上大学预备班，她母亲坚持让她把精力放在学业上，而不要放在家务杂活上，因为家里没有小孩，不需要她帮忙照顾。但是不久埃琳娜经受着思想的冲突：对教育的渴望与父母灌输的更加传统的性观念之间的冲突。

高中毕业后，埃琳娜选择在附近的社区学院上大学，这离她在高中相处的心爱的人较近。他是个美籍墨西哥男孩，学习成绩没埃琳娜优秀。上大学仅仅几个月，埃琳娜告诉母亲她认为自己怀孕了。但实际上没有，由于有了性生活，她母亲坚持让她结婚，所以埃琳娜18岁就成家了。后来她确定自己没有怀孕，就继续深造学业以便走出小镇。她辅导丈夫，两人都被加州大学录取。埃琳娜一帆风顺，被东部的为那些家庭背景卑微而有前途上研究生的人提供资助的一个夏季项目录取。同时她尽力帮助丈夫来保证两人都有成功的事业。但当她两个月后从东部回来时，她发现她丈夫想跳出这个婚姻。这次离婚虽然痛苦，但也是一个解脱。21岁的她提前过上了这种单身生活。

作为一个已婚女子，埃琳娜本考虑只上加州的研究生院。但离婚后，她申请了美国各个地方的研究生院。常春藤联合大学接受她申请的公共政策硕士研究项目。在二十七八岁时，她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作为政策分析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任职，后又去了洛杉矶。她很高兴又回到加州，离家很近，住在一个十分熟悉的文化氛围和环境中。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工作，埃琳娜一时冲动申请了加州大学的博士项目，在那里她集中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健康政策问题。

在婚姻结束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十年里，埃琳娜几乎一直处于恋爱状态：和一个美籍墨西哥人相处了6年，和一个美籍非洲人处了4年。她谈起自己和拉美人，以及和自己不是一个民族背景的人相处的

种种问题。“大多数拉美男人不能接受我是职业女性的事实，反正我不会无所事事，做玉米饼给他们吃，但另一方面，和一个非拉美男子相处，你还不得不解释一个拉美人所知道的一切。”那个黑人与她的墨西哥男友不同，非常独立。他们很少像她过去处过的那样在一起成双成对。从这次恋爱中，埃琳娜“得知恋爱关系不一定会破裂”，“因为你们都保持独立的个性”。同时她接受不了这种距离感，所以她提出分手。

第59节：新单身女性(59)

恋爱不顺利使她困惑不解。在30岁出头时，埃琳娜转而求助于书本。可她的家庭出身背景使她对书中提供的观点总有疏远感。“阅读启迪我的心智，”埃琳娜解释说，“但是与我形成的一整套价值观相悖。例如，婚姻按市场的基本规律行事对我就很陌生。而我一向认为婚姻就是有关爱情和浪漫。”

她的个人价值观和工作观也面对着类似的冲突，埃琳娜觉得很难在学术研究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她解释说她本人从来不单纯停留在成就上，而总是注重某种关系，与伴侣、家庭、朋友和社团的社会关系。但在专业领域，她意识到工作在乎的不单单是一个人做了什么，而更多在乎的是谁在做。现在她是一个博士在读生另一个女奇卡诺人格洛里亚·库德莱兹，比埃琳娜早十年获得博士学位，抒发过相似的情感。提起80年代初在加州伯克利大学社会学系参与研究项目的经历，她写道：“在研究生院没人问我是谁，我从哪来，而问我从哪毕业，为谁工作过。换句话说就是：‘你认识谁，有什么职业关系。’”她与白人中的中产阶层同龄人不同，她除自己之外，对别人、对家庭以及所生活的集体有一种责任感。，埃琳娜觉得这点挺可怕的。即使她以前一直想上大学，有一份自己的事业，她却从来没认为自己是女强人。她爱自己的工作，但完成博士学位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专注于学习，结果与家庭、情人的关系就成为次要的了。“不得不让一些其他的事情如寻找白马王子等处于悬浮状态，这对我而言很恐怖，我会时而有这种令人沮丧的想法。”埃琳娜解释道。

然而，埃琳娜发现朋友这个宣传媒介帮助她摆脱困境，解决这些冲突研究黑人职业女性时发现，一些人也经历了个人身份认定与在商业社会“你的工作说明了你是谁”的冲突。参见钱伯斯·维罗妮卡：《全部拥有吗：黑人女性与成功》，纽约：道布尔岱，2003年，23页，下同。。几年来埃琳娜和兰妮特是室友，我在第一章提过的那个黑人女

性。就像我提到的那样，兰妮特性格外向，独立性强，埃琳娜列举了与兰妮特的友谊带来的种种益处：

自从和她住在一起，我改变了许多。我一直是个隐私感极强的人，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私事，尤其是与男人的关系。我开始和兰妮特在一起时，想知道为什么人们总是向她倾诉他们的问题，但我想可能她以非常亲近的方式来询问。她知道人们什么时候需要谈论哪些事情。我学会如何打开自己的心扉，这也渗透到我与其他人的友谊上。现在我和其他的好朋友关系更加密切，我能在电话旁和朋友聊上一小时，告诉她们我的感觉，我在做什么。

埃琳娜经历了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评述的：友谊，与伴侣和家庭成员的关系不同，鼓励我们换一个视角看待自己，“在评价我们的选择、价值、原则方面提供多元化的立场”。政治理论家玛撒·亚克尔伯格得出结论：“家庭似乎要求我们走进规定好的角色，相反，朋友似乎支持我们成为一个本性的我。”玛撒·A.亚克尔伯格：《“姊妹”还是“同志”？朋友与家庭政治》，见：艾琳·戴梦德：《家庭政治与公共改革》，纽约：朗曼出版社，1983年，346页，下同。所以，友谊有助于女性发展独立的自我意识，促进自立。“友谊是自己的一面镜子，”社会心理学家莉莲·鲁宾说，“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无论使我们快乐还是痛苦，有助于肯定我们自身所喜欢、尊重的角色，从而改变那些令我们不舒服的做法。”

莉莲·鲁宾：《只是朋友：我们生活中友谊的作用》，纽约：哈帕&罗夫，1985年，40~41页，下同。鲁宾继续说有一些不同性格的朋友如何让我们自己发展成复杂不同的自我：“一个朋友比别人更能开发我们的智力，另一个朋友使我们的情感得到更深层次的交流；一个要求我们精心呵护，给予关爱，另一个要求允许我们依赖；一个朋友触动我们风趣的一面，另一个则牵动严肃的部分。”鲁宾：《只是朋友》，56页。

第60节：新单身女性(60)

埃琳娜发现她的朋友从不对她指手画脚，反过来，她尽力理解她们的处境。埃琳娜企图“想象设身处地地为她们想会是什么样子”。她觉得这是“成为好朋友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朋友也帮助她解决实际困难。“我从朋友那里借钱，”埃琳娜承认，“只是因为我父母从未以那种方式帮过我。”但在成为独立女性方面，埃琳娜不得不与家庭所在的社区分开，而来自中产阶级家庭背景的女性常常不那么做。

1995年埃琳娜对个人生活还抱有传统的想法。“我还想再婚，连我都奇怪自己有这个念头，因为毕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说，“我想要个孩子，不管是收养的还是自己生的。”和她的朋友兰妮特一样，埃琳娜不想当个单身母亲，原因有两个：她的成长过程中有父母两个人在身边对她很重要；另一个原因是养育孩子涉及太多的事。兰妮特不能想象成为单身母亲会是什么样的情形，与兰妮特不同的是，埃琳娜承认5年后她很有可能会改变看法，或许她愿意当个单身母亲，而不是根本就不是母亲。

2002年，我再次与埃琳娜联系，她那时38岁。我发现博士毕业后她面对的冲突依然如旧。为前两个职业的压力所逼迫，埃琳娜认为，工作上的棘手问题成为阻碍严肃婚恋关系的主要因素社会学家彼特里兹·普斯库拉发现与文职人员和蓝领工人比较，职业奇卡诺人在工作中获得更多的身份认同，但同时她们也最焦虑，感到工作与个人生活之间的更多冲突。。

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州立卫生部门从事研究，整天与繁琐的政治和卑鄙的陷害事件打交道。由于工作压力太大，她经常吃不好，睡不安。埃琳娜迫切想到大学研究所工作。当她收到新墨西哥大学研究中心提供的一份职位时，她决定去那里工作，虽然这样做意味着要与同居伙伴相聚，将不得不往返于两地之间。

就在她写完博士论文时，她遇到了吉米。吉米是个美籍墨西哥人，年龄与她相仿，正在读考古学的硕士学位，同时他还是一个专业搞雕刻的全职艺术家。埃琳娜欣然接受吉米为她打开的新的兴趣点，遇到的人也与以前认识的属于自己圈子的那些人截然不同，她喜欢眼下这种环境气氛。吉米也投身于争取社会公平事业，他以独特的艺术方式来表现自己的观点。他的浪漫追求吸引着埃琳娜，起初吉米献花，买的小礼物多得数不清，她不太习惯这种方式，但埃琳娜喜欢受人重视。

埃琳娜和吉米搬到一起住。现在有了伴侣，埃琳娜与一些老朋友失去了联系。埃琳娜说起1995年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们赶来参加父亲葬礼的那一年，虽然大多数人没有见过他。5年后，很多老朋友搬走了，追求各自的事业发展机会，或者像埃琳娜一样，忙于自己的小天地。现在她有伴侣了，埃琳娜期望吉米会给予她情感上的支持，帮助她缓解工作上的压力。

她和吉米商量是否她应该接受在新墨西哥的工作。他建议只要能让她停止目前工作中经历的痛苦，她就应该接受。埃琳娜认为他是出于对自己幸福的考虑才支持她的调动。他可能，后来他承认他需要歇口气，可以暂时不考虑她的问题。他就要参与一个100英里外的研究项目，所以埃琳娜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都会受到影响。回想起来，调到另外一个州去，需要坐飞机去看吉米，这比她想象的还要糟，但这不是妨碍关系的主要因素。

不幸的是埃琳娜的新工作比原来的那个好不了多少，没有找到她原希望加入的科学团体，一个旨在真正提高公民健康的团体，并成为其中的一员。她认为大多数同事都在追求权力和名誉，对埃琳娜，这两个都不能成为她的动因。相反她更看重的是“谦虚、谦卑和服务”。她想把她的研究与社会正义话题结合到一起，指导来自小家庭出身的那些研究者。但在新墨西哥她的这些价值观无法付诸于实践。

埃琳娜又到了阿尔伯克基，那里她一个人也不认识，她发现在那种竞争的工作环境是不可能结交新朋友的其他的奇卡诺人也写道在竞争激烈的学术背景下的奋力抗争的经历。参见美籍拉美人女权主义者小组的个人陈述，2001。。生平第一次尝到了真正孤独的滋味，因为她从未有过类似的痛苦经历，她说不出她的处境，以前埃琳娜一向喜欢独处的时间。因为她哥哥年龄大些，她母亲对她和谁一起玩耍要求太严格，所以从很小的时候起，很多时候埃琳娜都一个人玩。“不是在阿尔伯克基独处使我备受煎熬，”埃琳娜解释道，“只是我喜欢给人打电话，可是附近没有可以打电话的人。”

第61节：新单身女性(61)

埃琳娜的孤独感不只来自社会的孤立，而且来自缺乏个人肯定维斯把隔绝看做是孤独的唯一来源。。在新墨西哥，周围的同事和她的价值观不同、目标不同，没有任何像平日里与家庭成员和老朋友之间的相互交往的亲近。埃琳娜经历了路易丝·伯尼考在《独自在美国》中定义的孤独根源——“不被了解、不合时宜、不合群”

路易丝·伯尼考：《独自在美国：寻找同伴》，波士顿：法伯&法伯，1986年，10页，下同。。和其他孤独者一样，埃琳娜觉得被自己抛弃了伯尼考：《独自在美国》，64页。。虽然在不和谐的家庭以及没有交流的婚姻中的那些人也很孤独，但是像埃琳娜那些人，把太多的精力投入到个人的事业发展上，在工作岗位的孤独感才是致命的。

因为附近没有可以打电话的朋友，埃琳娜每天都用很长时间给吉米打电话。回顾那时，她认识到“潜意识里我希望从他那得到更多”。她承认自己的焦虑已使他焦头烂额。一年后，当吉米与她分手时说：“开始你心里装的都是在加州的工作问题，后来到新墨西哥后发现那儿的同事也同样不支持你，你没有同盟，他们使你厌烦，然后你给我打电话，把一切苦恼倾泻给我，你应该可以那样做，但是我再也容纳不下了。”

3年后，埃琳娜还不知道自己应该从男性伴侣那里期待多少情感安慰。她问自己：如果他们的角色倒过来，她的反应会和吉米一样吗，还是他只是满足自己的需求，无论如何都会终止这种关系？起初他俩相处时，他说过他不想再婚（他也离过婚），他有承诺恐惧症吗？为什么只在他搬到圣达菲后（离她只有几小时路程）和一个教授在一起工作后就和她分手呢？为什么只有他们开始认真考虑要孩子的时候他离开她？为什么他拒绝和她一起去心理治疗？如果她能够给几个朋友打电话讨论她在工作中的问题，事情就会不同吗？

埃琳娜承认自己工作上的不快和她的情感依靠摧毁了他们的婚恋关系。埃琳娜从未说过她希望走一条更传统的路，选择压力不大，与自己家庭背景更相宜的工作。而是，失去吉米使她敢于面对工作上的不愉快，做出新的选择。

当埃琳娜回到加州北部在那生活工作后，我又和她联系，听到了有关吉米的故事。吉米还住在新墨西哥，埃琳娜对他念念不忘。她说："我还把他当做自己想象中最靠近理想伴侣的人。"她希望在地理距离上与吉米更近些，吉米或许会回到她身边，然而埃琳娜没有中断她不喜欢的工作，也没有离开她不喜欢的城市。她在继续自己的生活，忙于参与我在第二章所提到的那些活动，来创造可行的单身生活，但也不排除成家的可能性。

2002年埃琳娜谈起她对新工作比较满意，谈起与家庭成员、旧日好友重新联系的幸福感。她现在在一家规模较小、不太出名、收入较少但政策倾向强的研究中心，在那儿她的同事和她的价值观相同。监督从小地方来的实习生，埃琳娜既高标准严要求又考虑到对他们的培养。尽力帮助学生们把奖学金和社会公平问题结合起来，把家庭价值观与职业目标结合起来，她希望为学生们提供一座她没有的桥梁——一座把他们生活的新天地与家庭居住的社区结合起来的桥梁。现在她的同事支持她，并欣赏她为之所作的努力。

埃琳娜又回到加州，想离母亲、两个哥哥住得近些。她母亲71岁，还住在那个小镇，她赞同埃琳娜的生活，她们是好朋友。埃琳娜对我解释了她母亲是如何变得独立的，"我不知道你是否和拉丁美洲人打过交道，"她说，"但我们之间坦率交谈很不容易，有很多次我们避免争吵，但不能长时间都这样压抑。由于年龄的关系，我母亲变得直率得多，限制家庭成员有求于她。"

现在埃琳娜独处的孤独与她在新墨西哥体验的大有不同心理治疗专家斯蒂芬·多利克在《亲密与孤独》中分清了隐居和孤独的区别。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感到满意，有稳定的社交关系时她享受隐居。她的头

脑中有这些联系，即使没有人在那。她把这种隐居当做安宁、舒适、休闲状态，她能满足自己所需，暂缓考虑别人。相反，孤独的人焦虑而贫穷。她认为自己是一个碎片，不完整，或被忽视不见。她不是选择独自一人，害怕永远这样下去。她认为只要有人或新的事物闯进她的生活她就会高兴。她总在想她没有什么，她生活中缺少什么。。她正攒钱买房子和公寓楼，考虑成为一个单身母亲，也可能收养一个孩子。埃琳娜为这个决定已做好了准备，她说："我更加确定——不是经济上的——而是从我是谁，我想要什么方面考虑。"埃琳娜试探性地和母亲一起探讨这件事，她母亲非常支持。埃琳娜的两个哥哥都没有孩子，所以这将是她母亲成为外祖母的唯一机会。此外，埃琳娜还发现她母亲结交一些较年轻的离异者或没找到伴侣的女性朋友，她们都在考虑要自己的孩子。

第62节：新单身女性(62)

埃琳娜愿意参与一些已婚朋友和有孩子同事的家庭活动。“她们觉得我挺怪的，”她说，“因为我喜欢出席一些孩子的活动，和孩子玩，陪他们逛这逛那，而大多数的单身女性不这样做。”朋友对于没有小孩的她也想去学校参加三个小时的圣诞节目感到诧异，即使那些五六岁的小孩在台上呼呼大睡，埃琳娜也喜欢那个节目。

虽然一想到没有孩子度过此生，埃琳娜就会难过，但她明确表示，就算永久单身她也不会觉得悲哀。埃琳娜发誓她不会重复过去婚恋关系的“极端的戏剧性和危机”。一旦能抚平与吉米的感情决裂，她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健康能恢复到极佳状态。她感到幸运的是家庭不给她压力让她成家。而她的朋友不敢回家度假，因为整个家庭不断地问她们什么时候结婚，她从来没遇到这种情况。

所以38岁的她沉着应对，或者成为新单身女性，或者营建满意的有伴侣的生活。她从事一份有意义的工作，期望买一所自己的房子，养个小孩儿。她的家庭朋友都支持她。通过工作，她与少数族裔团体联系。埃琳娜没提过性话题，我也不好问这方面的事人类学家帕特丽夏·扎维拉，研究美籍墨西哥出生，或那些至少童年在那度过而在美国长大的女性的性爱问题，发现她们很难讨论性的话题，可能因为“童年阶段有关性到处是一片沉默”。。考虑到她才三十多岁，可能她还没解决这个问题。

除了为可行的单身生活奠定基础外，埃琳娜为自己的独立感到自豪。像其他成功的女卡奇诺人，她个人的成就建立在家庭社团的支持，以及他们带来的积极的影响上。一些人可能会说，浪漫爱情的代价太高。但埃琳娜很自豪自己弄清楚了“我是谁，我要什么”。埃琳娜还不准备放弃浪漫的梦想，她的家庭朋友也为我在第一章探讨的亲密关系提供了更广的定义。

走向独立的企业家之路

我遇见安妮·罗塞提——金发碧眼，丰满得恰到好处——时她46岁，她妹妹把她推荐给我，因为她妹妹收到一封我要求实例研究的信件。安妮离婚已有10年，事业成功，口齿伶俐，做事果断，同时，又热情而风趣。在我采访的所有女性中，安妮的职业生涯最引人好奇，从事了多种不同的职业，从成功的餐馆老板到电影电视制片人、高职位政治官员、一家大公司的交际部主任。但是为了兼顾事业的成功以及满意的个人生活，她打拼了多年。

结婚15年后，35岁的安妮发现丈夫同一个朋友有婚外恋，她就是他的老朋友的妹妹。安妮没有和她“为争得自己的丈夫而战争”，相反，她选择了离婚。想到她丈夫的通奸行为，安妮敢于面对真实的自己，觉得自己必须结束这场婚姻。她说：“我就是不愿意迁就他，做一个谦卑宽容的妻子，那样的决定等于牺牲我自己的一部分，就像有人给我一把锯，叫我锯断胳膊一样，我不能那样做。”安妮怎么做出这样明智的决定？这件事是怎样影响她的生活的？

出生在阿拉斯加的一个中上层的天主教家庭，安妮在家十个孩子中排行老三，在美国西部——新墨西哥、华盛顿和加利福尼亚长大。她家经常处于流动状态以便在美国政府担当高级官员的父亲能够升职。安妮认为她的父母彼此忠诚，关系融洽。但由于母亲总是怀孕、生育、照顾孩子，她母亲的身体和精力已经大不如从前，最后一次怀孕她43岁，这次差点要了她的命。

安妮的母亲卧病在床，她父亲的工作需要经常外出，她的哥哥姐姐早就离家在外。所以在高中三年级时，安妮就接管照顾小婴儿和照顾比她年轻的弟弟妹妹们的任务。“那个小婴儿，”她回忆道，“对什么都过敏。他对胡桃过敏，而我们住在胡桃溪，他的皮肤突然间会出现许多斑点，他总是哭闹。”安妮险些熬不过高中三年，把自己描述为“完全没有希望的人”。“到我搬出去时，”她说，“我最不想做的一件事就是照顾那些小孩子。怀孕、小婴儿、刚学步的都没有吸引人的地方。虽然我爱弟弟妹妹们，但只要我活着，我就不再想叠一块尿布。

我不想要孩子。”而且，安妮意识到差点失去母亲以及自己缩短的童年历程对她的心理造成深深的影响，导致安妮所说的“后期创伤综合征”。多年来，一想到家庭主妇和母亲角色就让她焦虑不安，这种创伤使安妮有可能走与她母亲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

第63节：新单身女性(63)

1963年她15岁时，安妮在地方图书馆看到一本书《女性的奥秘》，她从未听过作者贝蒂·弗莱顿。安妮说自己还没有成熟到理解弗莱顿写的每一句话，但是无疑这本书对她影响很大。弗莱顿评论了全职家庭主妇压抑的生活，倡导女性要把婚姻和事业结合起来。安妮想象一份让她充满激情的事业，“同样投入和我们的父亲花费在职业上的时间和精力”。没有考虑太多，安妮设想她能把传统的天主教婚姻——但不要孩子——与事业联系起来，这是阅读《女性的奥秘》给她的启发。

在发现这本书前，安妮认为与她母亲全职家庭主妇不同的唯一角色就是修女。对安妮而言，修女“是我知道的唯一自由的女性，唯一上了大学活跃在全世界的女性”。在我研究中出现的众多天主教女性可能不是偶然的现象，安妮、我和其他人把修女看做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单身女性。由于从1945年到60年代末存在的与婚姻有关的美国文化观念，满意的单身女性的个体实例（包括一些有影响的教师）不能改变文化上对老处女的玷污艾德丽安·瑞奇于40年代在一所女校高中毕业，那里的很多教师都是单身。瑞奇写道：“她们是有活力的个体，这不是由各方面的关系决定，而是由她们的个性决定的，虽然在文化氛围的压力下我们肯定想结婚，对我们而言，她们的生活不空虚，也不沉闷。一种不和谐的认知观是：我们知道她们是老处女，所以她们的生活应该苦涩而孤独。然而我们看到她们的生活充满活力。”。

1968年安妮在伯克郡的加州大学读书，正赶上校园内骚乱的抗议时期。激进的政治运动形成了安妮的生活背景，但那时她没有卷入其中。大学一年级后安妮就结婚了，嫁给约翰·罗塞提——和她睡觉的第一个男人，是个意大利天主教高中教师，年长她7岁。问是什么吸引她时，她说：“嗯，性爱起了很大作用。他真叫棒，是个出色的情人。他

是家里的独生子，有一种‘整个世界爱我’的优雅风度。当我和约翰陷入爱河，就像‘闪电’，爱战胜了一切。”

安妮结婚时20岁，婚礼采用传统的天主教仪式，她叔叔当神父。因为她叔叔在教堂等级上很有影响，他叫教皇送一块匾来保佑这场婚姻。她感到欣慰的是，约翰说他对有孩子不感兴趣，但他会支持她工作的。“我告诉他我对工作、事业很严肃的，”她说，“他认为这很了不起。我不理解的是他在想着他母亲——他母亲总是做兼职、低微工作来添补家用。然后，她回家做意大利式肉馅小方饺，擦地板。”

结婚的第二年，安妮为了支付大学学费，找到一份令人兴奋的工作，在刚开业一个月的小饭店里记账。由于创造了一种新加州烹调法，不久饭店开始有了名气：新鲜的绿色配料，加上一点点调味品，和上调味汁——没有法国烹调中使用太多的奶油和黄油。很快安妮使店主相信她应该成为营业经理，但饭店里没人有这种想法。

现在这家饭店已经旧了，但重新粉刷过，棕色小圆石的房子，竖立在街道的一侧。当你在伯克利北部贫民区沿着沙塔克大街散步时不容易发现它，然而，一旦你到了门口，你进入的是一个真正典雅的世界，你会看到楼下餐厅铺着光滑的橡木地板。在楼上的咖啡馆，弥漫着不同的情调，别具一格，嘈杂忙碌。饭店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营业，还在同一所房子，当初是破旧的一层平房，安妮说它是“贫民住宅”。

安妮在后面的一个破烂的农舍里工作，那里有蔬菜、酒窖和一个大冰箱，房内电气线路很差，在冬季她不得不用电灯或发热器取暖。安妮干活很卖力气，“我们在发展信誉阶段，”她说，“不像人们想象的都是好事，很多个夜晚我都惊醒了，害怕给员工发不出工资。”

饭店生意兴隆之后，安妮成为其中一个股东。她回忆那时的幸福状态：“我在实现自己的梦想，我正走向成功，做着创造性的事情，我自信正在做的事也是别人欣赏的。”但安妮在工作上的突出表现却给丈夫带来出乎意料的影响。

第64节：新单身女性(64)

后来在心理治疗时，安妮费尽心思想弄明白破坏婚姻的婚外恋，她得出结论说："当人们介绍约翰时会说，这就是饭店老板安妮的丈夫。我一点也不明白这会对一个男人有多大的伤害，所以我不会对这件事情有丝毫敏感。他四十五六岁，事业已经达到顶峰，或者至少他对自己的期望就是那样。我根本没注意他的心情，我对自己的工作全力以赴。"

使我震惊的是安妮对缺少情感关怀或自责有如此清晰的见解。我从来没听她说过她希望在工作上少投入些精力以便挽救她的这场婚姻。是工作填补了在婚姻中的感情空白，使她远离她母亲遭受的处境，还是表现为自我创造性？或者都是？

虽然工作可能会影响亲密关系，但不排除他们有活跃的社交生活。安妮的社交生活集中在她与丈夫共同拥有的房子里。这是一所维多利亚式的大房子，他们推翻很多内墙，就是为了能举办场面盛大的晚会。安妮喜欢娱乐，她总是为她那大家族和朋友在节假日期间举办晚会——假日晚会体现出的亲情、友情以及集体的价值对她非常重要。安妮回忆说："餐厅空间很大，我们打开餐桌，放上各种各样的叶子，小孩子们有自己的桌子，热闹非凡。人们相互传递土豆，递通心粉，有时还把小孩儿传来传去。我有最奇怪的想法，我想：我希望没人误把婴儿当做正菜，因为他总是在桌旁转来转去。"

除她的大家庭成员和广泛的朋友圈外，安妮还有一群关系亲近的社交上的女友，她们主要从事食品行业，白天会停止做活，她们聚在安妮的新型厨房，五到十个朋友可能从早8点开始聊上一整天。放点背景音乐，人们进进出出，母亲们带着小孩子，有的带着针织活，有的拿熨斗，还有的做饭，总有一些好吃的。夏季她们就来到后院，皮肤晒成棕色，而她们在一起玩西洋十五子棋，喝酒。她们还会一起度过女士夜，没有丈夫、孩子，随便在哪家吃顿家常便饭。

二三十岁的安妮由于太重视事业发展，个人生活多少受点影响。尽管生意兴隆，30出头的她仍接受心理治疗，她为自己是谁，以及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而焦虑。很年轻就走进婚姻，从事自己的事业，不用面对她十几岁在家遭受的创伤。她厌恶照料他人，这正与丈夫的传统期盼相冲突，这种冲突不断加剧，体现在家务活上。安妮工作时间比约翰长得多，不像做教师的约翰有无数的假期。安妮一天工作14小时，而约翰有两周的休假，安妮回到家看到房间狼藉一片，发现冰箱也是空空的。约翰不喜欢房间脏，但他认为家务活应该安妮来做，如果她是真正的女人，她就该会做家务活。约翰和安妮一样，他说不喜欢照顾孩子。但有一次对她说："如果你不生个孩子，你永远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

他们的婚姻出现问题时，安妮的治疗师主动提出他们一起过来，但约翰拒绝和她去那儿，他说："男人去做心理治疗，除非他疯了或者他们是战争遗留下的老兵，不得不谈到他们最好的战友被射死。"安妮没有坚持，她和约翰不能谈论他们之间的差异，如二者关系恶化与他们的家庭背景有关——约翰成长在工人阶层家庭，安妮出身中高社会阶层，还有就是他们7岁的年龄差异。安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由妇女运动和当时激进的政治运动形成；约翰属于50年代的工人，对婚姻生活持较保守态度。

遇到类似情况的一些女性选择迁就——做取悦丈夫的事——即使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自我意识。或者与丈夫商谈找出解决方案。安妮没有这样做，相反，她雇了个保姆做家务，继续追求自己的事业及社交生活。

婚姻关系紧张造成性生活不和谐，但是她太忙了，她还和约翰有共同的活动——读书、旅游、徒步远足、看电影——安妮不在意这件事。对"性"趣减少，缺少感情投资，以及她如意的事业和活跃的社交生活促使她决定离婚，虽然在她的大家庭里，她是第一个离婚的人。

安妮发现约翰有婚外恋后，她运用生意场上取得的自信加上接受心理治疗的反思，决定不挽救这场婚姻。既然他们之间对性革命看法截然不同，安妮觉得如果和约翰在一起，她就不得不放弃太多。

第65节：新单身女性(65)

离婚后，安妮在工作中取得的成就感，以及她与亲戚朋友间发展的另一种形式的亲密，使她更加独立，而不是投入到情侣间的日常亲密。35岁的安妮，有魅力，性格活泼，离婚后有几个情人，经历4年的同居生活。但她没有找到与一个男人的关系是如她所说的，“激情和爱情，朋友和伴侣的统一”。大致说来，安妮没有谈到想念过去的婚姻生活，也从未表示过孤独。

离婚之前的几年，她卖掉了在饭店的股份，自己重新开业——经营一家饭店，熟食店，饮食店——沿街步行五分钟在伯克利的少数民族聚集区，正在成为伯克利的美食区。离婚后，她意识到需要花长时间经营管理一个小生意不适合她。她在最佳时间出售小店后，就在一家附近的大超市前新增熟食区。有了丰厚的经济基础，作为一个成功的老板，她更加自信，没有什么能约束她，安妮决定再试一种完全不同的工作。她解释说，“食品行业很享受，生意不错，但我在知识分子家庭长大，强调读书、思考、学习，现在是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了。”

她回忆起参与电影制作的事，“一个年轻的纪录片制片人找到我，他想拍一部60年代发生在伯克利的电影，我记不清谁带他来找我的，但他正找社区里的人帮忙。在电影的世界里我一直约会，和科普拉大众闲逛，所以全部情节令我着迷。我想，‘为什么不呢？’所以我成了研究者，电影片的副制片人。”她对政治性题材的影片感兴趣令我表示惊讶时，她说，结婚后，在做生意前还是大学生时，她就是个积极的反战者。安妮从来不是激进主义者，在社会活动上约翰也不感兴趣，但政治一定是她与生俱来的爱好。

安妮把制作范围推广到自己感兴趣的各个领域：多年来，她打败了裴吾门特成为旧金山庞大网络分支机构的每日新闻节目的制片人。她的新闻涵盖了商业、医药、环境、高科技，同时她还制作了较长时间的新闻故事及电视纪实报道。在媒体的经历及自愿参加政治工作使

她得到一年的高薪职位——为加州州长民主党候选人策划的高级职位。竞选失败后，作为团体联络人她先后组织了白宫的先遣人员到海湾地区访问大约25次，其中有比尔·克林顿、希拉里·克林顿、副总统阿尔伯特·鲍尔及白宫其他高级成员。同时安妮及她的团队促进了海湾地区关闭军事基地以及1996年在加州的电脑网络节运动（所有学校都连接网络的运动）。

成为单身女性发展了她独立的人格，安妮认为，也使她走向企业家之路。

我需要感觉到我是世界上完整的一分子。我必须弄清楚自己和他人的不同之处。对我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我结婚时不能完全体验这种独特性，可能部分因为我结婚得太早。但我总有成为一个完整人的压力。只有在我自己独处很长时间之后，我才意识到我从哪儿开始，其他人在哪儿停止。我不确定如果我不是单身我会不会悟出完整的含义。我不敢肯定我会有那种飞跃，也许我会，没有办法知道。但我确切知道在我单身时我领悟了。这是我最基本的变化。

企业家安妮的生活道路促进个人的发展，使她更加独立。社会学家约翰·海威特解释这个过程："企业家不属于任何组织，但是在创造一种独立的生活方式，像打造成功的企业一样塑造健全的自己，而不是简单地让自己适应于他人的企业。"

约翰·海威特：《美国人自身的进退两难》，费城：坦普尔大学出版社，1989年，202页，下同。心理学家同意"控制环境及取得想要的效果"能够提高个人的独立性

布里奇斯·莉萨：《自主性作为幸福的发展因素》，见：马克·H.际恩斯坦：《幸福：跨越人生进程的积极发展》，新泽西：劳伦斯厄尔博姆出版社，2003年，167页，下同。。

在首次采访的两年之后见到她时，她已经对过分投入工作的生活方式产生质疑。她看出成为企业家的一些消极方面，"这个不利方面，"她说，"就是永远不会有同事花时间和你一起建立一个项目。没

有别人会为你的退休、支付你的医疗或升级你的设备而担心，我不得不为我得到下一个合同而推销自己。”她已决定要减少工作量，永久地把政治、公共事务和媒体工作融为一体。她在拒绝许多工作，她说，因为“它会意味着，再一次完全把自己嫁给工作”。

第66节：新?身女性(66)

49岁时，安妮开始认识到自己可能没有机会再婚或找到新伴侣，她开始考虑那对她意味着什么。“我不找任何人，我只过自己的人生，”安妮声明，“心理上和情感上我都不想受到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的困扰。不管能否发生，这取决于我的命。”这种宿命论似乎与她的完美的工作机会正好落到自己头上的意识相似。然而，我认为，她的外向性格和能力使她从容面对工作，但在婚恋关系上，她就没有这种自信了。

我和安妮在她奥克兰的公寓楼见面，那是一个大小适中又美观的公寓楼。我吃惊地发现这与她结婚时住的房子大不相同。楼房装修讲究，有品味，只是各个房间偏黑，昏暗的灯光，普尔门式狭长的小厨房。这个地方冷寂安静，有逃离喧嚣的外边世界的僻静，与为亲戚朋友随意地进进出出并使安妮在结婚期间非常开心的房子截然不同。我觉得安妮并不真的想要那种僻静的生活，事实上，离婚后的4年同居生活中，安妮又创造了与结婚时同样的社交气氛。她描述自己如何愿意“操办从婴儿洗礼到圣诞晚会，或如果电视上上演特别节目，她就会煮一大锅豆子邀请大家过来吃”。但她知道自己要的是朋友伴侣不是丈夫，所以安妮与他分手，没有嫁给他，不过她很高兴他们还是朋友，即使他又有了另一个有承诺的关系，她承认自己想念那种社交场合。

作为一个单身女性，安妮没有组织活跃的社交生活，她发现假期更难打发。一个又一个的姐妹为感恩节、圣诞节举行大型宴会，但这与安妮在自己家开晚会不一样。尽管她的几个姐妹也有离婚的，尽管9个姐妹中有5人要了小孩，但在家庭聚会上，她感觉不太自在，因为她不是夫妻派对中的一个。

安妮意识到社交生活的缺乏，开始思索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如何创造一种私人生活来补充她较大的工作和政治团体。她说：“我认为任何人都不想孤独，问题是你如何在你的周围创建一个团体给予你所需

要的情感支持。”她说自己花大量时间和家庭朋友在一起，她不知道是否自己想继续独居，但她知道自己必须独自一个人用卫生间和壁橱。“那是最基本的，没有妥协；我了解我自己。”安妮声明。

2003年我再次与安妮联系，这离我们第一次见面已经8年了，她在电话里说：“你来得正好，由于心灵的呼唤我正要搬走。”我立刻想到她遇到了意中人。但当我与她见面时，我发现离婚的时间比结婚时间还长，现年55岁的安妮决定搬到东南部去，不是为了男人和工作去那个地方，而是因为她在那里度过的童年，她爱那里的气候、天空、文化、艺术、美感。无论身体上还是心理上，在亚利桑那她觉得自己有了生机，这就是安妮所说的“心灵的呼唤”。

起初我对安妮的决定表示怀疑，因为我认为朋友圈和社团对长期单身的女性至关重要。然而，我们一起谈论时，我逐渐认识到这一步变动不仅能进一步实现安妮的自我价值，使她更加自立，同样也可能改善她的社交生活和团体关系，安妮周密地计划着这件事情。

在接下来的5年，安妮在一家大公司当交流部主任，她的第一份社团工薪高达6位数——一个展示她企业经营和媒体才能的工作。她发起很多项目，再开发新的合作，虽然她喜欢这个工作，遇到许多优秀人才，学到了很多，安妮还看到社团文化的一些负面因素。她注意到：“很多行为由惧怕所驱使，由短缺、竞争、经济的起伏而造成。”而且，“公司的内部圈子主要还是白人，女性及其他肤色的人不可能进去，你从事的同样是熟人关系网的工作。”

安妮扪心自问自己是否喜欢在做的事，接下来的5到10年她还想在那工作吗？回答是她想在那工作的唯一原因是高薪。但安妮已经为退休费积攒了足够的钱。所以2002年，经济萧条期间，安妮让自己下岗了。失业补助足够她生活两年而不动用储蓄。她用三个月的时间决定做什么。

接下来的两到三年，安妮游遍了亚利桑那，因为她爱图森，目前正在考虑搬家的事，想在那重新安置。她从未想过是否图森会是一个

遇到男人的好地方。她问自己作为单身女性她会在那儿过什么样的生活。她决定搬到图森去不仅由于心灵的呼唤，而且也有实际的价值。

第67节：新单身女性(67)

尽管经济不景气，安妮自信能找到另一份社团工作，在那做5年的全职工作，攒够钱，在60岁时退休。然后，她会考虑如何把自愿性工作与艺术、人类学及文化等方面新的兴趣结合起来。她想找到退休时做的事，不管挣钱还是自愿——在情感和精神上都能引起共鸣。

安妮说服她姐姐也搬到图森，她姐姐离婚了，已经退休，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在图森她俩都买得起三室的大房子。这样她们一起会有足够的房间供家庭成员来参观度假时使用。或许安妮和姐姐能重温她结婚和同居时安妮喜欢的假日社交活动。

图森不仅为家庭相聚提供场所，安妮在那已经有了朋友，成为建立社团的基础。来自海湾地区的一个朋友在图森做房地产代理，可以帮安妮先租，再买一所房子。另一位律师朋友正帮忙联系工作。安妮在图森的其他几个朋友在她以前积极参与的国家政治组织里做事，她们会介绍安妮结识新朋友，建立新社团。安妮预想在规模小一点的城市联系起来比大海湾地区的容易些。

安妮发现单单工作不能保持独立性。随着新的“心灵冒险”，她正寻求把拓宽自己与家庭、朋友、社团联系起来的地方。我觉得她会成功的。

人生的乐趣与孤独地死亡

一个秋天明朗的上午，我拨通了那所高中的电话，7年前玛丽·比舍普在那个学校是助理校长。由于她家里电话我联系不上，我不清楚她是不是还在那个地方，是否还从事同样的工作。接电话的是一个年轻女孩，可能是学生。当我说找玛丽时，她停了一下说：“让我导师接吧。”一个年龄大些的女士问我是谁，为什么打电话。听完我解释后，她平静地说：“一场大病之后，就在六个月前玛丽去世了。”我惊呆了。我见到玛丽时她54岁，精力饱满，充满生气，她怎么能死呢？我

回忆起那次采访快结束时，她间接地说到自己的健康问题，还说“她不想依靠任何人”。

我想不起玛丽是怎么听说我这项研究的。1994年的那个晚上，在房间里还有其他4人，她一个也不认识，但她的个性和故事激起我的兴趣。参与首次小组采访的46个女性中，玛丽是唯一的一个作为修女自愿提起性方面话题的人。也许这种做法与修女的陈规陋习相悖，但她平静地谈论这个话题。

玛丽个头很高，大约5英尺11英寸，体态端庄优美，椒盐色的短发，开朗外向的性格。当回忆起十几岁在女修道院寄宿学校闹的笑话时，她开怀大笑。玛丽出生在怀俄明的卡斯帕，是家中7个孩子的老大。她说，天主教的父母似乎生育节奏掌握得很好，每一个孩子之间间隔3岁，而且是男孩女孩交替出生。玛丽比最小的妹妹大18岁。玛丽称会计师的爸爸和家庭主妇的妈妈之间有“非常传统的关系”，“神经质但充满爱意”。玛丽觉得婚姻限制了妈妈的自由，很小的时候她就不想过她妈妈的日子。因为玛丽经常替妈妈照看弟弟妹妹，她从来没觉得自己有要孩子的必要，她“已经有了这样的经历”。

14岁时她去修道院寄宿学校上学，对玛丽来说这是个解脱——摆脱了住在乡村只有几个朋友的孤独以及作为长女的责任。玛丽爱这所学校，它就像一个持续的卧谈会。和这些朋友在一起生活富有情趣，她喜欢听自立而有知识的修女上课。18岁她高中毕业发誓成为一个修女，她的决定与上帝没有多大关系，她受修道院的肉体神秘感、黑色长袍及吟唱的曲调所吸引。回顾那时，她不仅想继续留在卧谈会上，而且她“惧怕性惧怕到了愚蠢的程度”。在高中她从来没有与男孩上过床，似乎和这些有趣的女生一起生活容易得多。当她来到新的修道院，她吃惊地发现一个人不能在宿舍随意地讲话。她笑着说：“我以为那就是住宿舍应该遵守的规则。”

成为一个修女她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她在芝加哥的天主教女子学院获得英语学士学位，该院后又合并为罗约拉大学的一部分。玛丽

重视自己一直在全女子的环境下所受的教育，那儿鼓励她畅所欲言，成为一个领导。大学后她在中西部的女子高中教学，之后着手攻读在华盛顿特区的天主教大学的硕士学位。

第68节：新单身女性(68)

60年代中期，玛丽二十五六岁时，她的修道会也改变了习俗。在大学期间，玛丽遇到了许多男性，开始感受到青春期压抑的性冲动。有一个夏天，她和教区青年组到加利福尼亚的中央谷去工作。在那，她和一个牧师疯狂地坠入爱河，迸发出暴风骤雨般的激情。她不再惧怕性，但她知道他不会为她离开牧师职位。然而，玛丽认为她不能呆在修道会了，她像个骗子。所以，30岁时她离开修道院，“开始在现实世界里18岁时该有的生活”。

玛丽的很多朋友都是在大致同一时间离开修道会的，其中的大多数已经成家。玛丽也想遇到意中人，与其结婚，她不想变得“古怪”。因为她不想要孩子，她想兼顾教育事业和婚姻家庭，但玛丽发现很难找到一个接受她的男人，因为她是“一个有明确见解的直率的女人”。而且，她发现她不喜欢恋爱中的自己。她解释说：“我觉得失去了自己，我会做他喜欢的事，做他想做的事，然后我变成那样子，我会说，‘无所谓’。我会尽力和别人在一起，我能记得那种极度的激动。有时我会平静下来说，‘我一个人也行’。”

玛丽在浪漫关系中失去自我的经历，是女性在婚姻中常见的角色。大量的事实显示传统婚姻能导致失去自我，或变成不真实的自己，以及造成妻子不考虑自己，一味地使自己适应丈夫的需求。参与研究的许多离异的女性就是如此。例如，简·麦克唐纳经历了16年的婚姻，在43岁时与丈夫分手。她说：“我在吃惊、悲痛、气愤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写出他做出的决定而我一点也没参与的事情，在另一个单子上列出我们两人共同做出的决定。结果，第一个单子有四十项内容，而第二个只有三四项。”简谈到她的迁就即是从琐事开始的：对家具的品位，图片挂在哪，她都听他的，她“不想有任何冲突”，因为做他偏爱的事情要容易得多。分离后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改回自己的娘家姓氏，她认为找回了自己。

一些单身女性，尤其是有独立意识的女权主义者，在浪漫关系、性关系中也有可能失去自我。1962年，桃瑞丝·莱辛的小说《黄金笔记》中的女主人公安妮·沃尔夫是位单身母亲，一个成长中的女权主义者，与很多男人关系紧张。每一次，她“与一种情绪抗争……自我的成分在减少、消融……”同样，著名女演员，也是女权主义者的简·芳达在2003年6月12日全国妇女领导大会演说中声称：

虽然我一向经济独立，有成功的事业，得到社会的认可，在封闭的个人生活背后，为了让一个男人爱我，我还是把自己变成椒盐卷饼，我认为如果我不是他希望的那样，我就会孤独一生。然后我会消失……这是摆在很多意志坚强、独立女性面前的共同的问题。

记者佩吉·欧仁斯坦也发现二十多岁的有成就的单身女性在爱情关系上也觉得“失去自我”，不能保持女人的独立性，“知道自己想做的事，做自己愿意追求的事。”我的一些学生提到在约会时也有这样的经历，她们突然不知道想吃什么，不知道想去哪，一切都听从对方的安排，这样过后她们都觉得不太好。

研究女权主义的心理学家把女性容易失去自我的现象追溯到童年时期，从很小的时候，女孩子就被期望要满足别人的要求——比如，年轻的弟弟妹妹，贫穷的父亲，不开心的母亲——从而克制自己需要抚养和关爱。玛丽的童年与这个分析相吻合。的确，这样的女性在营造可行的单身生活的过程中赢得最大程度的自主意识。

四十多岁时，玛丽不期望找到伴侣或走入婚姻，而投身于事业。在专职教学之余，她攻读管理硕士学位。在她成为高中的管理人员之后，又开始攻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她的目标是在高校任职。1994年，50岁出头的玛丽在写博士论文，同时上课培训本科生，专任高中的助理校长。

虽然玛丽爱工作、爱家庭、爱朋友，但也喜欢一个人独处的静谧，尤其是白天和人们相处了一整天后。她说是静谧吸引她去修道院的。她记得自己喜欢到她家附近胡桃林里散步，来躲避家里一群孩子

的吵闹。玛丽独享静谧不是因为她个性孤僻，远远不是。实际上，这取决于成年时建立与同事、朋友和家庭的令人满意的关系过程中锻造的坚强的自我意识。史蒂芬尼·多利克在《亲密与孤独》中假定一个人生活得很舒服，而且在社会关系中有安全感时才会享受静谧。她认为即使周围没人，她的头脑中也存在这种关系，她在静谧中体验着平静、宁静及放松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暂缓别人的需求。

第69节：新单身女性(69)

玛丽与家里的弟弟妹妹，以及他们的下一代关系亲密，尤其与大弟弟佛瑞德，他比她小3岁。孩提时他们一起打打闹闹，长大后成为知心朋友，相互支持。玛丽的父母从不吵架，但她从自己与佛瑞德的关系上得出他们虽然吵架，但依然爱对方——吵架不意味着拒绝或关系终止。玛丽和佛瑞德以及她的其中两个妹妹之间关系融洽，他们既是一家人又是朋友。她和其他的弟妹，她不愿意他们分享她的生活，但她知道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她都能指靠他们。

除此之外，玛丽还有另外的两群朋友。她和曾经是修女的10个人依然保持亲密的朋友关系。她们大多离开了修道会，只有几个还在那儿。大家每年聚会一次，包括那些结婚或找到伴侣的。一个朋友的丈夫说，这种聚会使他想起了部队的一些老战友们。实际上，由于共同的经历——“基本的训练”，几年来一天二十四小时她们都在一起，彼此之间形成的友谊已经牢不可破了。玛丽与这些老朋友关系最好，可她们都不住在附近。新朋友大都是工作岗位上认识的。虽然比起修女或者是以前的修女，她更经常看到这些新朋友，但不知道在需要的时候她是否像依靠家庭成员和老朋友那样能依靠她们。然而，历史证明她的看法是错误的。

在得知玛丽的死亡消息后，我采访了她的同事劳丽。劳丽与玛丽一起共事3年，做朋友已经两年了。劳丽说起玛丽得结肠癌已经很长时间了，做了几次手术，一年多来只做兼职工作。在与疾病抗争的痛苦煎熬期间，玛丽依然保持幽默感，体现出个人的人格力量。她自己负责医药费，从没有怨言。玛丽不想麻烦亲戚朋友，但他们都聚到她那儿。她的家庭都不住在附近，但她的一个妹妹照顾了她六个月，另一个妹妹照顾了四个月。玛丽在当地最好的朋友，早她一年突然去世。但是其他的同事、朋友、邻居都过来帮忙——拜访，带来食物，跑腿儿。去世的前三周，玛丽让劳丽、另一个朋友和她妹妹过来吃饭。她

瘦了很多，看起来憔悴，还坚持亲手做饭，让她们度过一个欢快有趣的夜晚。

三天后，玛丽回到医院，再没有活着出来。在最后的日子里，玛丽让住在城外的朋友、家人过来，每次约见一个人，作了简短的告别。她不想让一大群人围在床边。玛丽告诉大家她要离开，在宁静和孤寂中离开这个世界。她就一个人这样静静地死去了。玛丽真是一个完整的人，是梅·萨顿在《孤独者期刊》定义的“内心无愧、无所疑虑、无所恐惧”的一个完整的人。

玛丽生前要求在不分宗教派别的一个小礼拜堂举行追悼会，不要在教堂。在那天，玛丽所有的弟弟妹妹及他们的下一代，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都来参加追悼会。大家纷纷追述了玛丽的幽默感、对教育的献身、做教师的天赋以及对家庭的热爱。没人提到那位牧师，玛丽到死讨厌修女与曾经是修女的身份界定。如玛丽所愿，骨灰撒到波得海湾。

埃琳娜·莫拉里兹、安妮·罗塞提以及玛丽·比舍普赢得的独立个人意识验证了心理学家安东尼·斯托尔的分析——不仅仅是爱情、朋友和个人的社交关系，而是个人的爱好有助于实现有价值的人生，实现真正的幸福：“爱好，不论书写历史、饲养信鸽、猜测股市行情、设计飞行器、弹钢琴还是搞园艺，在人们感到幸福的体系中都比心理分析家和他们的追随者所猜想的作用更大。”

对一些人而言，工作就是展示爱好、获得自立意识的地方。哲学家萨拉·鲁迪克明确了热爱工作的重要性。工作能使人“爱自己，听取别人的意见和创造，爱与你一起共事的人，爱知识，爱工作带来的美和变化。”萨拉·鲁迪克：《一个人的事》，见：萨拉·帕梅拉·丹妮尔斯：《结果》，纽约：万种殿图书公司，1977年，136页，下同。而对另外一些人，积极地从事日常生活的一些活动——如烹调、园艺、照顾宠物、爱家——不管他们是单独还是与别人一起，生活都会有意义而又富有情趣。

第70节：新单身女性(70)

有自己的兴趣可以促进独立意识，反过来，独立意识也鼓励一个人参与这样的积极活动。这三个女性都有自己的爱好，在工作中体现出最大程度的自主性，从而创造幸福的生活。但在亲密情感或者“性”趣方面，与参与我研究的其他女性相比，她们缺少丰富的体验。我的研究暗示了独立与亲密情感，独立与“性”趣之间的对立性医学博士精神治疗医师埃塞尔·S.佩尔森发现了“亲密与自主意识之间的基本的平衡”。。对大多数单身女性而言，在赢得最大程度自立性的同时得到情感亲密和性欲快乐是不可能的。

然而，自主性不必意味着孤立、孤独。埃琳娜、安妮以及玛丽都与大家庭、朋友、情人、同事和她们的社交团体的关系融洽，同时又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安妮的政治团体，埃琳娜与种族文化的情结。玛丽的一群独享静谧的曾是修女的朋友，她们能够独享静谧是衡量自立——内心安全感、情感成熟的标志。

这些女性逐步培养起很强的独立意识，这是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面对挑战的结果——安妮的离异、埃琳娜在新墨西哥州忍受的孤寂，玛丽与情人交往中自我的丧失。当她们的自我意识受到最大挑战时，这些女性没有对情感关系产生依赖，反而强化了独立自主性。她们的自我了解、自我接受没有使她们收获浪漫的爱情，但这些女性提升了自我的灵魂以此代替寻找心灵伴侣。

年轻女性谈起找不到心灵伴侣的恐惧，但她们对无子女没有表示出类似的担忧这是在课堂上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孩对2002年和2003年单身女性的观察结论。。2001年民意测验显示只有16%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认为婚姻的主要目的是要孩子这些民意调查结果在《国家婚姻工程，2001》上有所报道。。大多数单身女性认为，不是母亲的身份与她们永远也不可能有令人满意的浪漫关系相比，前者有可能更易于接

受。同样参与我课题研究的没有母亲身份的年过40的女性也不像没有伴侣那样极力争取。

一些研究表明，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自愿不要孩子的人数的上升与更多人专注浪漫爱情的想法有关。除此之外，伴侣的文化至上观念也影响了社会学家与媒体记者们怎样看待没有孩子的女性：他们研究以及主要关注的焦点针对没有孩子的已婚或找到伴侣的女性

卡罗林·N.莫雷尔，一个没要孩子的已婚女性，写了《非女性行为：挑战故意不要孩子》，只调查无子女的已婚女性。同样身份的劳瑞·里尔于1994年主要研究无子女的已婚女性，写了《没有孩子》。记者塔利·卡瑟的《骄傲与欢乐》（1998）的考察对象只包括25个中的6位单身女性，其中两人是七八十岁的寡妇。英国心理学家简·巴特利特在1995年《你是母亲吗》书中，很少写起无子女的单身女性。伊冯·威星是位母亲，采访了125位无子女的女性却没有说明其中多少是单身，多少是已婚。虽然她包括了一些单身女性，大多数分析都与无子女的已婚女性有关。。

只有三十多岁的单身女性对要不要孩子有过思想斗争，如果想要，没有伴侣她们是否能够独自抚养。参与这项课题研究的三十多岁的单身女性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有一些人，像美籍非裔的女老板拉内特·琼斯，明确表示她们会喜欢孩子但不想成为单身妈妈。像她一样，很多人不想仅仅因为他会是一位好父亲就嫁给一个男人，从而放弃她们的浪漫想法。其他人如埃琳娜·莫拉里兹还在矛盾着如果她们找不到既浪漫又重家庭的伴侣，是否还要成为单身妈妈。即使那些从来不对当妈妈感兴趣的女性也不得不面对那种文化观念——幸福取决于有心灵伴侣和有孩子的家庭生活。在本章和下一章的内容（有关单身母亲），我追踪调查了三位三十多岁的女性，考察她们是怎样面对这个问题的。

相反，我发现那些已过40岁的说自己喜欢孩子的女性在过去的实际行动上没有反映出来，也没有考虑要成为母亲的各种方式同样，卡

罗林·N.莫雷尔发现无子女的已婚女性不觉得很遗憾。。更确切地说，她们继续自己以往的生活方式，很多人找到了与孩子和年轻人相联系的方式通过对1990年和1992年采访的年龄在40岁到55岁的90个单身女性的调查研究，肯定了我在小范围的发现结果。心理学家卡罗尔·安德森和苏珊·斯图尔特发现两种类型的单身女性——从来没想要孩子和想象自己是位母亲，却不能实现这种渴望，从而生活转向其他的追求。。其他的作家也发现了这种现象。70年代对一直单身的女性的一项调查表明母亲身份成为未婚女性的主要话题，90年代记者李·瑞奇的调查原以为也会得到相似的结果，结果她吃惊地发现没有几个人会有“生理反思与静静的遗憾”瑞奇：《现实中的单身女性》，79页。。而是，瑞奇认为她采访的绝大多数单身女性“不想要孩子”，“没有人考虑仅仅为了要孩子而结婚”瑞奇：《现实中的单身女性》，78页。。如本章的题目所写，我要更详细地探讨这个话题，无子女女性的焦虑集中体现在是否到老年她们还能保持自立。

第71节：新单身女性(71)

为什么四十五六岁快到50的单身女性才能决定不要孩子呢？社会结构以及生物因素都不能解释这一点。当然，无孩子的单身女性会生活得更舒服些，因为她们的周围都是与她们一样类似的人。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统计，在2002年，18%的年龄在40到44岁的女性从来没生过孩子。这个阶段的未婚女性（占本组的12%）有63%没有孩子人口调查表在网上可以看到，见http://www.census.gov/population/wwwsocdemo/fertility.html.，调查还发现，社会尤其对单身、没有孩子的女性持不友好态度。婚姻以及50年代的生育高峰把她们边缘化，那是美国20世纪以来婚姻和生育的最高峰。这样我们不能确定近10年来无子女人数会持续增加，也不能确定社会会永远地接受这种现象。

单身女性的生理机能方面呢？人们也许得出结论，生育能力中止（或急剧下降）解释了为什么四十多岁的女性把要孩子的事放在一边，但却不放弃寻求伴侣的希望。据我多年的研究（1994~2003）证实，无数生物技术的突破允许年龄大的女性也有生育能力。然而，参与研究的四十多岁的女性没有一个人考虑过用试管婴儿、捐赠卵子或收养孩子的方法。只有一个离异女性对持续16年的婚姻而没要孩子表示过遗憾这位离异的女性在我的研究过程中再婚，所以这里没有算上她。。这些单身女性接受没有孩子的现状一方面归因于文化至上观念——有伴侣是成年幸福的主要源泉；另一方面，受其他文化改变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处在高峰时期，很多女权主义者对母性身份是本能的、与生俱来的，并成为女性身份界定以及是取得成就的必要因素的流行观念提出质疑。到80年代，与对无子女女性的研究相比，女权作家更热衷于对改革母性身份的探讨，这可以看出女权主义的影响。女性气质和女性身份不再与婚姻和抚养孩子紧紧

联系在一起。在90年代早期对没有孩子的女性研究中，心理学家马迪·爱尔兰发现母性不再作为“成年女性自我意识发展的必要中心”

马迪·S.爱尔兰：《女性再思考：把母性与女性身份的分开》，纽约：吉尔福德出版社，1993年，6页，下同。。在爱尔兰的调查中，一个40岁的女性说：“我不觉得有孩子才能使我成为一个女人”爱尔兰：《女性再思考》，132页。。实际上，社会学家罗斯玛丽·吉勒斯比发现自愿不要孩子的女性经常把母性与女性身份的缺失联系起来。

节育和流产的大范围实施成为生育和女性身份分开的先决条件，但要落实到实践上，必须为女性开放其他的可能渠道。尤其随着20世纪女权主义的来临，工作、机会的增多使创造性的劳动成为女性完善的一方面

维罗妮卡·钱伯斯在对成功黑人女性的研究中注意到工作上的成就是认定这些女性身份的重要因素。“像其他的美国女性，本书中采访的很多三十多岁，甚至四十多岁的女性都没有孩子。不像媒体介绍的职业女性惊恐的群画像，与我谈话的这些女性表示没有遗憾，没有‘该死，我忘了要孩子了’。一方面，这些女性无论在自己眼里，还是在别人看来，都是成功的……社会上还有一种说法，一个年轻黑人女性的成功，其他人都沾光”。。另外，女性气质，不论好坏，主要定义为美、性感、对心灵伴侣的执著。女性就要性感，就要执著，而不是母亲与孩子的关系。如今，我们很少听到女性出于本能的需求要成为妈妈。这样，大多数无子女的女性不再觉得受到污蔑80年代末，对年龄在36岁到47岁无子女的白人职业女同性恋者进行调查时发现，那些“把孩子看做‘女人的事’的女性最难接受不做母亲的决定”。。

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旧的理想观念依然残留。尽管社会文化对女性既要事业也要家庭的种种问题喋喋不休，女性还相信自己能够兼顾。年轻女性知道自己的母亲希望她们事业有成，但也想要外孙、外孙女。当社会还要把家庭观念理想化时，家庭意味着由父母和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心理学家卡罗林·莫雷尔指出，我们接受“单亲

家庭”的术语，但我们从未听过“没有孩子的家庭”。家庭的狭隘定义使我们看到单身和无子女人数增加使得近亲大家庭的重新兴起没有可能，人们不再记得当阿姨以及名义上母亲的重要身份。

第72节：新单身女性(72)

这些传统的文化设想对于已经明确是否将来有没有伴侣的年轻女性来说很难理解，她们不想生育也不想成为妈妈。当我们班的女生面对单身这个话题时，二十多岁的女性承认已经确定不要孩子。她们读到《女士》杂志的一篇文章时很受感动，作者卡罗林·梅根回复男朋友的有孩子才使我们成为人的观点，梅根写道："使我们成为人的是我们有选择的能力，有以不同方式创造的能力。"

当我的学生告诉她们的妈妈或其他人自己有喜欢的人时，她们被告知还太小，不能自已作决定，可能将来会改变主意。一个二十多岁的墨西哥裔美国人说，她妈妈告诉她如果一直不要孩子，她的生活会沮丧而难过。另一位年轻女性认为，骗人们说自己没有生育能力要容易些。在那之后，她得到了人们的同情。女权主义作家博尼斯·菲舍尖锐地指出这种态度的影响："认为女性不能选择不要孩子，认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显示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厌女标记。评说没有孩子会遗憾的这种声音与质疑女性在任何领域的选择能力是一码事……这种声音阻碍我们完全参与到社会中去，阻碍我们创造有意义的生活。"相反，清楚地表明自己不想成为妈妈就是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成年人，正如决定要孩子一样明确。

为什么单身女性不要孩子

我发现两种类型不要孩子的单身女性——不想成为妈妈的，不想成为单身妈妈的。

不想成为妈妈

新的文化氛围强调伴侣是人生通向幸福之路，降低了为人父为人母的乐趣，使得更多的女性承认永远不想成为妈妈。参与研究的一些女性认为她们很小的时候就这样想，而其他人，对当妈妈不感兴趣，勉强承认随波逐流。康妮·克劳福德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有10年的双方承诺的同居关系，从26岁到36岁。她说她与拍拖者从来没安顿下来，

所以不能考虑要孩子的问题。回忆中她认为没有决定的本身就等于作了决定。康妮和许多单身女性不要孩子的过程极为相似：大多数女性无意识地做出选择，而他人的决定以及生活的状况引导她们这样

卡罗林·N.莫雷尔发现“选择”这个词不足以描述已婚女性如何最终不要孩子的。“不是选择或决定，不要孩子被看做是正在进行的一种做法，由各种各样的个人和社会因素决定的”。劳里·里尔也发现，很多女性走到没有孩子这一步是“由一些小的决定、机会、冲动以及各种情况综合的结果”。同样，伊冯·威星写到没有孩子是“几十年来日积月累的事件与生活互动的产品”。。因为她从来没有要孩子的激情，康妮对这个结果很满意。她从未喜欢过怀孕，认为抚养孩子需要付出太多。快40岁时成了单身女性，她对不要孩子没有遗憾。她四十五六岁时，她弟弟收养了一个中国女婴。康妮为这个新侄女感到喜悦，她自己也考虑过这种选择，但还是否定了这种想法。

桃乐茜·索娅（在第二章）提到对自己的性感很自信，她也没有孩子。25岁到35岁时与第二个丈夫在一起。她丈夫有个十几岁就吸毒酗酒的孩子，桃乐茜认为丈夫处理不好孩子的问题，这一点使她不想要孩子。她说：“幸好没要孩子。”回忆过去，桃乐茜说从来没有强烈地想要成为父母。她知道那样会影响工作以及性独立。五十多岁的她想要个二十多岁的孩子，这样既可以和她生活在一起，又不至于经历孩子小的时候带来的麻烦。她说：“我不知道妈妈是怎样下班回家、做饭、与孩子交流。回家不必做这些感觉很好。”桃乐茜从性吸引方面概括了女性身份的新理想，而不是从兴趣方面或抚养孩子方面来界定。

对当妈妈不感兴趣的那些人里有的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如吉莉安·海尔德；也有来自大家庭的，如安妮·罗塞提和玛丽·比舍普；有与妈妈关系好的；如吉莉安·海尔德；也有和妈妈关系疏远的如桃乐茜·索娅。

对于所有这些女性，单身就成了窥探性问题和不赞成没有孩子状态的保护伞。因为已过40的和没有伴侣的女性，人们不期望她们是妈妈。具有独立意识的企业家安妮·罗塞提，45岁离婚之后，不再必须面

对曾有过的家庭压力。10年后，她承认不要孩子——是个令她满意的选择——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后果。她认识到“选择生活的方向造成了机会和损失”。安妮看重追求事业的独立自主意识，也想念她妹妹们与孩子一起享受家庭生活的丰富多彩。这样的承认不等同于遗憾；安妮知道自己做出了正确选择。

第73节：新单身女性(73)

不想当妈妈的想法会促使一个单身女人坚信以后会结婚。我采访了尼科尔·罗伯特，那时她30岁，是个小巧可爱的单身女性。她看起来是位能自我反思的年轻女性，尽管她与另外三个兄弟姐妹生长在一个不开心、缺少爱的家庭，她20刚出头父母就离婚了。尼科尔在家排行老大，被认为是能结婚，能成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好妈妈，一个有母性的女儿。她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第一个经济自立的孩子。不管是单身还是有伴侣，30岁的她对将来充满信心。她说："我认为即使我从不结婚，我也会开开心心过日子。如果两人能相互尊敬、有很多交流，我也会高高兴兴结婚的；如果我们都清楚什么对双方很重要，不认为我们结婚后一切都可以解决，就不结婚。"她遇到比她小4岁的男朋友之前，她很少约会，从来没有过一次严肃的关系。对于他向她提出同居的请求，她还在矛盾之中，因为她习惯于独立的生活，有自己的生活空间。

尼科尔很清楚自己不想要孩子，也明白不当妈妈她可能会很开心。她坦白地说："一想到怀孕、生孩子、当妈妈我就非常恐惧。"她认为这种恐惧来源于"需要保护孩子的责任感。我不想让孩子以我经历的那种方式长大，我害怕我不能改变"。9年后，我和她联系时，她嫁给了那个人，但他们已经决定不要孩子了。

拒绝单身母亲身份

四五十岁的无子女的单身女性想有孩子却不想成为单身母亲，有的出生于幸福家庭，有的出生于不幸或有不健康影响的家庭，或二者兼而有之。对于不想成为单身母亲，她们表明了种种原因。

兰妮特·琼斯来自中产阶级的黑人家庭，父母离异，她说拒绝成为单身母亲是由于受社会的陈规陋习对黑人单身母亲有否定看法的直接影响。南希·迪恩，弗拉明戈舞舞蹈演员，声称既要成为单身母亲又要追求事业，感到力不从心。其他的女性同意或认为考虑到要孩子没有

经济安全感。雷切尔·布朗，我们在第四章提到的成长在不幸家庭的单身女性，觉得如果她一个人抚养，她就会养出一个“真正疯狂的小孩”。相反，埃琳娜·莫拉里兹以及其他几个来自幸福家庭的女性，强调在成长过程中有一个慈爱父亲的重要性。来自幸福家庭的另一个人认为，如果生存环境不理想，要孩子是自私的行为。她认为不想成为单身母亲反而是无私的。

虽然没像兰妮特·琼斯一样意识到文化观念如何影响她们的选择，但所有这些女性都间接地受到20世纪后期以及21世纪初期文化主题的影响——单身母亲的困难和危险——相呼应。有关单身母亲经济和个人负担以及她们的孩子是残疾儿童的文化信息铺天盖地袭来。这种信息，尤其对黑人女性或其他种族、少数民族的女性来得更猛烈。单身母亲数量的增加以及支持女性选择成为单身母亲的运动，被单亲家庭的大量负面信息所吞噬。我们会在下一章考虑、评论其中的一些文化遗留影响。

当理智地考虑对单身母亲的文化偏见时，要一道考虑到单身父母的乐趣、情感的亲密和遇到的困难，今后的单身母亲可能或不可能考虑这种选择。她们可能会探讨把孩子与她们的生活融为一体的其他的创造性方式，也可能拒绝个人只能与自己的孩子亲密以及拒绝只能抚养自己的孩子的观念。

把孩子和无子女的单身女性的生活融合在一起

1994年，我第一次采访埃米莉·雅各斯和保拉·利特尔，9年后的2004年又一次采访她们。她们年龄相差18岁。我追踪调查了从32岁到41岁的双性恋者埃米莉，从50岁到59岁异性恋者保拉的生活轨迹。埃米莉过的主要是单身生活，但与一个女性同居了几年。保拉24岁结婚，34岁离异；四十多岁时她有过一次严肃的婚恋关系，也同居了一段时间。我第二次采访她们时，两人的关系均已告吹，谁也不想再提起那段往事。然而，她们对自己是传统家庭出身，对从很小的时候就

期望结婚生子，对为什么不想成为单身母亲以及把孩子融入到自己生活的创造性方式开诚布公。

第74节：新单身女性(74)

和许多没有孩子的单身女性一样，埃米莉和保拉在公共事业部门工作，这使她们与年轻人有密切接触的机会——埃米莉是个治疗学家，而保拉是位音乐教授，还是合唱团指挥

威星也有过这个观点，莫雷尔也注意到没有孩子的女性经常投身于强调抚育的社会运动中（例如，和平与环境运动），没有自己的后代，她们更容易将遗产捐赠给公共事业，而不是留给家庭成员。。但她们想与孩子建立更直接、一对一的关系。她们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侄女、侄儿关系很好。两人都找到一种与年轻人形成创新性关系的方式。

埃米莉·雅各斯与玉兰树俱乐部

埃米莉蹦跳着进入房间。41岁的她有着短小的身材，看不出她二十岁出头时还是国家级足球运动员。她那充沛的精力，说话直接而利索的特点显示出她曾有过的成就，在成功的运动生涯之后，她在描述创造平凡的职业生活时遇到的困难。

埃米莉出生在康涅狄格一个中上层的天主教家庭，是家里七个孩子的中间那个。她父亲是律师，母亲是家庭主妇。小时候埃米莉就喜欢运动，是家里最有运动天分的孩子。10岁时打网球，她哥哥们都成了她的手下败将，气得她哥哥扔掉球拍，她母亲赶来训斥她。从那之后，埃米莉主要和女孩子对打。埃米莉记得："进行体育活动不错，我有女性特征，留长发，用丝带梳成马尾辫，我爱微笑，从不乱吐痰。"

雅各斯一家的几个孩子都被期望上常春藤联合院校，父亲有雄厚的资金来支付孩子们的学费。埃米莉的思想叛逆，想到新英格兰以外的学校就读，为逃离父亲金钱的掌控，她要去踢足球。让父母痛苦的是她拒绝了哈佛和耶鲁大学提供的全额运动奖学金——1980年对女性来说这种机会如凤毛麟角——选择了南部一个不太知名的学校。在那

里，无论在学术上还是运动上埃米莉都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但学校在社交方面比她预想的要保守些。

8年来，在上学时或之后，埃米莉在国家女子足球队踢球。对于她来说那些年是美好的。埃米莉珍惜队友之间的友情，喜欢参加国际比赛到外国旅行。当她还是异性恋者时，父母常过来看她的一些比赛，过来支持她。

大学毕业后，埃米莉当时还在国家队，就在一家新英格兰精华寄宿学校（男女合校）找到一份工作，这反映了她对学校和有信仰家庭背景的依恋。因为学校缺一个教练，她也教历史，兼宿舍管理员。埃米莉在学校工作两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也增加了信心。她的腿部骨折之后，就离开美国队，决定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主攻心理学硕士学位，一年后攻读临床博士学位。虽然她喜欢教学，她更喜欢压力不大、更加自由的治疗学家的生活。她也希望通过接受临床心理学的教育，对个人问题能有自己的见解。移居到加利福尼亚使她远离那个保守家庭，她可以在这种环境下思索如何处理性方面的问题。

在高中和大学期间，埃米莉只和男人约会，有过几次严肃的关系。她坚持自己会结婚生子。但在大学三年级末，她与一个女同学有过短暂的特殊关系。80年代中期，一些大学已经建立了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俱乐部，但她所在的南部学院还没有。埃米莉回忆说当时人们对女子团队的同性恋者有憎恶情绪。“如果你想继续留在美国队，这件事你就得私下里进行。运动队选拔委员经常告诫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尤其是到外国参加比赛的时候；周围的人们对同性恋极其厌恶。”搬到加利福尼亚后，她只和女性约会。32岁时，她还没和父母透漏此事，她告诉和自己关系好的两个姐妹，她们不很支持她。一个说：“别担心，这只是个发展阶段。”另一个妹妹是个实习的天主教徒，不想对她评价什么，但建议她去做礼拜，在那她会发现优秀的团队。

1994年，埃米莉没有心思发展有承诺的关系。她觉得前途未卜，于是她全神贯注地写博士论文，开创自己的事业，也更加了解自己。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不崇尚理想心灵伴侣的人，埃米莉不想在任何关系中有部分地妥协。她还不知道自己会为何事愿意做出妥协。但埃米莉接下来说："我不敢想象自己没有孩子，与其想象自己处在某种特殊关系中，不如说我更容易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妈妈。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可能是因为我太爱小孩子了，我一直想要孩子，那是非常肯定的事。"

第75节：新单身女性(75)

像本书中提到的一些女性一样，埃米莉有几年离开了海湾地区，但9年后我找她时她又回来了。在电话中我得知她现在41岁，依然单身，没有孩子。从她的这段人生经历中我会得到什么呢？走进她的令人愉快的小公寓（朋友们的房子的一个单元），看到了两个令人愉悦的研究室。埃米莉自己看起来还和以前一样——友好，开朗，多疑，还在寻找。

和第五章描写的没有孩子，但独立意识强的女性不同的是，埃米莉个人没有什么远大抱负。她写博士论文以及完成必要的监督成为注册治疗学家用了很长时间。现在，作为一个私人家庭治疗师她只工作半日，在地方大学教一门课。钱是个问题，她很遗憾自己买不起房子2004年我和埃米莉联系时，她告诉我她的朋友已经决定搬走，她已经买了房子，依靠父母的资助生活。为了支付大额的抵押款，埃米莉还住在小单元房，把她的大房子租出去，但是她喜欢房主身份给她带来的安全。。但埃米莉有其他的优越条件。她说："事业不是我主要关心的事，我情愿过一种平衡的生活，追求其他的兴趣爱好。"埃米莉养有一条宠物狗，最近她又开始喜欢缝制被褥。她学习有关古物以及民族艺术的知识。在足球季节，埃米莉是海湾各地区高中与大学球赛的裁判员，有时一周自愿承担八到十场比赛。她说："这是个大投入，但我爱足球。"

自从我上次与她谈过之后，埃米莉提到她卷入了两次关系——严肃的那次是和一个女性，埃米莉和她一起住了两年；与一个男的关系持续稍短些，她与他相处了一年半，部分时间住在一起。过去的三年间她没有约会，又想重新开始。她说："我想念情感交流。"对埃米莉而言，她渴望与人的情感交流，不管男的还是女的，这比性别更重要。

虽然她曾经想过找个生活伴侣，和她住到一起能让她信任的一个伴儿，但她不敢肯定这样的伴儿会落在她身上。最近她的一个45岁的姐姐死于癌症。她姐夫想弄清楚他将来的生活，问她单身是否快乐。“我对他说，‘我不得不说我很快乐。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有美好的浪漫关系而我会不欢迎它的到来，只是没有浪漫关系时我不会迷失自己，我的生活也不空虚，我喜欢自己过着各种各样充实而真正幸运的生活。’”

听到这里，我提醒埃米莉她说过自己有要孩子的强烈愿望。埃米莉说这还是个大问题。考虑到目前她的经济收入还不稳定，她无法想象自己成为一个单身母亲。虽然她模糊地想过将来可能会收养一个孩子，已经做好心理准备面对可能没有自己的孩子的情形。埃米莉说：“我变得对自己不能控制的局面有点能接受了，要不要孩子就是其中之一。”然后她指给我看房间墙壁上的镶框照片——大尺寸的小孩黑白艺术照，还有十几岁的参加户外活动的孩子（显然埃米莉也是一个优秀的摄影师）。她告诉我她在玉兰树俱乐部和男孩、女孩目前的关系。

7年前埃米莉一直和她的女友住在加州北部的一个小镇上，她的女友在那工作。埃米莉在写博士论文，“同时在找各种借口延迟论文的期限”。她回忆了当时那一幕。“很多小孩子在贫穷的街区跑来跑去，他们的父母都在做两到三份工作，不在他们身边。一些是单亲家庭的孩子。有个妈妈受过三年级的教育，另一个上过六年学。我爱上了这些孩子，我这里简直成了日常护理中心。”他们主要是来自拉丁美洲的孩子，还有一个白色人种的女孩和一个非洲籍的美国男孩。他们每天都在大玉兰树下见面，当埃米莉和他们更熟悉之后，开始把他们看做一个俱乐部。

埃米莉又回到海湾地区之后，依然和他们保持联系，每年都带孩子们出去旅游几次。一次她带六个孩子，通常在峰峦起伏的山岭宿营或者进行其他的户外探险，有时在娱乐园尽情玩耍或到受欢迎的意义

重大的纪念地。她自己花了很多钱，也受到来自家人朋友的捐助。有时她一个人去，更经常的是家人朋友（很大的朋友圈）和她一起。埃米莉谈起一个夏天她父亲陪她一起在山上宿营。“他喜欢和那种甜甜的、可爱的孩子在一起。以前我看到的是他作为家长的一面，但是这次我却意识到我和他有很多共同之处，我欣赏他那一点。这次旅行是我们之间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第76节：新单身女性(76)

现在玉兰树俱乐部的成员都长成青少年了——有一个女孩刚生了孩子，另一个怀孕了，大多数搬到小城镇的其他地方。“他们保持朋友的关系，可能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经历。”尽管他们之间相隔一百英里，处在不同的阶层，埃米莉期望他们还保持朋友的关系。埃米莉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社会工作者或指导者，而是因为“我爱孩子，我爱这些特殊的孩子”。

友谊网络使孩子们融入保拉·利特尔的生活

贯穿这本书的一个理念（在第九章将更加明确地阐述），也是我强调的是在单身女性生活中朋友圈的重要性。我本想不到这样的人际网会成为无子女的单身女性与下一代建立联系的重要方式，尤其是侄儿、侄女住在远处的那些人。我追踪保拉·利特尔的生活，考察她是如何发展与朋友孩子的关系之前，我见到保拉时她50岁，与年轻人交往的欲望基本上通过教师这一角色得到满足，与一个拍拖4年的同居者的11岁的女儿之间是薄弱的继女关系。9年后，保拉谈起她建立的朋友网以及与朋友的孩子之间更臻完善的关系。

保拉是个高高瘦瘦，清秀文静，严肃认真的人，在西南部一个稳定的核心家庭长大，有个哥哥、当教师的父亲和当音乐家的母亲。她没有想象过没有孩子的单身生活。“你长大，结婚，生孩子，创建家庭，那就是生活。”保拉爱好音乐直接受妈妈的熏陶，她妈妈在卫理公会教派的唱诗班拉风琴。多年来保拉和哥哥一直在唱诗班。后来他们俩都反对有组织的宗教信仰，但是不奇怪保拉在音乐专业获得硕士学位，后在一个小私立学校的音乐系教学，指挥合唱团，教声乐和音乐欣赏。

然而，作为一名年轻女子，保拉想与家庭保持一些距离。1964年，她进入加州伯克利大学，第一学期她被学生的反抗运动——自由演讲运动震惊了。来自一个传统的家庭，在不参与政治的环境中长

大，伯克利大学校园的混乱骚动使保拉不知所措。她与男人的关系也在动荡之中，没有方向。23岁时，她遇到了后来的丈夫，他很实际，是那种“脚踏实地的人”。回想过去，保拉得出结论：“如果不是生存的需要，我就不会嫁给他，因为他不是那种我愿意和他共度时光的人。”虽然她感到来自他的压抑和束缚，保拉的婚姻还是维持了10年。有了自己的事业和一份稳定的工作后，34岁时她主动地离开了他。因为保拉对婚姻从未满意过，所以在生孩子的黄金年龄，她也没考虑过这件事。正赶上第一代值得信赖的合法的节育措施，保拉的这种选择才成为可能。

40岁左右的时候，保拉没有稳定的关系，她明智地决定没有伴侣就不要孩子。她说：“我与我父亲关系特别好，所以难以想象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没有父亲。我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无私的，我觉得那样对孩子不好。”

40岁出头时，保拉的大部分朋友是音乐家、艺术家，他们大多数没有孩子。但她快50时，保拉与一个离异带一个小女孩儿的父亲开始恋爱。这段关系持续了4年，保拉和小女孩玛丽越处越好，她已从7岁长到11岁。她们一起度过很多美好时光。首次采访保拉之前的一年，玛丽的父亲大卫搬进保拉那里。玛丽大部分时间和保拉、大卫在一起。保拉喜欢有家的感觉，大卫和玛丽却不太满意。玛丽想在二十多英里远的老学校上学，所以大卫每天都得开车接送她，他觉得是个负担。另外，玛丽与她的朋友不在一起，大卫和玛丽都感觉在保拉那不如在自己的家自在舒服。仅仅在我采访的一个月后，他们就又搬回老社区的那所房子。保拉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但希望能保持恋爱关系。然而，问10年后她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她回答说那时不知道他们是否还会在一起。

通过大卫，保拉和有孩子的几对夫妇成了朋友。她能近距离接触有孩子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并充分意识到她生活中缺失的以及她拥有的而有子女的母亲所缺失的——让人刺激的事业，自由的旅游，广泛

的各行各业的朋友。保拉回忆说：“我不想评论是她们的生活方式好还是我的好，我只能说它就像巧克力味或香草味的冰激凌。一些人喜欢这种，一些人喜欢那种。”接触有孩子的家庭有助于保拉接受自己的无子女状态，但她不能预见这种友谊会否创造一种更稳定地与年轻人交往的新方式。

第77节：新单身女性(77)

9年后，我再次和保拉联系，得知她已经和大卫分手。他们的关系又维持了3年多，在一起度假，过生日，到欧洲旅行过两次。保拉不喜欢缺少日常交流。她说："我有分离感，我不觉得我有一个中心，而是有两个中心。"他们逐渐分开，"交流越来越少，两人越来越不亲密，越来越不像个家庭"，越来越不像她想的那样。她也越来越有意见，最后永远地分手。不久，大卫在她家附近找到个新女友，保拉很受伤害。但现在觉得是他们的分手迫使她妥协、接受目前的单身生活的。保拉对我说："我不去做心理治疗，我开始读一些精神方面的书籍，以及古代的教诲，这些能打开我的思想，开阔我的心灵。这种探索使我心胸豁达，对人也更慷慨大方。我感到和学生交往更多，和家人、朋友交往更多。"

虽然保拉对自己的生活满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乐，但她想和"至少一个男人"有身体接触的亲密，有心有灵犀的沟通。我在第二章"性与单身女人"中提到，"她"对婚恋关系可能采取的既开放又可变通的观点：可以是旅游的朋友，约会的对象，或者和"她"住在一起的人。保拉解释了她想尝试因特网上的婚姻介绍。

保拉思考的结果把重点集中在友谊的重要性上。她解释说："我意识到和大卫相处时我把感情都投入到他一个人身上。我和女朋友联系不多。关系破裂后，我有意识地培养女朋友和有家庭的朋友，我现在有几个知心好友。我有真正的朋友网。"

让保拉吃惊的是大卫的一些朋友继续约她出去玩。更多的夫妇带着孩子，她和他们一起宿营。"感恩节和圣诞节他们邀请我过去，我们还一起去宿营。他们不请大卫。我和他们有真正的家庭往来。"几年来，虽然她没怎么见到过大卫的女儿，但玛丽最近和她联系，"她给我寄来一封圣诞节贺卡，说我在她的心目中很棒，她多么爱我。可能她大些时，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交往。"

保拉与名义上的女儿也增加了交往，她不久就要从大学毕业，保拉将和家庭一起参加她的毕业典礼，她已经为他们租好了房子。另外，保拉与她的一些学生有了更多的私人交往。他们毕业之后还保持密切联系。一个以前的学生带着小婴儿几乎每周来拜访她一次。保拉得出结论："我觉得我创造了一个大家庭，满足了与下一代交往的需求。我从不孤独，比起9年前我更加满意了。"

所有无子女的单身女性都想与孩子和年轻人有交往吗？可能不是。回忆过去，我意识到我没有诱使不想与下一代亲密接触的女性说出实情。我的一个朋友五十多岁，从未结婚，没有子女，在一个还没出版的自传草稿中写了失去妈妈时涌出的复杂心绪。没有自己的孩子她有些遗憾——如果有一个女儿能够重复以后的她与她妈妈之间的亲密关系——但她对找替代者不感兴趣。她写道："朋友的孩子有些我喜欢，甚至有时和他们玩，但是现在我最不想和他们一起，他们不是我所需要的。"更多的女性无疑也是这样想的。

我把上面写的那段让我的朋友看时，她说："那不全面，给你看看你没看过的自传的另一部分，我谈到教学的那部分。"她写到在一个小学院教学的收获："在工作中和学生亲密接触，看着他们长大。"教年轻人，她说："已经代替了孩子，这挺好的——与其说我是个好妈妈，不如说我是个好老师。"她概括了一个新型单身女性的生活："生活的艺术在于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保利·格林的《思念》，没有出版。

萦绕心头的忧虑——无家可归的流浪女

作者爱瑞娜·克利普菲兹形象地描述了没有孩子的单身女性典型的恐惧心理。她写道："我想象的最凄凉的一幕就是背着袋子的流浪女人，我看见她们坐在地铁边上，在公路旁蹒跚，或黄昏时蜷缩在门口。她总是抓住身边的纸袋子。她的脸色苍白，皮肤灰暗。她忘记周围的一切，对声音和运动没有反应，尤其对人们漠视。"

爱瑞娜·克利普菲兹

第78节：新单身女性(78)

：《无子女女人，无家庭女人，孤独女人》，见：罗射乐·拉特纳：《养育人生：无子女的女性手笔》，纽约：纽约城市大学女权出版社，2000年，19页，下同。对于克利普菲兹而言，背着袋子的流浪女人象征着年老时的恐惧——失去交往、联系，孤独一人。她写道："我害怕我也会那样孤独地死去，与人没有联系，没有人关心你，被世界所遗忘，成为多余的没有意义的人，如垃圾一样的生活。"克利普菲兹：

《无子女女人，无家庭女人，孤独女人》，

20页。"长时间来我认为（有时还在这样想）有个孩子就不会沦落到流浪的地点……事实上，我知道很多流浪女人都是妈妈，有家庭，有孩子。任何成熟理性的女性会认为孩子不是摆脱孤独的药或疫苗，而她们是人，有着和朋友、情人一样的人性的弱点。"克利普菲兹：《无子女女人，无家庭女人，孤独女人》，21页。

在课题中我没有问过她们对老年的恐惧，但是有三个没有孩子的单身女性提起这个话题，简单地说起对无家可归的流浪女人心有余悸。没有一个有孩子的单身女性提这方面的话题。三个女性——四十多岁的商人，美国籍的非洲人兰妮特·琼斯；五十多岁的性感女人桃乐茜·索娅；企业家安妮·罗塞提——都是经济上有保障，为退休做好了计划的人。她们认识到恐惧的非理性成分。桃乐茜说："我的一个单身朋友收入超过6位数，也谈论背着袋子的流浪女人。所以不是收入的事，是非理性的行为。我过去没有想过会成为流浪女人。我这一代（生育高峰早期）期望能结婚，不一定非得工作。"安妮也承认有非理性成分，也许这一代的恐惧根源是对年老能否照顾自己。

30年来的每一年，我都如期交纳财产税，从来没有拖欠过，但是每年我都为此焦虑，我的存折从来没有透支。我认为女性还没接受我们真的能照顾自己，似乎确信有一天一切会全部离去，我们会突然变

穷。但是现在我可以说："就是一切离去，你还有其他的补偿。"我已经赢得了那种自信，非理性的恐惧已经演变成一个朋友，因为她们（流浪女人）暗示我在担忧什么，我需要注意什么而且尽力解决问题。

所以背袋子的流浪女成为我的一个同盟。

年轻的一代女性早就料到她们需要经济独立，也许对未来没有那么恐惧。记者特里·凯西采访25岁的西班牙裔的玛丽亚·罗得里格斯，她在加利福尼亚的南部地区长大，知道自己不想要孩子。玛丽亚想象自己老年时的情景——"家人朋友其乐融融，有钱雇用保姆来照顾我。"

而玛丽亚认识到的以及克利普菲兹清楚表白的，就是金钱是刺激流浪女人形象生成的唯一恐惧的因素。孤零零的没人关心的老年生活就如同与社会隔绝一样令人恐怖。这种恐怖在移动社会是理性的，家庭责任成为最重要的永久的社会纽带。米歇尔·帕特诺德是个38岁的无子女单身女作家，她曾写道："私下里，我有时会担心老年时我会孤独一人，谁会到敬老院去看我？我去世时谁又会继承我的财产？谁会到我的墓前祭奠？谁会为我喂猫？为我浇花？"

这些恐惧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本书的第九章为五六十岁的单身女人生病时提供了范例，她们由朋友照顾，甚至比大多数家人照顾得还要仔细周到。老年医学研究也为七十多岁的单身女性提供家庭之外的帮助，从而打消了她们的顾虑。研究者发现，看起来无子女对年老时的幸福、知足感、孤独不起决定性因素。与朋友交往比与孩子打交道要重要得多。研究还表明，在长期婚姻中老而无子的女性，比起大半辈子都单身的女性更容易感到孤独。单身女性更容易营建社会关系网，依赖朋友，到老年时她们也会一直这样做，把年轻人纳入她们的朋友圈内。如保拉·利特尔，吉利安·海尔德（看第三章），一些五十多岁的单身女性已经与年轻人结成友谊——并希望在八九十岁时，当她们的同龄人也许逝去之时，她们依然有朋友。

第79节：新单身女性(79)

艾丽丝是个单身无子女的中年教师，在一次伯妮斯·费希尔对他的采访中，表达了对流浪女人恐惧感的乐观看法：“流浪女人给别人太多的警示，她说，‘有人会照顾我的。’”

我现有的一切已经足够了，至少目前足够了。摇篮摇动时咯吱作响，女儿睡得那样甜美、那样酣沉……我深深眷恋的小镇上有我亲爱的朋友和家人，我房前屋后爬满了野蔷薇花，深粉色的野蔷薇花，相互争奇斗妍，或者自开自谢。

——伊丽莎白·伯格《直到切身体验之前》

在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直到切身体验之前》，伊丽莎白·伯格通过塑造主人公形象，表达了初为人母的单身女人所感受到的那种满足和喜悦。随着孩子渐渐长大成熟，母亲和孩子的感情逐步深化，这种满足感也会日益加深。但满足的同时单身母亲也面临着很多艰苦的任务，其中最艰难的就是单身母亲身兼两职：养育和管教子女。虽然不时有亲友扶助，也有在外居住的孩子父亲或者代理父亲帮忙，养育孩子的重任仍主要由母亲一个人承担。就像本书中讨论的其他问题一样，我在此不想强调单身母亲和有异性伴侣的母亲之间有何差别。实际上婚姻生活中，很多情况下抚养孩子是单方面的责任，原因是同性恋伴侣中大部分母亲承担了抚养孩子的主要甚至全部责任

很多研究发现，即使在完整的家庭妈妈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比爸爸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要长得多。最近的调查表明六七岁大的孩子，妈妈每周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间有22个小时，而爸爸仅仅两个小时。十五六岁的孩子，妈妈花在他们身上的时间是爸爸的两倍。。如果男女双方同时全职工作，他们也像单身母亲一样，需要建立自己的亲友圈子共同完成抚育子女的重任。

我长期跟踪调查的13个单身母亲当中，只有三位母亲在孩子的生身父亲积极协助之下养育孩子，而且这三位母亲都离过婚。无论离婚

还是未婚的单身母亲，都要面对养育子女的诸多问题。除此而外，她们还要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文化偏见，即我们的孩子在没有父亲的环境中成长，必然心灵饱受创伤，在社会中处于劣势。单身母亲这种说法本身就带有歧视意味，因为我们很少说已婚母亲。

成熟的单身母亲日益增多，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类似消极的文化偏见对我们造成的影响（这一问题本章稍后将深入探讨）。1980年到2002年间，所有新增婴儿中未婚妇女生下的婴儿比例从18%上升至34%。同一期间，30至34岁之间未婚妇女生下的婴儿则从7%上升到15%。到2002年，2/3未婚生育的母亲超过20岁。而绝大部分单身母亲或者离婚，或者与对方分居，还有4%的单身母亲丧夫。换句话说，2003年有23%的孩子只和母亲在一起生活（还有5%只和父亲一起生活）。而且，美国70%的孩子在18岁以前都经历过短期的单亲家庭生活。但大部分单身母亲家庭并不贫穷，2000年只有30%左右的单身母亲接受社会救济，这一点和人们眼中的单身母亲的一贯形象恰恰相反。这些人口统计的变化说明，我研究中涉及的所有单身母亲们都知道，还有很多别的单身母亲，我们的孩子们都有同龄朋友在单亲家庭中成长。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开始从事此项研究。我采访的大部分单身母亲都是40岁到50岁出头，孩子一般都十几岁，大部分单身母亲们都正为孩子青少年期的特殊问题而奔波劳碌。有个例子非常典型，代表了所有十几岁孩子的单身母亲。我认识的单身母亲当中，有不少子女都非常优秀，但单身母亲如何度过孩子这一艰难的成长阶段，是一个重大议题。大多数单身母亲不依靠男方参与，独自承担起抚养孩子的重任，她们面对社会文化对单身妇女的偏见表现得较为无力和软弱。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这些受过教育、有见地的妇女们完全可以无视社会舆论对单身母亲的贬斥态度，完全可以对自己或别人宣称：这些单身母亲受过教育，经济上又独立，她们的孩子肯定没有问题梅丽莎·路德克研究选择当妈妈的中上阶层年龄较大的单身女性和青春期的贫

穷的单身妈妈对比，结果发现前者的情况是这样。。但现在我们面对着充满困惑、躁动不安的青春期子女，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自信。“我感觉我那十几岁的儿子简直就是问题少年统计中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一个职业单身母亲这样说道。这位母亲经济状况良好，而且一直有亲朋好友，父母姐妹帮她带孩子

第80节：新单身女性(80)

是否由单身母亲养大的孩子比那些在正常家庭长大的孩子有更多的问题还不清楚，目前需要更多更深入的研究。一个研究比较了从出生就由单身异性恋妈妈和同性恋妈妈抚养的12岁的少年与有父亲的正常家庭长大的孩子，结果显示“在情感、行为、社会适应性、与同龄人的关系和自尊方面”没有差异。然而，这种家庭中的母亲更易争辩，不易控制脾气。争辩真的那么严肃，还是单身母亲认为自己是那样？。

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告诉我们，孩子成长中遇到的困难正是因为家中缺少父亲这一角色造成的，要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环境中抚养孩子，单身母亲们不免忧心忡忡

90年代对同性恋妈妈养大的孩子和由异性恋单身妈妈养大的孩子的纵向研究对比显示，更多的同性恋妈妈的成年孩子认为他们的妈妈（90年代初）肯定她们的性别身份，而“由非婚的异性恋妈妈养大的孩子更可能认为他们的妈妈否定自己的非传统的身份，更想结婚”。男同性恋权利运动似乎给予了女同性恋妈妈权利感，并支持了那些异性恋单身妈妈所没有的。。出于这种担忧，有些单身母亲做出了一种有争议的决定：让别的男人进入孩子的生活，而这些男人却最终毁了孩子的前程。即使我们选择了一个很好的男人，我们也无法给孩子营造一种真正安宁平稳的家庭氛围，所以这种做法对于我们和孩子们的生活仍然弊大于利

在研究培养离异后单身妈妈和孩子的积极的关系中，心理学家芭芭拉·高贝和英格·布莱斯顿发现自信、权威和弹性教育的单身妈妈在离异的家庭中情感适应性强。她们没有分析为什么一些单身女性能够这样教育，而其他人却没有安全感。当然文化氛围趋于强调离婚对孩子的负面影响，总的来说，就是单亲养育过程中，单身妈妈难以培养孩子的自信。。如果我们能够预见我的研究结果，也就是说，八九年之后，我们的子女二十来岁就过得很好，比我们预料的还要成功，我们

也许会感到心头释然我知道没有单身妈妈的孩子从小到成年采访数据的纵向研究。有一个纵向研究跟踪的是离异的同性恋或异性恋单身女性的孩子从10岁到20岁的成长，但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单身妈妈的研究。几乎所有的同性恋或异性恋的女性在孩子成长的过程都有同居的伴侣，所以作者认为她们的发现最适合于比较同性恋和异性恋的继父母家庭的研究。。

我们的研究无非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父亲在家庭生活中最主要的贡献是帮助母亲

南希·E.多德：《为单亲家庭辩护》，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97年，31页。，当父亲和孩子和睦相处的时候，他的主要角色不是男性父亲，而只是另外一个亲人

英国心理学家苏珊·格罗姆布克的调查研究得出了这个结论

。此外，她的研究发现父亲对孩子的影响比母亲的要大。。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事实，我们可能更有理由相信，我们的亲朋好友完全可以取代父亲的位置在抚养孩子过程中扮演积极角色凯瑟琳·布莱克作过一个有趣的调查，没有充分母爱的女性如何成为好妈妈，列举了很多的例子说明从大家庭成员、朋友、老师那里得到帮助的孩子和青少年在缺少母爱的情况下恢复正常的生活。如果这样的成年（不分性别）至少能部分地弥补缺失的母爱，那么，当妈妈一人抚养而缺少父爱时，也一定能够适应。。我们可能已经看到，亲友们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爸爸”几个研究表明与有继父的孩子相比，非生物性结合的女同性恋者对她们的孩子更加关爱，孩子与她们的关系更亲密。另外，与异性恋的父母相比，女同性恋者能发挥最大程度的家庭关爱。。这样我们就不必担心，继父或其他候补父亲可能会对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子女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

本章讲述了两位中等阶层未婚母亲的故事，我自己的故事，还有一位离异母亲的故事，目的是揭示单身母亲在抚养子女过程中的喜怒

哀乐。我首先研究了我们抚养孩子的不同方式，如何和孩子建立起深厚的感情，随后探讨了父亲缺失以及孩子们如何步入成年等问题。

第81节：新单身女性(81)

成为单身母亲的历程

在没有同居异性伴侣的情况下给一个孩子当母亲，意味着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自己的单身状况。但承认自己永久的单亲身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大多数成熟女性都承认，孩子的生身父亲在孩子生活中最多只能起到次要作用，但我们还是忍不住想象，甚至私下里盼望，会有这样一个男人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一个愿意帮助我们照料孩子的男人。当然事情往往不尽如人意，个人经历有好有坏，身为人母需要投入全部的情感，最终可能会得到补偿，感到满足，也可能一切均以失望告终，包括为了给自己寻找伴侣，替孩子寻找父亲而做出的种种尝试，所以我们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愿望。

我作为单身女人40岁时领养了一个婴儿，而20年之后琳达·乌尔斯也是在40岁年纪却试图通过人工授精怀孕，下面我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经历加以比较。我们都知道，这种情况下，生身父亲不仅不抚养孩子，而且孩子对这个父亲也一直不知情，直到孩子长大成人。对我们来说，做单身母亲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程，我们的经历和詹妮丝·贝尔蒙特也截然不同，她还没有结婚或同居就已经怀有身孕。对詹妮丝来说，29岁怀孕完全是事出偶然，但决定要这个孩子却是深思熟虑后的审慎之举。她明知孩子父亲可能不会担负抚养之责，或者只承担很少的责任，但她还是毅然决然地把这个孩子留在身边。格温·帕默离婚后也成为单身母亲，她走过的是一条不同的道路，但更为常见。

经由一个素未谋面的“生父”而成为单身母亲

我37岁那年和一对夫妇合买了一栋二联式公寓，大家商定相互协作，共同生活，这就是我成为单身母亲最直接最外在的原因。我当时和那一对夫妇说明，我要生一个孩子，要营造一个家庭氛围，要当一个好妈妈，我们房后操场上甚至还有个托儿中心。我家在东海岸，我知道如果做了单身母亲，我需要有人帮助。这一点我没有错，但我没

有想到我的共同住户并不能给我所需要的帮助，更没有料到，为了这个孩子能进入我的生活我苦苦奋斗了3年。

从一开始我就想收养一个孩子。我一相情愿地想象着，自己能够建立一个家，领养那些千千万万个已经出生的孩子当中的一个。当然我也明白我的天主教家庭相对保守，他们宁愿我收养孩子，也不愿看着我未婚先孕我的家庭没什么特殊的。据1980年对单身母亲的态度调查发现已经有所收养的单身母亲比那些自己生养的母亲更得到认可。。更主要的是，我自己并不渴望怀孕，甚至对生产、分娩都充满了畏惧。我知道很多女人都有过怀孕生子的经历，如果不能怀孕甚至会感到不安，我却从来没有那种感觉。我只是渴望做个母亲。

1978年起，我开始四处打听想领养孩子。1965年开始，加州新立法有了变化，它规定单身成年人也可以通过州立机构收养他人子女。我立即递交了收养申请，很快就有收养机构的社会工作者前来访谈。她向我展示了待领养的孩子的所有照片，让我从中挑选出那些自己喜欢的。我当时很喜欢一对中国小姐妹，但这位社会工作者却说："你根本没法领养到她们，因为她们太可爱、太吸引人了。你是个单身女人，所以最多只能得到一个很难领养的孩子，很有可能会有发展障碍的那种。"我明白告诉她我没能力收养那样的孩子，我工作很累，每天要到50英里远的地方去上班，根本不可能接受一个"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结果我一直没有领养到孩子。

后来我又开始想办法从国外领养孩子，但没想到对单身女人来说，这简直比登天还难，因为大部分海外领养机构都不考虑单身男女。我又想自行组织海外领养，但却发现这得亲自去外国呆上至少6个月，还得雇一个律师处理一系列繁琐的行政程序，很有可能还要去贿赂官员，这一切太讨厌、太麻烦了。于是我只能私下里托人领养。我发现已经有了一套现成的办法：先雇一名律师或顾问，起草申请信件，送到美国天主教小镇上的妇科医生那里。信中需要说明自己的情况，剩下的就只能等机会，看有没有哪个怀孕在身的妇女会选择自

己。但在1978年，我咨询过的律师也好，走访过的熟人朋友也罢，都说我这是白费气力，因为哪个年轻怀孕的妇女都不会对单身女人感兴趣。失望之下，有那么几年我再没有私下里托人领养过。我是不是有点走火入魔？我虽然和很多人谈过，我打算做个单身母亲，但我认识的女人当中，还没有哪一个人处心积虑地想通过收养或人工授精成为母亲现在已经发生变化。2001年收养者中32%是单身女性，其中55%是黑人。这些统计数字来自美国卫生部和儿童服务局。。

第82节：新单身女性(82)

1980年我整40岁的时候，又想起了自己这桩心事。这时有两个积极因素，首先，我获得了全国人文科学捐助的研究员奖金，可以从事我的研究。有15个月的时间我无须教书，也无须每天远路上班，有充足的时间自由支配。另外，我听说一个单身母亲，正是通过上述私人托养的办法托养了一个孩子。直到1980年秋天我才终于联系到了我要找的人，这时我40岁生日过去了将近六个月，获得研究员身份也正好6个月，所以直到来年1月我才和一名律师约好见面的时间。

1981年1月2日和律师见面之前，我收到伯克利（Berkeley）一个已婚女人打来的电话，此前我曾经和这个女人在电话上谈到她前后两次私下收养的事。她电话里告诉我，她的律师听说路易斯安那州有个婴儿。1月5日，我就决定收养这个尚未出世的婴儿。1月10日，这个男婴出生了，1月15日，我成功地领养到这个男婴。就这样，经历了3年挫折和失败以后，两个星期之内我终于拥有了这个孩子。

事情是这样的。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小镇上有一个17岁的女天主教徒怀了孕，她是工薪家庭里五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其他兄弟姊妹都上过大学，有一个弟弟还是个牧师、博士。自从怀孕第三个月起，孩子的生母就受到精心妊娠护理，而且一直有意想把孩子送人抚养。是不是她本人同意不做人流呢？起先医生以为小孩是白种人，所以打算交给她亲朋好友抚养，但怀孕8个月时，孕妇才向父母和医生透露：孩子是个黑人。医生记得伯克利有一对夫妇写过一封信，希望收养一个孩子，这信就留在自己的文件夹里。他认为把这个混血婴儿交给这对夫妇抚养比较稳妥。于是他打电话通知这一对夫妇，说有个年轻母亲怀孕了，但这对夫妇已经失去了早先的热情。但他们热心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的律师，我的律师就打电话找到了那个还记得我的妇女。我随即打电话找到了我的律师，他要我写一份个人简历，再寄上一张照片。我反复强调我自己也是天主教背景。律师后来送给我孕

妇的照片，我同意为她支付医疗费用（4000美元），一小笔律师费，还有一张到旧金山的机票，让医生把孩子带到旧金山。随后医生和他的妻子又想在海湾地区一带度假。

就这样历经辗转，我的儿子马可在旧金山机场进入我的怀抱，递交婴儿的南方医生一直在抱怨飞机上咖啡厅里的黑人空姐如何傲慢，如何冷淡，而我则一眼就爱上了这个憨顽可爱的婴儿。我的长假还有9个月才结束，就得到了这样一件不可多得的尤物，一想起来我就乐不可支。他身体健康，很好带，而我精力充沛。亲朋好友很快就送了我一大堆用过的儿童用品、衣物和各种礼物路德克也发现90年代的朋友是很支持成熟的中产阶级女性成为单身母亲的。。而左派女性学术团体中，我率先领养别人的孩子，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大好事。就连我的天主教大家庭也认为，这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而如果我未婚生子他们定会觉得有伤风化。我当然不这样认为，但如果他们只有这样才能认可这个孩子，就随他们好了。我甚至可以免税，因为据说领养黑人孩子很不容易。

20年以后，琳达·乌尔斯也打算收养孩子的时候，她的办法和我的经历既有重合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别。我见到琳达时她已经31岁，正打算离开加州去东海岸读法律。琳达身材高挑，肤色白皙，金发碧眼，浑身上下透着女人味，又有点女人少有的自信和自尊。这次分组访谈中另外一位女士讲到，自己迫不及待地想找一位异性伴侣，琳达回答说，虽然她也想要性伴侣，但并不是那么迫切，至少不至于迫不及待，所以绝对不会考虑网上约会，或回复私人征婚广告。在我见过的女人里，琳达算是最特立独行的一个。

琳达是在单亲母亲家庭里长大的。琳达刚过1岁，她姐姐刚刚3岁时，她父亲就离开了她们。以后整个童年中她们只是偶尔见到父亲，再后来就和父亲完全失去了联系。她的母亲改嫁他人，又生了一个孩子，那是琳达10岁的事。琳达从来不喜欢继父，所以母亲很快和继父

分手时，琳达暗暗高兴。琳达常说，她很佩服母亲，认为母亲是抚养教育子女的杰出典范。

第83节：新单身女性(83)

琳达认为她将来肯定会要小孩，希望能和丈夫生一个，但并不排除做单身母亲的可能。还在读书期间，琳达就已经感到有压力。她的家人朋友，特别是祖父母，总是问她：“遇见过合适的人没有？”仅仅因为自己有了生育的欲望，就和一个随便约会的男人刻意“培养感情”，琳达不喜欢那种感觉。

8年以后，我费了好大力气终于在她就读的法律学校联系到她。这时琳达已经回到海湾地区生活、工作，仍是单身一人，已经获得法律学位并取得公共政策硕士学位，但这一点我并不觉得意外。在此前的9个月里，琳达决定做个单身母亲，尝试着通过人工授精致孕，对此我同样不感到意外。她告诉我，这些年她和很多男人发生过关系，有一次和一个男人同居达9个月，但都没有任何结果。现在她和得克萨斯州一个男人保持着远距离的关系，但她并不打算嫁给他。一旦动了做单身母亲的念头，她马上得到大力支持。

琳达在城郊一个小镇上买下一所房子，只能跑远路上下班，但城郊的小区使她有了一种自得其所的感觉。她很快就参与了小区的公共事务，并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琳达的母亲就住在附近，还打算第二年退休之后随同琳达搬进来住。她母亲六十多岁，身体健康，很想帮琳达照看年幼的孩子。琳达自愿加入了单身母亲志愿组织，这是一个1986年创建的全国性组织，现在大量志愿分部已经遍布海湾地区。琳达还没有成为母亲以前，她参加了一个“思考者和尝试者”团体。收养了孩子以后，琳达就有资格加入母亲一组了。琳达还参加了“注册人”组织，并和该组织的其他打算怀孕的单身妇女每天交换电子邮件。另外，琳达也开始考虑和几位女同事探讨未来的追求和目标。从这些女同事那里她也得到了大力支持，这些女同事有的单身，有的已成家，有的年近40，还有的40出头，她们都想通过人工授精和其他技术更成熟的方法怀孕。

琳达告诉我，至少加州的任何妇女都可以采用人工授精（AI），现在人工授精已经成了一项公开的技术，远比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们咨询的时候要开放、透明。她和一位生殖内分泌专家协作，通过专家的积极协助，琳达从加州冷冻精子库了解到精子的情况和精子捐献者的大量信息。“那里还有精子捐献人孩子的照片，每个人的情况都有记录，”琳达说，“包括捐献人祖父母、祖姨母姨父在内的既往病史。”琳达还看到了捐献人回答不同问题的录像带，和捐献人的心理检测结果。那里没有捐献人最近的成人照片，但能看到一系列面部轮廓。另外，精子库还进行别开生面的定级评优活动，有八位医生对捐献人的外貌进行评估。“各种信息非常丰富，”琳达总结说，“比和丈夫或伴侣生孩子有更大的选择余地。”

但即使有这样的支持，琳达尝试了9个月以后，还是没有怀孕。她留给单身母亲志愿组织的电子邮件清单里，其他妇女都怀上了，包括一个46岁的女人。一方面，这些妇女的成功给了琳达很大希望，另一方面，琳达又不免产生了疑惑：“我究竟是怎么回事？”她后悔没有趁年轻的时候尝试人工授精，怨自己如果不迷信夫妻生育的传统观念，也早就怀孕生子了。但琳达自己承认，即使自己30岁，也不一定就能怀上孩子，因为那时她还没有完成学业。

2004年年末我又联系到琳达，是在18个月以后，她当时正面临着重大抉择。她现在41岁，过去两年半时间里一直想通过人工授精怀孕。好不容易怀上了，但只怀了8个星期就流产了。琳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当妈妈。她42岁已婚的姐姐过去10年尝试过各种各样的不孕不育治疗，此前刚刚通过精子移植怀上身孕刚刚顺利生产。“太棒了，”琳达说：“上周我在她那里呆了10天帮她料理，我喜欢那个小家伙，一看见他我就更想要自己的孩子了。”

琳达放弃了人工授精，觉得精子移植对她来说风险太大。琳达年过40，只有一个卵巢，就是花上一万美金尝试人工怀孕，也只有5%到10%的成功率，还不包括2000美金的医药费。“如果我时间、经济能力

都允许，我肯定会试试的，但我既没钱也没时间。”琳达说。她决定试用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捐献的卵子，然后用捐献的精子给这些卵子授精，再移植胚胎。琳达解释说，这样的过程需要两万三千美金，由于胚胎被冷冻起来，所以琳达可以反复尝试。她的生育胚胎专家称此项技术成功率高达60%到70%，所以琳达很有信心。但同时她也很担心，因为怀双胞胎的机会也高达20%有很多有关不生育方面的书籍，感兴趣的读者可在图书馆、书店查询或上网打“不生育”。这里我不特别推荐，因为科学技术发展如此之快，或许《新单身女人》出版时，有的技术已经过时了。。

第84节：新单身女性(84)

琳达觉得自己不能一次冒太大的风险，所以如果此路不通，宁愿退而求其次，考虑收养孩子。她可以一直不停地尝试怀孕生子，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时间限制，但经济能力可能会达到极限。

我想到了我采访过的那些没有孩子的单身女人，她们如果听说一个女人为了做妈妈要付出这样艰苦卓绝的努力肯定会大为惊讶。即使像我这样千方百计收养孩子的女人，也无法想象自己能像琳达一样，为领养孩子这样劳心劳力。琳达自己也承认，整个过程困难重重，耗尽了人的精神和心劲。“我觉得这对于一个生活相对成功的女人来说尤其如此，”琳达说，“你得先有个计划，比如想达到这个目标，首先得做到哪几件事。大家可能觉得只要坚持不懈，只要多方打听，就能办得到。但领养孩子这种事就不一定这么简单。”

但琳达相信，如果自己有丈夫而不能生养，要领养孩子更是难上加难。生育胚胎专家的候诊室里充满了人的大喜大悲。“有些夫妻绝望地相互搀扶着，”琳达说，“我的看法是，‘伙计，我可不想那么着，好在我就是自己一个人，我不想在两个人之间协调、斡旋。’”

经由一个认识的生父而成为单身母亲

本书第一页我们就认识了詹妮丝·贝尔蒙特。她告诉我们，她五十多岁时放弃了寻觅一位精神伴侣的情感历程。詹妮丝来自一个中西部中等阶层家庭，家中4个孩子，詹妮丝10岁那年和家人一起搬到加州。将近30岁的时候，詹妮丝和一个美籍非裔男人约会长达两年之久。他们在感情上付出了很多，但从来没有共同生活过，也没有谈及结婚生子。29岁那年，詹妮丝大学毕业，正在为艺术前途而奋斗奔波，突然发现自己意外地怀孕了。男友不想承担生儿育女的责任，但也不强迫她做人流。怀孕3个月时，詹妮丝决定生下这个孩子，虽然她当时很清楚，很有可能要独自抚养孩子。“我爱孩子，想有个家，”詹妮丝解释

说，“但对婚姻我一直怀有一种复杂、矛盾的感情。”詹妮丝没有要求男方给予帮助，但还是希望他能在孩子生活中发挥作用。

儿子以赛亚出生以后，詹妮丝靠育儿福利生活，这样才能待在家里看孩子。一年半以后，她出去兼职，只接受部分育儿福利。儿子3岁的时候，詹妮丝当起了全职秘书。以赛亚7岁时，詹妮丝重返艺术院校，获得美术硕士学位。她希望一面在大学里教授美术，一面继续自己的理想：为儿童书刊画插图。詹妮丝从未谋得大学美术教师的稳定工作，但她在好几所大学兼任美术教师，还靠画插图挣点零星的收入。

詹妮丝的兄弟姐妹都支持詹妮丝的决定，只有母亲非常难过，主要是因为她儿子是黑白混血儿。詹妮丝的父亲更为开明，但她17岁时父亲就去世了。詹妮丝没法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妻子母亲，詹妮丝的母亲感到失望，也担心别人会说三道四。她后来对外孙以赛亚疼爱有加，但詹妮丝身上的耻辱、外孙的黑白混血身份却始终是她一桩心事。

离婚后成为单身母亲

格温·帕默离婚后成为单身母亲时要年轻得多，个人经历也有所不同，是很多单身母亲的典型。格温出生于中西部一个工人家庭，在三个孩子中排行最小。她父亲是个电话维修工，母亲是家庭主妇。格温在严格刻板的福音派新教会环境中长大，从小就非常虔诚。16岁时，母亲去世，她那一方狭小封闭的天地被彻底摧毁了。格温对母亲非常依恋，和乖戾古怪的父亲一向比较疏远，两位姐姐也相继结婚离家。母亲离世，留下了一块无法填补的感情空白，她的父亲和姐妹都无法替代。格温的家人也没法帮助格温正确对待母亲的离世：“我们从没谈起过，也没有哭闹过，我们回到各自的空间，努力为生存而奋斗。”格温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幸亏格温男友的母亲待她像亲生女儿，格温才算从那次不幸中存活了下来。格温后来很快离开了中西部，每次回来都只是小住几天，但她一直和这位“代理母亲”保持联系。

格温高中毕业，但上社区大学文秘专业的第一个星期就觉得精神崩溃了。她和一个比她大4岁的男人一下子进入了“疯狂”阶段。这时她一个已婚的好友大学毕业，准备和自己丈夫的朋友一起开车去加州，他们撺掇格温和她们一起去。格温觉得她的代理母亲已经说服父亲，让她离开一段时间可能对她会有好处。于是，高中毕业6个月以后，18岁的格温嫁给了这位朋友。她并不爱他，只是不知道如何安排今后的生活而已。这场婚姻持续了6年。如今年届40，格温和我谈起这场婚姻时，只记得一段朦胧纷乱的情感。她还记得很讨厌当时的工作：在一家加油站零售汽油，同时在那种鼓吹自我实现的小册子里到处翻寻，想找到提示来激发情感、刺激性欲。尽管精神十分苦闷，格温还是保留了早年接受的大部分宗教信条，相信婚姻是从一而终的。有一段时间他们经济情况好转，租得起一幢小房子，格温就不再吃避孕药了。她很快就怀了孕，几个月后生下一个女儿，这时她还不到22岁。格温事先并没有征求过丈夫的意见，也没有自觉地考虑过自己的选择，她想当然地认为，已婚妇女生儿育女是天经地义的。她并不打算借生儿育女来维持或挽救婚姻。她只是想对婚姻妥协、退让，所以一直认为自己生孩子的决定是最明智、最合理的。但实际上，这种母亲身份反而使她有了更大的勇气走出婚姻。

第85节：新单身女性(85)

格温喜欢有孕在身的那种感觉，也喜欢当妈妈，所以能请假4个月在家照料女儿凯特感到非常开心。正是在这一段时间，她逐渐接受了她一向感到压抑的生活——她丈夫常年酗酒，或者酒后借睡消愁。格温虽然想方设法重新燃起他内心的爱情，但种种努力都无济于事。和丈夫发难以前，格温曾经参加过一个戒酒会议，这是酗酒人的家属或朋友志愿组成的互助团体。会议上她结识了詹妮，詹妮当时正和酗酒成性的丈夫办离婚。

格温得到詹妮和志愿组织的支持，在凯特一岁半的时候离开了丈夫。刚离婚的那段时间，她和前夫共同监护女儿。但有一次前夫带女儿回到家时又旧态复萌，喝得酩酊大醉。格温又惊又气，她承认自己不能给女儿一种安全感。格温既然有独自监护权（这一点离婚时她丈夫并没有反对），她规定只有在特定情形之下丈夫才可以见到女儿。很快，前夫就又结了婚，从母女二人的生活中完全消失了。

离婚后，格温打算继续读书，就上了一所社区大学。她白天把凯特寄放在托儿中心，而且还在中心做兼职。有了这份工作，又有福利和每月75元的育儿补贴，又从学校贷了一点款，加上格温会精打细算，二十多岁的格温觉得自己的生活渐渐走上了正轨。她在戒酒会议上结识的朋友詹妮又结婚了，她自己初婚生的孩子，丈夫和原来妻子生的孩子，还有她和丈夫共同生的孩子组成了一个大家庭，他们热情接纳了格温和凯特。凯特管詹妮叫詹妮姨妈，詹妮的孩子们则称格温为格温姨妈。詹妮比格温大10岁，所以几乎成了格温的又一位代理母亲，格温觉得，自己真是遇上了最好的人家。凯特和格温在中西部的家没有太多瓜葛，现在凯特也是二十多岁的大姑娘了，但和詹妮一直经常联系，有什么心里话宁可跟詹妮讲，也不愿告诉妈妈。

格温很快结束了两年大学学业，在附近一家中学当教学秘书。她和那里的教职员工结下了真挚的友谊，而且上班时间固定，有很多时

间陪伴女儿。我第一次随访格温的时候，她还在那家中学上班，刚刚完成了硕士学位课程，被提升为校长行政助理。

单身母亲和孩子之间感情亲密

我们已经看到，对工作的投入及事业的成功使单身母亲更加独立自主。就像决定不生孩子一样，性方面的满足也有利于培养这种独立性。因为这里提到的所有母亲要么决意做个单身母亲，要么明知自己得一个人带孩子还是决定当妈妈，她们都培养了一种相对的独立精神。独自为养育孩子奉献一生有利于培养一个人特殊的品质，这些品质在面对生活挫折的时候才能表现出来梅丽莎·路德克采访过的一个单身母亲揭示了一直单身的母亲独立意识的一方面——能够继续自己的姓氏，传统意义上女性不能将自己的姓延续下去。。同时，单身母亲容易和孩子形成特殊亲密的感情，很令人欣慰。独自看护一个孩子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去爱别人、和别人分享、关怀别人，这些从工作中、从朋友那里和成人交际圈子里是得不到的。我们对孩子只需一味关爱呵护，不像对丈夫或伴侣，无需从情感上给予支持，这显然有利于强化母子（女）之间的感情纽带根据一项在英国的纵向研究，从一开始就没有父亲，由异性恋或同性恋的母亲养大的孩子，与同龄（12岁）有社会地位的正常家庭的孩子作比较，结果发现这三种类型的家庭中的孩子在热情、与妈妈之间的信任方面没有差异。然而，“在没有父亲的家庭，孩子们觉得他们的妈妈和他们有更多的互动，更多的时候在一起，相互依靠得更多”。。但人们常说，母子感情过于亲密是不正常的，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做到既和孩子亲密无间，又不致亲密过度呢?

生下凯特的时候格温还年轻，对抚养孩子也没有什么经验，所以格温认为凯特还小的时候自己算不上一个好妈妈，凯特反倒要“培养”格温。但母女之间仍然非常亲密，格温把凯特叫做“小小老成人”。凯特12岁时遭到性虐待（见下一节），格温才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母亲，和凯特越发亲密。

第86节：新单身女性(86)

我再次联系到格温时，她已经49岁，凯特也26岁了。格温告诉我，18岁到20岁这几年间，凯特一直在外面住，后来又搬回来，在家一住就是6年。凯特干一份不错的全职工作，支付一半房租，还承担了许多日常开销。她朋友很多，生活很忙碌，男朋友一星期里总有几天来过夜。格温和凯特都不是那种“搂搂抱抱型”，不是“触摸生情的新人类”。但母女二人仍然喜欢共处，说些心里话。两人同吃早饭，有时也在一起吃正餐，一般睡觉前都要相互联系。格温这样说起凯特：“她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们这样亲密我很高兴。”

最近，格温认为她们各自都需要更加独立。她想在20英里外的小区里买下一套一居室的公寓。这栋公寓楼共有29套房，住户共享很多公共空间，每周三次共同进餐，共同为本栋楼的公益事业服务欲知共居的更多信息，请查询网站www.cohousingco.com.该网站的创始者也出版了一本书。。她9个月内还不打算搬进去住，但已经成为小区生活的一分子，而且乐在其中。格温对这种共同生活的理念深表赞同，希望在小区里能结交更多的朋友，发现更多的小区生活空间，使自己单身女人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凯特租到了一间两居室的房子，第一次一个人生活。

和格温一样，詹妮丝觉得她和儿子是“一起长大”的。詹妮丝一般都和儿子单独住在一起。第一次访谈时，詹妮丝45岁，以赛亚16岁，詹妮丝说：“和以赛亚在一起我能得到很多很多。我们在一起就是一个真正的‘家’。这些年虽然我并没有真正的伴侣，但我并不孤独。”詹妮丝的好朋友都住在外地——西雅图、亚利桑那、巴黎等——她和以赛亚的关系非比寻常，非常亲密。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种感情纽带在以赛亚成年时产生了什么结果。

女权主义者罗宾·摩根谈起自己的儿子时说过一番话，我觉得用在我和我23岁的儿子马克身上倒是恰如其分：“这是我唯一真正爱慕的男

人。”我们母子之间的感情的确非常深厚，没有别人能让我如此兴高采烈或者忧心忡忡。这种感情纽带从一开始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在以赛亚成长过程中一步步深化。以赛亚身上热乎乎的，爱往人身上凑，不像我，总爱跟人保持一定距离。他对别人的情绪变化非常敏感，这一点真是太难得了。有时听他谈论什么不如意事、令人尴尬或失望的情形，我也跟着难过；也有时候他跟我谈起生活中的得意经历，但无论如何，他能和我毫无保留地分享他的全部生活，确实非常可贵，因为我自己就没法对自己的父母这样敞开心扉。

我和马克回想起他5岁到12岁之间的往事，都觉得那是一段令人怀念的诗情画意的日子，我们都非常开心非常惬意。马克离开幼儿园之后到六年级之间在一家私办小学上学，学校规模不大，但我和马克都非常喜欢。幼儿园毕业后整整7年，他班上20个孩子中有14个都上这所小学，其中5个孩子跟他一样，都是黑白混血儿。这所学校是我和马克的共同生活圈，就像马克参与的其他任何活动一样，比如少年巡逻队（当地公园组织的少年男女组成的背包远游项目）、体育运动、夏令营、戏剧和音乐表演等等。

马克小时我们经常外出旅游，有时和其他家庭，也有时候只有母子二人，我们的感情就在这些共同活动中一次次加深。我和马克都喜欢呆在户外，喜欢背着包长途跋涉。马克还喜欢钓鱼，我不爱钓鱼，但一般都带本书和他一起去。我们有时出了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托隆门草场，到海拔很高的马鲛鱼野营地去。在西南部我们至少有过三次难忘的旅行，远途跋涉到大峡谷、宰恩和拱门国家公园，还去过别的地方。

有马克，有朋友，有事业，我生活得很充实，几乎没有时间和感情空间来容纳风流韵事。马克也跟我谈起过，说希望我再结婚，但只有我的异性朋友关心他他才可能喜欢他们。马克也说过想要姐妹，不过当他的好友的单身母亲生下第二个孩子的时候，马克（10岁）并不怎么兴奋。“小孩子，”他告诉我说，“太爱哭，太麻烦。”

第87节：新单身女性(87)

80年代和90年代初，我作为单身母亲仍然不免受到主流文化观念的影响，这种观念认为母子感情过于亲密对孩子成长不利。我是个女权主义者，希望有个细腻敏感、知情多义的儿子，根本不相信如果母亲过多地介入儿子的生活可能会助长儿子的同性恋倾向。马克体格健壮，身手敏捷，同时明显有点“女里女气”。4岁时马克就喜欢玩洋娃娃，8岁时就喜欢上现代舞蹈课，接近青春期的时候就喜欢追随时尚，而且一贯情感非常外露。一方面我很欣赏这些品质，但另一方面我也有些担心，这些素质会不会妨碍他在社会上做个男人。他八九岁的时候有一次打少年组棒球时，突然来到观众席里，在我膝上坐了一刻钟。不是两三分钟，一坐就是一刻钟！我感到幸福，同时不免有些担忧。

几年以后，我看到临床医学家奥尔加·塞维斯坦和贝丝·拉斯鲍姆合写的一篇文章《培养好男人的勇气》，才感到心头释然。这位医学家否认母子关系中存在所谓的“过分亲密”现象。心理学家威廉·保莱克写了一本《真正的男孩》的书，书中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保莱克坚持认为，如果和一个富于爱心的母亲亲近，那么这个男孩更有可能“自由、自信、独立，也更有可能孤芳自赏，敢于冒险，成年以后易于和人亲近，感情容易投入”

威廉·保莱克：《真正的男孩：挽救我们的儿子摆脱少年时代的童话》，纽约：兰登书屋.1998年，82页，下同。。

但我相信，青春期和母亲分居对母子双方都难以接受，感情亲密仅仅是原因之一。

寻找父亲或男性榜样

说起抚养没有父亲（或没有人代替父亲的角色）的孩子，单身母亲是最敏感的话题，也面临着思想观念的强大压力，这些思想观念是

指根深蒂固的文化成见。让我们先来审视一下我们所生活的文化环境，再看看各个母亲是怎样应对这种压力的。

一份母权社会成因分析论文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和通俗文学界逐渐引起瞩目，这篇报告开篇就是有名的1965年墨尼汉报告。这种分析理论最早只适用于贫穷的黑人单身母亲，后来引申用来解释所有单身母亲。该理论的基本点是，“父亲缺失对孩子——特别是男孩——的成长可能带来灾难性影响，因为没有父亲意味着孩子没有经济来源，没有榜样可供仿效，缺乏父亲管教，没有等级观念，也没有引导和指点，而这些只有父亲才能给孩子。”比博拉兹和拉夫特里：《家庭结构，教育成果与社会经济的功能：重新思考“女家长制的不足”》，见：《美国社会学期刊》，1999年9月，第105卷第2期，321页，下同。20世纪60年代盛行的女权主义对这种观念进行公开抨击，认为其中包含了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还多方呼吁，要求政府部门对贫穷的单身母亲给予支持，重视职业母亲给孩子提供最起码的良好教育。但这一时期女权主义运动的重心是让男性更积极地参与家庭生活，扮演平等的伴侣和父亲角色。从这一点上来看，女权主义运动产生了一个间接效果，就是加深了社会文化对单身母亲的偏见。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女权主义的第二次思潮进入黄金时期，这一时期有一系列很有影响的女权主义作品发表，这些作品毫无例外地证明了这一偏见。

莱蒂·柏格罗宾1980年发表了一部很有影响的作品《自由成长》，在80年代还出了一本《养育孩子》。在这两部作品中，柏格罗宾坚持认为“孩子需要父亲”，“管得最少的母亲是最好的母亲”

。柏格罗宾没有预见到80年代小家庭继续衰落的趋势，认为取而代之的其他家庭形式都差强人意。“10个孩子里有8个都父母齐全，所以接下来要重点讨论这种家庭格局。但我鼓励那些单亲家庭和混合家庭尽可能采纳书中的建议，以适用于各自特殊的家庭形式。”

其他畅销的女权主义报告都应合了柏格罗宾这一观点。艾德丽安·瑞奇在《生为女人》（1976年）一书中对抚养孩子作了精彩纷呈的报

告，末尾一章《母与子，男人与女人》专门探讨了男人应该如何介入孩子的生活。简·拉扎里在《论有爱心的男人》（1978年）一书末尾完全否定了自己对孩子产生的影响。“因为在那个世界中我是个女人，有些东西只有父亲才能给予孩子，我没法给孩子。”

第88节：新单身女性(88)

学术界的女权主义理论家也支持这一观点。南希·查杜罗和桃乐茜·丁格斯坦各自从精神分析角度出发，认为妇女系统地抚育孩子，不知不觉地复制性别差异，培养出依附型的贤妻良母和独立自负的男人。针对这种基于性别的角色差异，她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让父亲参与抚养孩子

。这种理论视野有自身的局限性，所以20世纪90年代面对公众的批评时，女权主义理论家猝不及防，无力替中等阶层的单身母亲进行有力的答辩

20世纪80年代反对女权主义的过激运动诋毁了单身女强人的名誉，进而反对流产和男同性恋解放运动，这些却促进了倡导母性的运动。社会文化在散布有关母系社会偏离正常发展轨道的说法，单身母亲没有得到充分关注。间接地说，80年代的过激反应对已婚的或单身的母亲都不利。80年代兴起了中产阶级母亲育儿的标准，人们对好妈妈有了更多的期盼。这种备受关注的母亲育儿需要经济支持，或有沟通技能的合作伴侣。后者可能是心灵伴侣，会成为孩子的父亲。

有关这两种意识的一个有趣的例子——孩子需要父亲，母亲需要伴侣——在一项对由捐献精子而怀孕的单身母亲研究中可以看到这两方面相互作用。社会学家罗赞娜·赫兹发现女同性恋和异性恋女性都想让已知的捐献者和她们的小孩子保持一段距离，因为她们希望想抚养孩子的伴侣成为孩子的父亲，如果是女同性恋，则共同抚养孩子。这些单身母亲不能想象超过两人的父母抚养或者不想在一起承担抚养义务的稳定的伴侣。。

1992年当时的副总统丹·奎尔指责电视人默菲·布朗，因为她打算婚外生子，并单独抚养孩子。这引发了一场声势很大的激烈的公开辩论。当时我正是一个10岁孩子的单身母亲，很欢迎这样公开的讨论，因为这场辩论认可了许许多多像我一样的母亲。“最好把问题公开化，

哪怕公众的反应是消极的，也比掩盖问题要好得多。”我这样想，但没有料到这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1993年《大西洋月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丹·奎尔是正确的》，引起公众普遍关注，文章的作者芭芭拉·迪弗·怀特海德就此明确了有关单身母亲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她收集了所有学术文献来证明，在单身母亲身边长大有损于孩子的健康发展。几个月后，《时代》杂志报道了几位父亲，该报道透露，一部分匿名心理学家“认为没有父亲的孩子容易丧失自信心，过于依恋女人，感情粗糙”南希·R.吉布斯的《提到父亲》，《时报》，1993年6月28日。。1996年，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79％的美国成人赞同这一观点——“美国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家庭及社会问题就是家中缺少父亲。”另外斯达希证实了90年代文化氛围强调没有父亲的影响。

女权主义者继续支持单身母亲的基本权利，抗议政府迫使妇女通过婚姻改善自身经济状况，但他们未能对这种不可或缺的父亲文化做出一致回应。90年代女权主义研究涉及已婚母亲面对生活和工作的双重压力，出现了一系列新名词，如“第二次转换”，“身为人母的代价”，等等，但类似研究使单身母亲的处境更为尴尬

参见霍克希尔德·阿丽·卢梭：《意想不到的团体：老年亚文化的众生相》，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2年，下同。。

众目睽睽之下，并没有出现任何事实对以上观念形成挑战。但这种事实确实存在。心理学家撰写的专著（奥尔加·塞维斯坦的《培养好男人的勇气》和威廉·保莱克的《真正的男孩》）里都提出，单身母亲能够培养出优秀的儿子，家里没有父亲或一个主要男性，儿子或女儿都可以顺利地长大成人。社会学家蒂莫西·比勃拉兹和其他人合作进行量化实证研究，发表在社会学核心刊物上。他发现如果控制单身母亲的教育水平和职业素质两个变量，她们孩子的发展（在教育和职业方面）跟亲生父母带大的孩子一样，比在单身父亲身边或只有父亲或继父的再婚家庭中长大的孩子要好